

沉重的感谢

这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传记，而是为对先人的惭愧所写下的沉重记录。从1913年到现在将近一百年里，缅怀先人。我们只感到羞愧和不安，因为我们是不孝的一代，没有保护好先人殉难的价值观，也没有对先人的陵园，给以责无旁贷的守护。不仅如此，在百年后，他的安息之所，居然还从我们的手中无情地被彻底毁灭。仰望苍天，徒呼奈何！

伍汉持烈士，在创建民国后，进入了神圣的国会殿堂，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第一部宪法的尊严，在1913年8月19日，被袁世凯谋害而殉难，成为第一个中华民国首届国会流血牺牲的议员。从他牺牲的那一天开始，他的英灵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息，反之却一直在磨难中飘荡。

三十年来我怀着信心，默默地告诉自己，上苍一定保护着先烈的遗骸，而我更相信是上苍听到了我谦卑的心愿和真诚的赎罪，祂的慈悲和怜悯最终引导着我们先人的遗骸重聚。

为了感谢上苍的眷顾，找回先烈为维护中华民族宪政的价值观，我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但举步维艰。除了国民党元老

邹鲁和胡汉民两位前辈，对先烈有点滴的描述外，居然在整个的民国史中缺漏应有的记载。于是我决定在那如海底捞月的困难面前，也决不退缩。为此上苍再次体恤我的真诚而展现了祂的宽容，给了我勇气，将一片片先烈的事迹重新拼装，完整地恢复了他的原貌，为此我怀着谦恭的心情，向协助我的机构和个人，表达我发自内心既沉重又虔诚的感激。

广州市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是我在整理先烈事迹过程中，第一个接触的机构，从他们那里得知保存有完整的伍汉持纪念医院招生简章，以及其他的历史资料，证实了烈士生前创办医院，为贫苦群众免费医疗的德政。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李穗梅馆长，朱晓梅主任和李兴国先生，给我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欧阳旦霓副馆长和王国举先生，提供了包括伍汉持烈士等当选为代表广东出席国会的议员名单等珍贵档案资料，证实先烈在殉难前，进入国会的真实信息，在这里要向欧阳副馆长等感谢他们的热情支持。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是伍汉持烈士的女儿伍智梅在美国等地向华侨界筹募的款项而兴建的。为广东建立图书馆的事业树立了典范。在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是图书馆的倪俊明副馆长，他协助我从图书馆里的存书中，找到烈士及其女儿的革命记载。尤其是倪副馆长特地将图书馆大门两边的石刻做了拓片赠送给我。上面清晰地记载了伍智梅在北美洲筹募捐款的经过，为这本传记增加

不少历史的价值。

特别要感谢的是广州市文化局前局长陈玉環女士和刘春华处长，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精神，使失而复得又几乎再次被毁灭的烈士遗骸得以保存并暂且安葬。虽然这样的安排不尽人意，也聊以安慰先烈家属的悲痛心境，尤其是陈前局长和刘春华女士经历了万般无奈的艰难联系，才能使得烈士的遗骸骨坛得以暂时重新入土。

烈士的遗骸是2010年9月8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工地上被发现的。那里本来就是属于烈士的安息之地，为了医院兴建大楼，烈士的墓地彻底被拆除，目睹先人安息之所被毁灭，我们只能谴责自己的无能，没有将先人的墓园保护好。

为了证实先烈后人所遭受的苦难，通过先烈后人的讲述，并给我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其中相当的内容，我和旅居海外的其他亲属作了对比，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夸张。同时从烈士遗骸被发现后，许多的联系和安排，通过烈士后人的的辛劳，才得以暂时安葬。

由于在中国大陆的国家档案馆搜寻资料阻力颇多，我在无奈的现状下，决定到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去查找，在该馆工作人员的悉心帮助下，查找资料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他们知道我是为撰写先烈传记而寻找资料，给了我许多额外的安排。其中包括有烈士的遗照和党国元老胡汉民先生为烈士墓碑所撰写的铭文原稿

等极其珍贵的史料。在这里要特别向党史馆负责人邵铭煌主任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该馆两位女士在我查找资料时，提供了宝贵的协助，为了在完成此书稿后对她们表达感谢，我再三询问她们的芳名，但都被她们婉言谢绝，只说她们所做的一切是份内的工作，不值得一提，为此我必须强调，就是她们的虚心敬业精神，使我查找资料的工作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完成，所以我要向两位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台北之行的成果，是我在抵达之前没有料到的。国民党党史馆里的收获给我的是兴奋，因为长久以来，只有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国民党分部大礼堂里，曾经悬挂过烈士的遗照，那是在广州地区以外，唯一看到的烈士照片。而这次在台北，居然获得意外的收获。由于烈士在自己的家乡广东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还无情地被践踏，我心里始终默默地祝祷，而且相信真理终究会战胜一切的，位在台北士林的忠烈祠让我感慨，感动和感恩。因为烈士在忠烈祠里享受着崇高的敬仰，而我应该感恩的是，因为有了在忠烈祠每一位工作人员，以及终年守护着烈士们的三军官兵的辛劳，烈士的家属心中没有了悬念，获得的是安祥的宽慰。我也要特别向忠烈祠的所有官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对所有安排我前往忠烈祠的朋友们表达诚挚的感谢。

由于在台北忠烈祠的发现，我和妻子，烈士的嫡系孙女伍敏德，在2011年6月1日，前往台北向先人致敬和祭拜，忠烈祠负

责军官和他的同事，特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在此除了向他们及两位空军礼仪兵表达感谢之外，并致以最诚恳的敬意。在台北，我前往国史馆查找烈士及其女儿的资料，也得以顺利完成。最后我在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也找到了丰富的历史档案和文学作品，支持我写这本传记中的一些立论。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当代中国著名散文家曾敏之先生题写书名，为本书增色不少。

为了配合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以及广州市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在2011年8月19日，伍汉持殉难日举行纪念展览的开幕典礼，这本极具纪念性质作品，因为受到时间的局限，难免有挂一漏万的不足之处，还望研究民国史的历史学者不吝指正。

最后我要向妻子和我们的长子表示感谢。他们二位在电子扫描，和整理照片资料的工作上，给了我杰出的帮助。

没有以上这些机构和每一位个人的协助，我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这本传记的。在这里我要重复地再说一次，带着沉重的心情，表达我的感慨，我的感动和我的感恩。

历史忠贞的传承 视死如归的正气

孟子(公元前371—289):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岳飞(1103—1141):“岳母刺字”和“精忠报国”是千年来的佳话。他被秦桧以“莫须有”罪而被害。

文天祥(1236—1283):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摘自“过零丁洋”

史可法(1601—1645):回答多尔衮招降的千古名言:

“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掸，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健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奚昭鉴之。”

在他就义之前，曾高呼：“我史督师决无降理。”

秋瑾(1875—1907)——在6月4日曾给徐小淑留下绝命词:

“虽死犹生，牺牲是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林觉民(1881—1913):参加黄花岗3.29起义前，为妻子留下的与妻书。

伍汉持就义前慷慨陈词

伍汉持(1872—1913)：1913年8月19日在天津就义前，和行刑营长的慷慨陈词：

“我众议员伍汉持也，无罪，以劾袁世凯，为杨以德，王廷楨捕禁天津二十日矣，未尝作乞怜语，今死，我非畏死者，愿以一枪殪我，我死，毋与盗匪并瘞，识瘞所为示后人访我者。”

随后留下遗嘱：

“我以劾袁世凯而死，死于职权，泰山鸿毛，自有公论，人莫不有死，今以一枪毕命，不犹愈于辗转床褥求死不得者乎，勿哀，但教育子女自爱，爱国，爱党可矣！”

伍汉持

民国二年八月十九日



伍汉持烈士遗照（注01）

民族魂(代序)

辛亥革命百周年的启示

中国京剧里有一段唱词：“**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个**小圈圈**。**”借用来形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演变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中华民族在这大圈圈和小圈圈里如同滚雪球般地旋转，逐渐形成了一部满含辛酸的历史。虽然也曾有过清明的帝王，也有过“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传言。然那宰相肚里更多的也许是阴谋诡计，于是形成了连环的圈圈，里面包含着封建制度中的宫廷斗争，家族倾轧，官场虞诈，官商勾结，买官卖官，造成天灾人祸，百姓被蹂躏，社会被践踏，随着岁月的流动，却轮番上场，循环不息。给中华大地凝聚成一套无可奈何的经典处世哲学。

层出不穷的派系斗争，前仆后继的以权谋私等等弊端，造成民不聊生无穷尽的祸乱。自古以来，派系的大圈圈里互斗不算，即便是派系自身的小圈圈里磨擦也比比皆是。数千年来，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貌合神离的致命点。孙中山先生就曾感叹说：“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大圈圈

里的内耗，小圈圈里的打击异己。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权力的自我膨胀，从而稳固既得的利益。形成一个地位—权力—利益的‘三名主义’。

孙中山先于1905年在‘民报’发表了他的三民主义全文，而到1923年1月2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自己的党章，其中包括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于1917年发表了建国方略，其中的“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先生用英文撰写的，题为：“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后来由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和马君武等的翻译才有中文本的出现。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寄予厚望，然而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他感到宽慰。因此在他临终前，曾给后人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意味着革命道路的艰辛，虽然腐败的满清被推翻，但是在革命阵营里仍然是四分五裂，各怀鬼胎。要想统一中国，实现民主，走向共和谈何容易。而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一连串地经历了洪宪帝制，护国讨袁之役，新旧约法之争，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军阀割据混战，充分体现了地位—权力—利益的“三名主义”。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无法实现。

军阀割据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中华大地再次陷入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裂痕渐大，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理应政党间和睦相处，共建中华。然事与愿违，好景不长，

两个政党大圈圈里再次摩擦，内战烽火此起彼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华大地上兄弟反目成仇，再次为地位—权力—利益而不惜兵戎相见。好不容易盼来了全国解放，世世代代盼望的繁荣昌盛已近在眼前，却又被政党内小圈圈里的政治斗争，自相残杀，逐渐演成近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批不学无术的混球，几乎将中华民族带到崩溃的边缘。而海峡那边，虽然自称发展，却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卵翼下求生存，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岛上，政党间的小圈圈还成日闹得暗无天日。

改革开放政策在1978年的实行，共产党痛定思痛，不开放无以面对世界，不改革人民永无安宁之日，孙中山先生毕生的革命，目的只有一个，不仅推翻帝制，更重要的是建立富强的共和体制，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地位，使人民从此摆脱千百年来的贫穷落后。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国的发展令举世震惊，赞叹。共产党逐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在1917年写的实业计划中的理想。证明了只要摒弃大圈圈的歧见，中华的复兴指日可待。

时至今日，恰逢辛亥革命百周年，然而中华大地虽有共和之名，却没有统一之实，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遗言，仍然是后人奋斗的目标。究其根源，不外是政治理念的分歧，个人恩怨的冲突，这都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封建意识所左右，难以脱胎换骨。穷其所以，无非是仍然因地位—权力—利益的作祟，而缺乏容忍宽宏的大度。多少年来两边都存在着严重的门户之见，歌颂

自己，贬低对方，而貽笑国际。

因此之故，历史的被忽视，被扭曲，被篡改，历代以来的恶习仍层出不穷。过去一百年来，固然革命烈士造就了许多可歌可泣，感动天地的伟业，但也有更多灿烂的革命事迹被湮没在政治斗争的狂澜中，其中难免掺杂有私人的恩怨，或是党派的歧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泰斗司马迁就用了毕生心血写就的“史记”告诫后人，历史是不允许被篡改的。它是人类衍进过程中的记载，不容有任何的掺假，因为最终历史必会呈现它的原貌。

伍汉持烈士的被遗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也许是无意的疏忽，也许是故意的漠视，也许两者都有。但不论如何，这一段历史的被遗忘是事实。也是遗憾，其中包含着家属的反应，看成是对先人的践踏，是对烈士后人的轻视。而留下无言无泪的苦楚，如尖刀般，在后人的心灵上，划下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这伤痕中包含着无奈和悲伤。更包含着缺乏对民族历史的尊重。烈士奉献出他短暂的生命，为的是民族的未来和百姓的福祉，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的财富，更没有为家人创造享受的条件。他的牺牲和其他烈士一样，是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的展现，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了民族的前途。这里面没有大圈圈或者是小圈圈的分野，希求的是民族的团结。

然而伍汉持的家人，却因为动荡的时局和政治的纷争，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这代价中包含着政党之间的门户之见，和无法

磨灭的仇恨情结，导致烈士的遗孀被扫地出门，儿女要承受牢狱之灾和莫须有的罪名。而纪念烈士的医院也被充公，烈士的长眠之地，也因为社会的利益驱使而被挖掘一空，至今仍然如孤魂般地无处安息。难道这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故意的漠视？说实在的，这两者都有。

在这里我要记录一段毕生难忘的对话。那段对话也奠定了我写这本传记的基础之一。那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二十四日的上午，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先生和他夫人经普椿，请我在北京饭店共进早餐，在餐桌上，他和我谈了不少。



1978年和廖承志、经普椿伉俪在北京饭店合影

廖承志主任的先翁廖仲恺先生和伍汉持都是同盟会的会员，也是建立共和的革命同志。他的先翁和伍汉持烈士牺牲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和烈士遗孀李佩珍，以及他们的女儿伍智梅成了莫逆之交，而廖承志先生和先烈的次子伍伯胜在广州同窗，也是打网球的伙伴。所以我在北京拜访廖承志先生，实际上是以晚辈的身份拜见长辈，也因此和他二老共进早餐时气氛分外地亲切。仿佛是家庭式的团聚。他在席间不时问起我岳家这些年来情况。

他也向我提及几个青年时代的老同学姓名，他只记得这些同学生活在加拿大，虽然失去联系多年，但仍然时常惦念着他们，而且很希望能有机会和这些同学重聚。说起来也还真巧，在他提及的姓名之中，还真有一位和我经常来往。尤其是伍伯胜夫妇每次到温哥华的时候，这位老同学一定会和我们相聚。所以我在回到温哥华之后，立即和他联系，转达了廖承志先生对他的问候，也因此他和廖承志先生取得了联系，并且去了北京，和老同学重温昔日的友情。

我为廖承志先生寻找到青年时代的同学，这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干部眼中，认为我是为中国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统战工作。而且是在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我的这份“统战工作”，当然是意义非凡，但对这样的恭维，我觉得份量太重而无法接受。

那次和廖承志前辈的会晤，也奠定了我后来三十年的文化交流工作基础。其中包括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接待来自广东省的一个代表团，我为他们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代表团团长在席间，和我私下谈起伍汉持烈士陵园在广州被毁的事。也对家人于1930年时代，在北美洲募款建造的广州伍汉持纪念医院被政府没收一节随便聊了一阵。他很坦率地告诉我，假如烈士的家庭，有李宗仁，白崇禧那样的权势，只要我们提出，政府方面肯定会立即发还。他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对外统战工作是很现实的。

时隔已经三十年，我却永远忘不掉这位官员所说的那番话，因为他的诚恳和坦率，我深为感动，也使我对他一直肃然起敬。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的职责范围很有限，他所执行的也就是政府颁布的政策，很多的事他虽愿意做，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处是无法向外人解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及家人每次到广东，和有关方面接触和交涉伍汉持烈士陵园或者是医院财产的事宜时，感受到的只是敷衍和回避。更增添我对那位官员因他的坦率而始终在我心中留有无数的怀念。

伍汉持烈士从他开始行医，到参加革命，直至殉难，在短短四十年的生命中，他活得很充实，完全无私地奉献在革命事业上，为的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他开业行医，为的是扶病救伤，尤其是对贫苦民众，更是爱护有加。甚至能不避个人安危，远涉东北救治瘟疫患者。他从没有想过为自己建立权位财势，留

给后人的是光明磊落的精神和宽宏大度的胸襟，以及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怀，作为他的后人子孙。我们引以为荣，而且感谢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从他的殉难，到建立共和，已走过了一百个年头，这一百年来，共和体制的逐渐完善，是自推翻满清后的一脉相承，为此，我始终有个问题在脑海中徘徊，那就是当我们在怀念先烈的时候，难道真的要有门户之见？不论是哪个政党，不论是如何牺牲，烈士们的奉献目标只有一个——建立富强的中国，那么我们后人在怀念他们的时候，非要在他们身上强烙上一个不同的标签，或在他们的身上强加一个立场？那么我们必须自问，对这样怀念先烈的态度是否有违厚道的传统观念？

然而……

前言

曾在1911年4月27日(即阳历3.29)广州起义一役中，以先锋队第三队队长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并占领观音山阵地的同盟会会员莫纪彭先生(1885-1972)，在台北接受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聿均先生长达三个月(1961年5-7月)的采访，将他口述的历史记录，由谢文孙先生记录，郭廷以先生校阅，成为中央研究院现代史研究所第64部口述历史丛书。在1997年出版。在这本历史的记载中，他几次描述了伍汉持烈士的事迹，给以崇高的评价，并尊称伍烈士为“**东方宪法之神**”。(注02)

满清覆灭了，民国建立了，国会组成了，全国沸腾了。共和体制带领老百姓走向富强康乐的未来。伍汉持也被广东推选为第一届国会的众议员，和其他的议员一起走进了庄严的议会殿堂，对刚呱呱落地的民主政治充满了喜悦的憧憬。然而在他踏入议坛的那一刻，他即已感受到那里布满了大圈圈和小圈圈，而且是乌云密布，危机四伏，显示中华民族的前途仍然是荆棘满布，前途堪忧。和他在从事革命时期一样，他的正直，他的坦率，他的无私，还有他对民族的关怀，使他不畏权势而振臂奋战，仅仅是四个月的时间，他就成了第一个为维护宪政而流血的国会议员！

风雨飘摇的第一届国会

那是1913年4月8日，在北京新建立的议会大厦中，274位参议员和596位众议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经历了四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大地，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忘我的革命



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

烈士前仆后继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后，创建了民国，产生了第一届民主宪政，为中华民族的共和体制开创了崭新的面貌。代表云南省的参议员杨琼被公推为临时主席，主持这一历史性的议会开幕典礼。在108响礼炮后，袁世凯派梁士诒到会，代表他登上讲台致词。其中有这么一段令人鼓舞的讲词：“**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的莫大光荣，四万万人民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之一分子，当与诸君同深庆幸。**”讲完后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在大会中还选出民主党的议员汤化

龙为众议院院长，共和党议员陈国祥为副议长。

就在这举国欢腾之前，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也是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宋教仁，3月20日晚上在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和袁世凯共商国事。当时廖仲恺，黄兴和于右任等高层人士都在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当一行走出车站专为议员设置的休息室时，时间是晚上10时25分，宋教仁在众目睽睽下遇刺身亡。他的遇刺，不免让人产生联想，认为这件暗杀肯定是袁士凯在后面指使，致令刚诞生的共和议会蒙上阴影。而就在国会开幕两周后，袁氏筹划的“善后大借款”也在北京展开。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和外交部长陆征祥，在4月26日和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五国的银行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进行谈判，一直到27日的凌晨才议定了具体的条款。

借款的合同里，五国银行同意向民国政府提供2500万英镑借款，年息为五厘，借款期限为47年。但借英镑。如再把以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还有为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的费用等等予以扣除，中国拿到的借款实际上已不到一千万英镑，如加上到期的还本息，总数将高达6789万英镑，和庚子赔款条件相比，简直无法想象。而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一向外借款的整个过程，送到议会讨论而予以合法化，只是在他一手遮天下就这样完成了。

因为革命的成功，国民党功不可没而深得人心，于是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多数席次。两院中的党派及

席次的比例大致如下：

参议院：国民党123席(44.9%)，共和党55席(20%)，统一党6席(2%)，民主党8席(2.9%)，跨党者38席(13.8%)，无党派44席(16%)。

众议院：国民党269席(45.1)，共和党120席(20.1%)，统一党18席(3%)，民主党16席(2.6)，跨党者147席(24.7)，无党派26席(4.3)

从上述的两院议席比例来分析，对袁世凯的野心势必造成无比的阻力。于是他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直接领导的军政执法处，设立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任命他的心腹陆建华担任处长，霍占一为侦探长，这个组织类似于现在所称的特务机构，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可以随意抓捕人，不需要经过审判或者法律程序，就可以对嫌犯执行处决，也不需要通知家属。就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两院大部分的议员，对其倒行逆施，只能禁若寒蝉而谈虎色变。

就在此时，议会中来自广东的众议员伍汉持，深感受人民的委托，理应在议会中执行议员的职权。他深感宋教仁在上海的遇刺疑点甚多，于是在国会中，伍汉持提案要求用法律程序调查宋教仁案。接下来要求国会对袁氏向外的“善后大借款”一案提出弹劾。因为袁世凯漠视国会的存在，竟然在没有经过国会讨论通过的前提下，已经先签了字，随后才派代理总理的陆军总长段祺

瑞到国会答复，走一个程序，无视议会的尊严和议员们的职权。

由于袁氏的庞大势力，肆无忌惮地使用金钱收买议员，在国会为所欲为。作为其从临时大总统晋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布局。在这样的威迫利诱境遇中，大多数的议员只能委曲求全，明哲保身，而自求多福。实际上自从推翻满清后，革命的群体中，仍然脱不了封建思想的钳夹，派系，地方关系的斗争层出不穷，对民主共和的观念仍然处于懵懂阶段，经不起袁氏的胁迫，结果是或者投降靠拢，或者是避走它地，天津也就成了一些议员的避风港。

伍汉持议员也受到袁氏爪牙的威迫利诱，并拟用重金收买，但被其严词拒绝，并坚持提出对袁世凯弹劾要求其退位。悲哀的是国民党议员虽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对袁氏的胡作非为也只能噤若寒蝉，因此伍汉持所提的弹劾一案，只有十多位议员敢于联署，而且提案交到议长汤化龙办公室后，却再也没有了下文，不言而喻。这位议长实际上就是袁氏在国会中布下的一枚棋子。

他那广东人的倔强个性，留给袁氏的是激愤，嫉妒和仇视，导致最后的杀身之祸。虽然天津当时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避风港，当时革命报人冯自由预感伍汉持处境的危险，也游说他前往天津暂避风头。（注03）伍汉持是在8月1日前往天津的，但并不是为了逃避袁世凯的毒手，而是因为友人生病，特前往为其诊治，却未料到当地的袁氏爪牙已经布下陷阱，并将其绑架，囚禁

近二十天，而在1913年8月19日，将伍汉持秘密押到距天津十里地的韩家墅予以杀害，时年仅42岁。成为共和开国以来，为维护宪法尊严，为建立议会公正而第一位流血牺牲的国会议员。从1913年4月8日国会的开幕，到他8月1日在天津被捕，他在那堂皇的议会大殿中，只坐了116天。在他殉难后接连又相继有徐秀钧，林文英，姚勇忱，徐镜心等参众议员被害，成为共和开创第一届的国会最黑暗，最悲痛岁月。最终在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了国会，成为中国民主共和开创之始的第一届短命国会。

台山——一个充满血泪的城镇

在中国人的眼里，历来对广东看成是一个强悍好斗的地区。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命运和广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因此广东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骁勇善战而不怕死的勇士。

实际上，广东地区有着漫长的历史，在大约十九万多年前，当地就出现了早期被称为“马坝人”的古人。在商，周时代，他们的先民就已经和中原地带有了经济文化的交往。到春秋战国时代，广东和吴、越及楚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交往频繁。尤其是和楚国之间，在军事和政治关系非常紧密。这说明广东实际上已拥有两千多年的文明，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蛮荒之地。在历史上，“吕氏春秋”称广东为‘百越’，“史记”中称为‘南越’，“汉书”中则称其为‘南粤’。

台山原来的名称是新宁，它的地理位置在广东的西南角，临近海滨，和开平，新会及恩平统称为‘四邑’，素有‘侨乡’的美称。新宁在岭南已经有两千二百年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9(秦28)年，就施行了“南尽北户”的政策。五年后(公元前214)开始设置桂林，象和南海三郡。这是岭南历史上

开创了划分行政区的先河，广东省，包括新宁都隶属于南海郡，这一行政划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用到明代。到明弘治十二年（1499），广东改制设立了十个府一个直隶州。统辖七个州和七十五个县。其中包括新宁县隶属于广州府。

到民国3年（1914），由于在湖南和广西都有同名的县城，所以将广东的新宁改为沿用到今天的台山县。目的是避免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山又先后隶属于佛山专员公署，江门专员公署和肇庆专员公署，直到1983年5月5日，因为修改了市管县的体制，成立了江门市，台山也成为七个县之一。到1992年台山县被撤消，改为县级台山市。

广东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连绵的战争和自然的灾害，为了生存，经过了经年累月的奋斗，广东人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而且疾恶如仇，有浓郁的族群理念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撇开远古的经历不谈，就打自明嘉靖以来，先有海上倭寇连番不断骚扰，甚至奸淫杀虏，焚烧打劫，搅得当地民不聊生。接着有当地官吏贪生怕死，导致倭寇肆无忌惮的猖獗肆虐。这样的外侮一直延续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因为邓子龙的骁勇杀敌，才将海上的敌人平定。

到明清时代的咸丰四年（1854）后，新宁又发生当地的土人和客家人之间，因为争夺土地而发生连续十二年之久的械斗惨剧。这一连绵不断的地方械斗，从清咸丰五年（1855）三月到同治

六年（1867）二月，十二年中互相杀死人数在二万三千人以上。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就在这时候，有发生疫病流行而致死的在二万人以上。导致大量居民流落他乡，客家人则被当地土人俘虏后卖到中南美洲的人数达二、三万人之多，后来凡是将华人运送到美洲去时，就被称为是“卖猪仔”，这一名称就是从新宁地区的土客械斗所造成的后果而起。

由于满清的腐败，国力日衰，不平等条约的接踵而至，鸦片烟的祸害导致国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社会已到了民穷财尽的边缘。于是广东的四邑民众纷纷外出寻找生路，甚至远涉重洋，渐渐地被冠上华侨之乡。而稍有政治理念的青年，为了救国，则走上革命的道路。新宁，这个距离海洋不远的小城镇，就涌现了一个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伍汉持就是其中的一个。

伍汉持的青春岁月



伍汉持家庭保存照片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在什么特定的时代中，必定会产生什么样的特定人物。十九世纪末叶，整个中华大地处于贫穷，无知的时代，任凭洋人欺凌勒索宰割，朝廷官员仍然是醉生梦死，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伍汉持就在1872年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来到人间。他的父亲伍文挺，是广东省新宁县斗洞村的斗山乡人。

他在八岁时开始读书，到十八岁和同乡横塘村的李时植女儿李佩珍结为夫妻。结婚后双方感情甚笃，到二十一岁时，家中希望他能进入仕途，鼓励他学习举试，也许是他兴趣不在这方面，结

果不很成功，第二年放弃，计划改为作育人才的工作，但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于是在23岁的那年，他到广州在惠师礼教会（Wesley Methodist Church）听道，受到感召而接受了洗礼。实际上当时的教会中，许多会员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如为革命牺牲的史坚如等都是基督徒，其实他们加入教会接受洗礼，目的并不在宗教的迷信，而是受到耶稣为拯救世人而被钉上十字架的牺牲精神所感召，因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使命，也必须要具备无畏的牺牲精神，所以教会在那个时期，无形中成了有志革命年轻人的依归，伍汉持也没有例外地加入了这个阵地。

第二年他进入佛山镇的英国惠师礼教会医学院开始学医，开始时授业于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Kerr）后又师从晏惠霖和安德生两位英国大夫，毕业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第二年他在开平单水口开业行医，从此奠定了他矢志济世救人的心愿。然好景不长，适逢庚子拳匪之乱，全国到处是兵荒马乱，广东也未能幸免，因为拳匪的目标主要是洋人，而他的诊所是西医，被看成和洋人有不寻常的关系，也因此难逃一劫而被抢劫一空。在他开创行医行业的时候，曾计划自食其力将工作所得收入作为日后前往日本进修的费用。不料拳匪的这一番抢劫，面对窘迫又惊恐的现状，他只得放弃先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前往日本深造的计划，决定改往香港暂行避难。

他的革命经历

他到香港不久之后，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选择在油麻地悬壶行医，由于他的医术高明，深得当地人的信任。当时正值革命志士史坚如（1879-1900）在广州因谋炸广东总督德寿未果而殉难，他的哥哥史古愚前往香港避难，并持奉母亲和抚养妹妹史憬然（1881-1902）。不仅兄弟两人参加了革命，他们的妹妹史憬然，也加入了革命阵营兴中会。因为革命工作关系，认识了陈少白并在1900年两人订有婚约，不幸在1902年，史憬然因患霍乱而病故，至此伍汉持在结识史古愚后，萌生革命的意念，并开始秘密筹划组织革命党人的工作。

这时候适逢南非洲在香港招募轮船上工作人员，伍汉持前往应征，被录取得行医的职务，专门为船上华工进行卫生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他暗中在工人群里宣扬革命，并招募革命志士，以便日后回国举事。到壬寅年（1902），他和史古愚，马达臣等革命志士在广州举事，伍汉持并于此时慨然剪去辫子，并改变服饰来表明心志。

伍汉持于1903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基督教会，对于这一重要事迹，香港中央图书馆珍藏的‘香港基督教会史’，有着详细的记载。（注04）伍汉持是看到从上海传到香港的上海基督教会成立的简章后，认为教会要依赖外国人，是中国人的耻辱。于是在1903年的4月，伍汉持和谭民三，萧敬宗等好友，在香港油麻地组织了中国基督教会支会。

满清末年的时候，西方的基督教蜂拥传入中国，主因固然是因为满清积极弱无能，外国利用他们的船坚炮利而入侵中国，在中国人的眼力，教会就是外国势力的代表，而洋教的进入中国社会，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担忧中国的民族思想从此趋于泯灭，而信奉洋教的中国人也被挂上‘洋奴’的代号。事实上西方宗教在十九世纪末叶传入到中国时，不仅没有毁灭中国的民族精神，相反却因为西方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震醒了昏睡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海外的侨胞，他们信仰了基督教，但并不是仅局限在向自己的同胞传达精神的寄托，也就是所谓的‘宗教信仰’。他们向海内外共同努力去挖掘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而要用什么方法去为中国寻求解决这些问题？

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思考，激发了忧国忧民的民族思想。于是他们在外国筹措资金，汇到国内建立教会，就因为基督教在中国，尤其是广东方面的建立，从宗教的信仰，启发出他们的爱国情操，认为要挽救病入膏肓的中国，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革

命’的手段，而在当时这一名词还只能局限在‘作乱’的层面。

当然在以宗教为依靠的革命组织，应当说其动力是来自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为了拯救人类的罪恶，耶稣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崇高的殉难精神，感染了教会里的中国信徒，使他们感到，要拯救中国，必须以教会的殉道精神，转换成救国救民的革命动力，甚至因此而殉命也在所不辞。

但仅仅简单地将西方教会直接传入到中国，对充满革命救国理念的青年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终究是个外国的宗教团体，其宗旨和目的都无法和中国的现实社会相配合，在中国的教会工作必须能达到符合国情的要求。为此，当时教会中出现了‘自理运动’和‘自立运动’两大发展趋势。

所谓‘自理运动’就是有西方教会组织背景的教会中华人信徒，以原有的教会组织宗派名义进行宗教本土化运动。而‘自立运动’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些分属不同宗派的华人信徒，在自己宗派以外，‘自立’部属原有教派之总会。

因此英美国家的教会，在纷纷来到中国建立教会的时候，‘自理运动’的教派有‘伦敦会’，‘浸信会’，‘美北长老会’和‘纲纪慎会’等组织。中国的‘自理运动’起源在广州佛山，当时在广州已经有该会在1839年建立的惠爱医院，聘请了来自澳洲的梁柱成负责医院的布道工作。梁先生认为中国人要自理自己的教会，所以在香港伦敦会华人信徒的支持下，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的

华人自理会，于1876年在佛山成立了。

在其它自理会的支持下，革命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并在香港创办教会报刊，实际上就是宣传革命的刊物。而孙中山，陆皓东等人也在那时候领洗，成为纲纪慎会的信徒。

至于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对革命事业更趋积极，教会中的牧师实质上就是革命党人。直接参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神圣任务。这其中包括‘耶稣救世会’，‘巴陵会’等。在此期间，湖南辰州在光绪28年。因为洋人在当地肆无忌惮的作威作福行径，同时因发生瘟疫而引起民愤，最终导致两名外国传教士被杀害，而当地政府被迫赔款，兴建教堂，并惩处所谓的‘凶手’，是为著名的辰州教案。

这一被认为是导致中国丧权辱国的教案，激发了各地的精英，上海的爱国基督徒高凤池，黄家珮，谢洪宝和宋跃如等，在1902年发起建立了‘上海基督徒会’，副会长宋跃如是孙中山在上海的革命秘密同志，利用教会的掩护，支持南方兴中会的起义壮举。

上海基督徒会的成立，以及湖南辰州教案的刺激，推动了伍汉持创立教会的决心，于是在1903年4月，伍汉持合同革命党人宋居仁（1854-1931），谭民三，黄其馨和谭思义等人，联合上海中国基督徒会，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基督徒会’，公推伍汉持为会长。该会在香港成立后，依照上海的会章进行布道工作，经常

集合在陈典芳和萧警钟两所学校里作祈祷会议，并携带乐琴到街边或是海边宣道，周日则列队到附近的村落布道，开启了教会自主的传教风气。基督教公论这是中国基督徒会的创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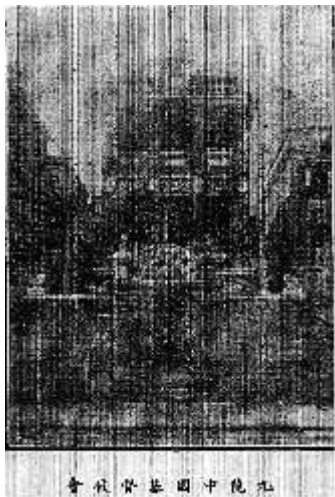
伍汉持在香港传教和革命时代的照片（注05）

第二年（1904）可以称为是中国基督徒会的创立时期，教会在自立发展中，吸引了八十多人加入，于是伍汉持等在当地的差

馆南街37号楼下租赁了房子作为教会场所，并创立了华英学堂，作为学生学习福音的基地，白天授课，晚间布道，周日就请各会牧师讲道。还另创立了体育会，伍汉持亲自教授兵式体操，这是其它教会中所没有的。他带领学生会操，并将教会比喻为训练革命人才的基地。这所教会的领导人物大部分是革命党人，伍汉持最为积极，宋居仁原来是巴陵会的传道人，后来转入到中国基督徒会，还将他的两个儿子宋少殷兄弟两人都加入了革命行列，后来都在民国初年相继殉难。

中国基督徒会的正式成立，应该是在1905年。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成绩斐然，原来的会所已不敷应用，于是将华英学堂迁移到差馆北街，还增设了宿舍。同盟会的会员刘维护炽(1892-1955)和宋居仁的长子宋少殷都是华英学堂的学生。学校迁移后，在4月11日特别欢迎邓祖牧师义务主礼，并接受新信徒。每当周日就分别前往各乡镇传播福音。

到了1906年的12月，邓祖牧师前往海丰为当地的信徒设立中国基督徒会分会，当时接受领洗的信徒有五十六人。这时候伍汉持已经决



九龙中国基督徒会会址（注06）

定回广州开设医院，同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他得到广州张竹君的南福医院支持，除了对社会提供慈善医疗外，还设立了中国基督徒会支会，在当地宣扬福音。伍汉持夫人李佩珍就是在那里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

这时候革命兴起，革命党人必须四处奔走活动支持，教会里的工作受到影响，学校里的工作也几乎停顿。然在香港创办教会的这段经历，更坚定了伍汉持日后在革命的历程中的理念和决心，也培养出他那不屈不挠，疾恶如仇的忠贞信仰，以至于到他被袁世凯暗杀就义前，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充分展现出一个革命志士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豪迈之气。

遗憾的是在上一世纪，位于广州市东风东路肿瘤医院庭园中的伍汉持烈士墓地，在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无知的红卫兵暴徒砸毁。据作者的分析，烈士墓被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墓碑上刻有红色的十字架，暴徒们的直接反应是，这座墓园肯定和外国帝国主义有关联。其实正暴露出那些毁坏他人墓园的暴徒的不学无术。



伍汉持纪念医院 (即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在寿终正寝前的最后遗容 (1980年代)



红卫兵对烈士陵园的“艺术杰作” (1967年)

实际上红卫兵在毁烈士墓之前，也只是医院中有关烈士硕果仅存的遗物，因为伍汉持纪念医院早在1951年被没收，而且所有的历史遗物也没有保存下来。这都是因为对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懵然不知，不仅是时代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更何况伍汉持在1903年创立的香港中国基督徒会，是当时最为突出的自立教会，其宗旨是自治，自养，自传。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中国施行的三自爱国教会的先河。

经历了不寻常的革命斗争，伍汉持在香港获得南非轮船公司的职务，往返于非洲的航行上，担任轮船上的医生职务，在这段岁月中，他利用在轮船上工作之便，培养了相当数目的革命志士。一直到三十三岁他才计划回广州，利用行医的方式继续暗中从事革命工作。决心已定，他毅然从香港回到广州，在旧仓巷创立了“图强医学堂”，并兼办义诊事业，当时他收录了四十多位男学生在他的教导之下习医，其中有革命志士陈逸川，周演明等人。还有革命烈士严确廷在那里担任医师职务。严烈士是广东惠州人，在家乡开设了寿康西药房，掩护革命工作。后来因为运送枪支给革命党人事败被捕，在1911年的广州起义前一晚被两广总督下令斩首，后来和其它烈士一同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所以伍汉持在广州经营的图强医院，和革命事业是密不可分的。（注07）

虽然他全心全意投入到革命斗争中，但仍深感要服务于社

会，单有医术治病是不够的，应该增进知识的范畴，尤其是在革命空气弥漫的时代，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人，都投身于法政科目的学习，伍汉持也不例外，于是在1905年进入广东法政学堂，专习政治经济科目。他在进入法政学堂前，还有一段极富有人情味的经历，当时清廷对革命党人的禁令稍为松弛，革命党人崔通约伺机从日本秘密潜返广东，到广州市图强医院拜访了伍汉持，在交谈中伍汉持向他提到进入法政学堂的愿望，正好崔通约和当时担任校长的贵州人士夏同龢有同学和亲戚的双重关系，于是带了伍汉持前往拜会夏校长。经过了解之后，校方破例收录了伍汉持，也因此有机会和陈炯明成为同学。（注08）

当时的满清地方官员水师提督李準，大肆捕捉革命党人，并予以滥杀，革命党人都愤怒不已，必将之铲除方感快慰。于是在1907（丁未）年四月，革命党人刘师复和法政教员张树龢以及张谷山和张伯乔等共同密谋炸死李準。也是偶然的巧合，李準经常往来于旧仓巷，离伍汉持的图强医院不远。刘师复等就计划在李準经过该地的时候，施以暗杀，并且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先将给汪精卫和家人的遗书写好，并在图强医学堂附近的凤翔书院密设机关，在那里制造炸弹，伺机展开暗杀行动。

同盟会元老莫纪彭（1885-1972）先生在台北的回忆录中，对刘师复筹谋暗杀清廷官吏的这段经历，有这样精彩的描述：

“师复于民前三、四年，由日本回到广州。为了要与目标接近，就

在距离水师提督行辕不远，一个转弯的街坊旧仓巷，一条横巷里赁得一间小屋。约有几个同志在小屋里制造炸弹。已经制成两颗了。后来因为小许剩余的水银粉留在铁炉里未清，砰然一声，把铁炉炸成粉碎，有一碎片打中师复左手，受极重伤。左手有一块肉被炸去。而这块肉斜飞粘在墙上，仍然血滴淋漓流，本身如一个血人，倒在地上。说来稀奇，在这样重伤之下，神智却异常清醒。直到邻家一位医生伍汉持来小屋救伤时，师复清醒醒一事又一事告知他。两颗制成品放在那里，室内革命文件储藏在那里。说完过后，又请求伍医生把两颗炸弹投下屋后水井中。一切违禁物品悉数移去。汉持一面救伤，一面遵办后，恰好来得及，这时警察始入户搜查。”（注09）

刘师复受伤后，张谷山慌忙前往图强医院请伍汉持尽速前往救治。在此之前，伍汉持与刘师复和张谷山等人素不相识，也不知他们的革命背景，于是带了学生陈逸川，周演明等前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枪伤，后经刘师复自己的说明，才了解到他们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与此同时还在床席下露出几封书信，都是刘师复等事前写好的遗书，伍汉持急忙和学生陈逸川分别把他们的遗书转交给了汪精卫。

这时候警方出动大批员警，立即将刘师复先行送到韬美医院救治，同时怀疑此事和图强医院必有关连，立即前往大肆搜索，发现加拿大温哥华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1864-1937)给伍汉持的信件，信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

巡警道龚心湛认定伍汉持有和革命党人串通的嫌疑，于是将其逮捕。这一段经过，崔通约在他“海生平”一书中第十七页题为‘伍伯胜博士说教述及其先人伍汉持烈士’文中有较详实的记载。那时候崔通约已经到加拿大温哥华，主持当地‘华英日报’工作，在这期间，和伍汉持经常有书信来往。（注10）

刘师复等谋炸广东水师提督事败后，因为在伍汉持医务所中搜出和崔通约的书信，认为他有通革命党的大罪，法政学堂的夏同龢校长得悉伍汉持被捕的消息后，感到事态的严重，如果不予以拯救，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于是夏校长挺身而出，说明伍汉持的确是崔通约的介绍而认识的。但是医生救人是一事，而革命又是另一回事。假如官方认为崔通约是革命党人，夏校长本人既然是他同学，岂不也成了革命党人的嫌疑之列！而当时李準因为这起密谋是以他为目标，极为愤怒，下令严办查处。但碍于夏校长的社会地位，最终同意让法政学堂校长夏同龢及教员杜之杖，古应芬，朱执信等人联保以及学界的支持，才将伍汉持予以开释。

粵軍已於二十年前捕獲已斃支匪調准漢委
 ○伍漢持為學界所保釋 法政學界伍漢持
 被捕一案學界多抱不平 誌前報聞初由國
 強督學處及省署若坊家願保均未省釋法政
 同學益切公憤昨日督名具保者二百餘人復
 由省城官立各學堂一聯而署名者均為法
 政教員兼監學社員石領勳分稟夏監督李水
 提巡警局三區而夏監督亦深信伍之為人遂
 日親在李水提處督局力保警局將案撤覆
 屬督大憲亦主和平并高伍表其甚力故學界
 公意遂從期於初五晚經督局親總辦并對
 伍云將來開辦衛生總辦聘請担任學部副伍
 稱出後深感學界熱誠之盛其擬擇日開辦茶
 會中謝云又聞伍被炸傷之李德山現在醫院
 醫治漸有起色其所錄之炸彈二枚經夜軍械
 局化驗謂非劇烈炸彈惟此等違警律之物既
 令不事深求已難免應得之咎我仍日日有警
 員往中法醫院嚴密偵探云

香港华字日报发布有关伍汉持因救治
 革命党人刘师复被逮捕的消息(1907年6月18日)

实际上，伍汉持烈士在为刘师复治伤前，就已经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在壬寅（1902）年就参与了广州的起义。因事败而退居到香港暂避风头。需要说明的是，伍汉持在1913年被袁世凯杀害后，一直到民国21（1932）年，同盟会元老胡汉民，在烈士家属为他移灵的时候，为烈士撰写了纪念碑文。在文中的第六行到第七行，叙述伍汉持在南非轮船上：“上华工医务，乃籍以暗纳党人图举事壬寅惠州之役。”这段描述显然将中山先生领导的两次起义浑为一谈了。（注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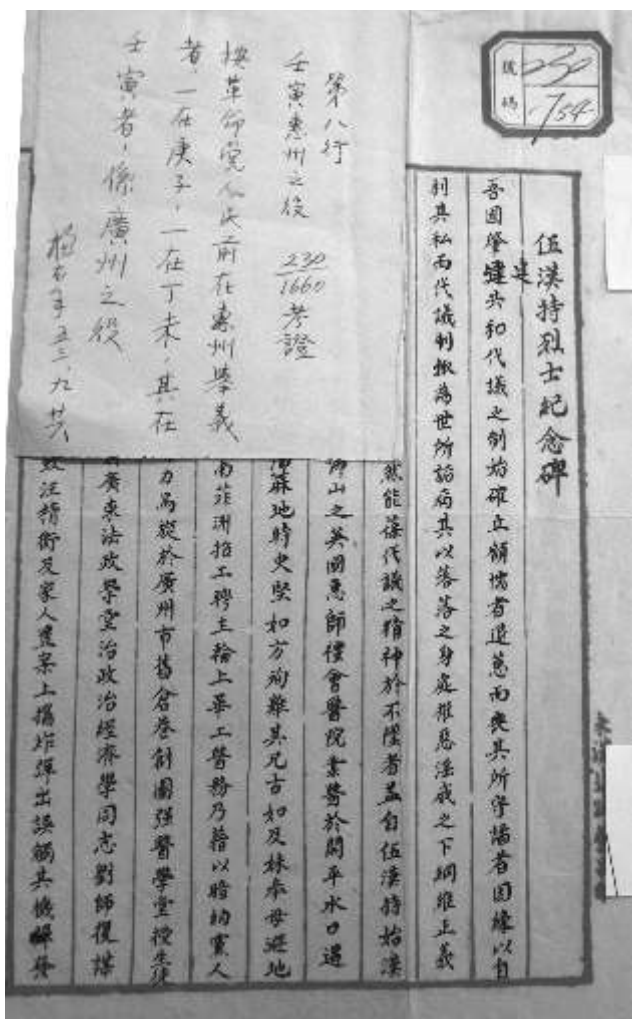
伍汉持是1900年在广东开平开设的医院遭受到拳匪洗劫之后，

前往香港，就在此时，孙中山委派兴中会骨干郑士良策划，联合三合会的会员，发动了庚子年的惠州之役。孙中山自己前往台湾设法给以接济。后来因为弹尽援绝，郑士良率领一部分革命份子退居香港。由于伍汉持初临斯地，还没有站稳脚跟，不可能直接参与是次的起义。

而壬寅年是西历的1902年，在洪全福(1836-1910)领导下发动的广州之役是在光绪28年的12月底，按照和西历的换算，应该是1903年的1月下旬。所以是次的广州之役，严格地说应该是卯癸年。说起洪全福这个人还颇富传奇性。他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族侄，在洪秀全得意的时候，洪全福还跟着转战各地，后来洪秀全被清廷追捕的时候，洪全福逃避到香港，然后去了古巴做苦力，并在外籍轮船上当厨师，就在行船期间认识了孙中山，并为其运输武器。

洪全福在香港，认识了从澳洲定居香港的兴中会会员谢绩泰(1872-1938)，早在1895年，他和另一为革命志士李纪堂(1873-1943)在谢府密商策划在广州起义，不幸事败。李纪堂是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个儿子，父亲去世后，他曾经继承了百万遗产，慷慨拿出其中的一半作为1903年起义的经费。

胡汉民在纪念伍汉持烈士的碑文上记述“州之役”错误，是值得一提并应该予以纠正。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里，笔者发现一位杨先生在1964(民国53)年9月26日考证时记录的便条，



胡漢民撰写的伍汉持烈士碑文考证便条
(注12)

与胡汉民为伍汉持烈士撰写的碑文原稿一起保存。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十次革命中，有两次惠州起义，分别是在庚子年和丁未年。

孙中山在1907年秋天发动了钦廉之役。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当地瘴疫流行，参与行动的革命志士，不仅负伤需要医疗，而且还要抵挡瘴疫的侵袭。有鉴于此，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致函冯自由，请他物色医学界的革命同志，支持为钦廉起义负伤的革命志士医治所需。冯自由(1882-1958)立即函请伍汉持到香港面商，伍氏立即派图强医院学生周演明代表到港商洽，并为孙中山慷慨解囊资助。

到辛亥年间，陈炯明，邹鲁，朱执信，莫纪彭，和叶夏声等创办报刊鼓吹革命，伍汉持也慨然捐输支援并为之奔走。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莫纪彭担任先锋队第三队的队长，负责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并占据观音山的阵地，彻夜奋战。然而广州的起义义务仍以失败告终。

黄花岗之役失败后，伍汉持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只得携家眷再度避居香港，等待革命时机到来东山再起。在这之前，孙中山先生深感革命事业仅依靠绿林豪侠的匹夫之勇，是无法产生革命凝聚力的。于是在1909年10月，在香港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策划1910年2月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新军起义，由倪映典指挥，也是因为仓促起事，三千新军提前起义失败。但这次的起义，为后来的香军起义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伍汉持在香港并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活动，继续和莫纪彭，林复君等革命党人，计划运动香山(即今中山)陆军反正，并邀约谭民三，叶夏声等在香港策划进行。革命党人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前，广东即酝酿独立，而广东的新军因为在庚戌年广州新军之役的失败，被清廷调到香山的前山，便于控制。到九月见机会成熟。于是发动前山新军起义。策反香军先光复香山前山，伍汉持率领革命党人，自香港通过水路参加了这次的起义。

根据莫纪彭的回忆，他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有“千只民船装载大军向广州进军，进至离广州四五十里有同志等来会报，中有伍汉持。他们不是从广州来，乃是星夜从香港赶赴大军所在。”(注13)。他们立即率部队前往顺德，并且向省垣挺进，于十八日光复了广州，第二天广东宣告独立。他们就率领部队驻守省城，并且将前山起义的新军和石歧起义军合编为香军，伍汉持还在香军中担任过秘书的职务。后来香军被编为广东北伐军，准备北伐，最后因为南北议和而终止。民国国会成立后，伍汉持是由香军推荐当选为国会议员的。

纵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十次起义中，伍汉持先后直接参与行动，或者是慨然资助，从来就没有任何的犹疑或退缩。这也造就他日后在北京国会中，挺身而出要求袁世凯退位以谢国人的勇敢行动。

他的行医历程

伍汉持从24岁在佛山英国惠斯礼教会创办的西医学院习医，27岁毕业后，第二年28岁就开始在开平执业，因拳匪之乱，他的诊所遭到匪徒的洗劫一空，被迫迁移到香港，在油麻地继续行医。后获得南非洲的轮船上医师职位，往返于大洋中，一直工作到33岁，除了为华工诊治外，主要是秘密宣扬革命思想，招募革命志士。就这样他直到35岁才得以回到广州，在旧仓巷创办了图强医学堂，兼办义诊业务。

伍汉持因救治革命党人刘师复被捕获释后，不久即和马达臣等创办了广东赤十字会，（即今红十字会的前身），专司救伤义诊等公益事业。他在1906年回到广州的时候，生活比较拮据，和妻子李佩珍住在旧仓巷一间极为简陋的木板小屋里，底层有三个房间，上面有层矮矮的阁楼。然而旧仓巷的地点很适中而热闹，是因为邻近家喻户晓的城隍庙。伍汉持就在小屋的对面租赁了一栋小屋，开设了图强医学堂和图强医院，但由于是租赁的房子，无法做长久发展的计划，经过了一段时间，伍汉持夫妇倾其所有，在临近购得旧屋一栋，预备未来建立医院作为义诊的基地。

他夫人回到广州后，先在基督教办的柔济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接生的技术，成为一名助产士。也因此后来在图强医院增设了附设产科专门学校，培养以当时的先进方式为孕妇接生。她不认识药名，但却能用鼻子来辨认药味。也因为她的勤奋，当时以及她先夫殉难后，在广州颇富盛名。人均以“师奶”称她。她还在校中亲自担任教职，从该校毕业的助产士专门人才有一百多名。



1912年图强医院助产士学校护士毕业照

在夫妇的惨淡经营下，于1907年生产能力开拓了华人在广东自创西医并兼办红十字会的先河，中国基督徒会也正筹划在广州发展建立支会。当时在上海的女医生张竹君获悉后，即将她在广东的医所慨然赠送给该教会，作为义诊所。伍汉持夫人李佩珍领洗加入了教会。

捨命参与1910奉天瘟疫的救治

当年东北发生骇人听闻的鼠疫，开始的时候，是根据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的建议认为是典型的‘腺鼠疫’，经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的疾病。因此东北地区下令老百姓有赏捉鼠的法令。申报在1911年2月6日曾经这样报道称‘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奖金’由就近巡警发给。‘在重赏之下，奉天一城市就灭鼠25,347只，全省灭鼠达80,972只。就在这时候，北京方面也通令老百姓：“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则不论死活一律“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而远在千里的汉口，官府也颁布了“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法令。然而这个法令并没有阻止鼠疫的蔓延，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当时清廷外交官施肇基早在1907年，邀请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1879-1960）回国，参加医学工作。伍连德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马来西亚行医。他抵达北京后，袁世凯聘请他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当1910年12月东北发生鼠疫后，因为蔓延的速度惊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吉林，黑龙江就已经有三万多百姓死亡，而且有向关内和国外蔓延

的危机。因此刚卸任哈尔滨道台的施肇基在外务部担任右丞，在12月18日即将此惊人消息传送给伍连德，并由清廷任命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负责东北防疫重任，

伍连德用科学分析，在显微镜下观察他解剖的尸体，发现了鼠疫的细菌。而且那细菌和一般的鼠疫有别，是经过飞沫传染，在人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他将这鼠疫称为‘肺鼠疫’。其死亡率较之平常的‘腺鼠疫’更为严重。于是他开始追寻细菌的来源，发现中俄边境有贩卖旱獭的交易。因为欧洲市场中旱獭的皮毛需求量大，因此价格飞涨。两国的商人和一些见利忘义的官员，开始大肆捕杀旱獭，从事捕杀的工人，大都是来自外地，缺乏捕杀旱獭的经验。按照动物的习性，旱獭一旦得病，立即会有睡眠，失声，行动迟缓等等症状。健康的旱獭会场立即将患病的旱獭逐出洞穴。有经验的猎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去碰触那些病旱獭的，因为它们身体上布满了细菌。俨然是一颗定时生化炸弹。

然而那些被私下招募的华工，因为缺乏知识，不仅贪婪地捕杀健康旱獭，就连生病的旱獭也一个不放，甚至还剥了皮之后，竟然将肉作为食物。就这样鼠疫一发而不可收拾，除了群居的工人因相互快速感染而致死亡的比率急剧上升外，当地居民家庭中也因为近距离的接触，导致传染而出现集体死亡的惨状。由于死亡人数的快速上升，加上当地天寒地冻，无法快速掩埋尸体，于是成千上万尸体暴露在空气中，成了另外一个细菌培养的处所。

伍连德医生有感情势的严峻，于是上书朝廷，需要立即采取加强防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焚化尸体，以及建立医疗机构收容病人的一系列措施。当时他的建议还遭到阻力，但朝廷最后还是接纳了他的要求，终于在1911年3月1日，由于伍连德医生的科学研究，使得这一场几乎失控的瘟疫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得到了有效控制，根据历史的记载，其间已经有50,927名居民死亡，加上日本殖民区228名，以及关内各省近万名死亡人数，共计有60,468名居民死于这场大瘟疫中。

当东北奉天发生瘟疫之际，广东官方不断招募医生前往治疗，但均因为有传染的危险而畏惧不前，伍汉持得悉这消息后，认为医生的天职是救人济世，而死生有命，对于瘟疫不应有畏惧，也不能因苟且偷生而妄顾自己的职责。因为他学的是西医，所以对传染病也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于是欣然组织了救护队应招前往。当时主持控制瘟疫的伍连德医生，虽然是马来西亚华侨，但原籍是广东新宁（即今台山）人，和伍汉持不仅是同乡，也是同宗。伍汉持前往东北参加救治瘟疫，是否受到他同乡和同宗的影响，因为没有资料可循就不得而知了。但伍汉持在那里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为此当地百姓感佩不已，肯定和伍连德医生的通力合作有关。

奉天瘟疫被控制后，伍汉持回到广州，继续他私人的医务，那时候陈炯明在1911年出任广东都督，由于曾和伍汉持在法政同

学，对他工作的精密勤快也有所了解，并且热心好学，于是延揽他担任都督府的医务部长兼北伐军医官。后来因为南北议和，北伐医务官一职也形同虚设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伍汉持的命运，却因为去天津为友人诊治的时候，被袁世凯的爪牙秘密绑架而殉难。综观他的行医生涯很短，但他的医德和医术却给人留下深远的印象。他创立了广东的红十字会，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为贫苦阶层的义诊，他开创了中国的西医，但并不是以赢利为主，却是为社会提供慈善的义务诊治，为贫穷百姓创造医治疾病的机会。他开设医院，却用来掩护革命的运动；且毫不吝啬将自己的所得为革命事业捐输；为救治瘟疫病患者，他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深入到奉天疫区。他的长子伍伯良和女儿伍智梅，深受父亲舍己救人的高尚医德所影响，在后来从事医学的工作上，继续着父亲的遗愿，以服务病人为首要宗旨。

惊涛骇浪中的国会生涯

民国建立后，第一届国会在1913(民国2)年成立，鉴于伍汉持在推翻满清的革命道路上，始终不渝地支持孙中山先生，于是在全国各地推选第一届国会议员的时候，广东香军推荐伍汉持担任代表广东省的众议院议员。当时在广东选出的议员中，年仅27岁的新会人伍朝枢以48票名列名册榜首，伍汉持以43票位居第四。当选后不久，即有其它党内人士，借他生日的理由，向他赠送万金作为寿礼，当然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但伍汉持不为所动而严词予以拒绝。

是年4月1日，伍汉持偕同其它广东当选的议员及家属抵达北京，报人冯自由受国民党委托，代各议员在北京安顿住所，在北京南城的东莞新馆是广东省在当地的会所，所以冯自由就将广东籍议员安置在那里住下。他们一入住后，就听到该新馆经常出现闹鬼的传说，严重干扰了议员们和家属的生活的宁静，而且心生畏惧。伍汉持身为基督徒，从不相信有鬼神的迷信，虽然经过他的再三解释，新馆中闹鬼的传言对他的家属仍然是个心理上的威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伍汉持只得尊重家属的意见，举家搬到

骡马市大街的佛照楼旅店，不久再迁居到金鱼胡同。

廣東省眾議院議員名冊

姓	名	年	歲	籍	貫	票	數
伍	朝樞	二	十七	新會縣人	四	十	八
陳	垣	三	十二	新會縣人	四	十	六
劉	裁甫	二	十六	新寧縣人	四	十	五
伍	漢持	四	十二	新寧縣人	四	十	三
譚	瑞霖	二	十八	新會縣人	四	十	二
葉	夏聲	二	十五	番禺縣人	四	十	二
馬	小進	二	十五	新寧縣人	四	十	二

已補黃四新
 李洪胸
 李情隆
 已補譚文毅
 孔昭威

1913年伍汉持国会当选名单(注14)

伍汉持议员抱着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和救人济世的医生人术，踏入了议会的圣殿，在参与革命活动的里程中，他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陋习歪风，政治团体的尔虞我诈，党派之间利益的冲突，个人恩怨的倾轧，虽然在议会中的时间不长，却感到政治气氛的压抑，和权势斗争的风起云涌，使他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尽量疏远那些是非场所。因为他参加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是盼望着腐败的满清被推翻，革命成功建立共和，中华民族从此走向民主，建立繁荣富强的中国，使老百姓能安定地生活，一改千年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所以他在被广东推举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赴北京上任后，尽量避免外出应酬，除了出席议会外，他就闭门在家中祈祷看圣经，抱着悬壶济世的高尚医德，和谦卑恭敬的基督精神，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

但在国会中进步党受到袁世凯的操纵和威迫利诱，并且以金钱收买议员的环境下，反对声音也显得苍白无力。支持袁世凯独裁的汤化龙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在他的把持操纵下，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无形中就成为袁世凯的传声筒了。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一提汤化龙(1874-1918)的经历。他是湖北浠水人，幼年时代曾中举，在光绪甲辰(1904)年获得进士，从此一帆风顺，先后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等要职。在1910年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举为议会主席。

武昌起义在1911年成功后，汤化龙目睹满清的大势已去，于是转而投向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中，参予组织湖北省军政府，并通电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临时参议院是在1912年成立，公推汤化龙担任副议长一职，并在同年5月加入了共和党。国民政府众议会在1913年1月成立后，汤化龙当选为第一任议长。到5月和梁启超合作成为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并组织‘进步党’在国会中公开对抗国民党。

袁世凯在1916年初解散国会称帝后，汤化龙转向投靠护国讨袁运动，一直到同年六月袁世凯因忧郁而终，8月份国会重启，他又转而投靠段祺瑞，担任内阁内务总长，并且再次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不久之后因失意于政坛而退隐。一直到1918年3月，他安排了出国考察的任务，先到达日本，随后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在加拿大西海岸维多利亚城考察期间。在9月1日那天，汤化龙和随行人员在餐馆晚餐后，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于当地中华会馆外而身亡。王昌刺杀汤化龙的动机，是因为他在国会中对国民党人士的残害，这其中包括了伍汉持议员。

伍汉持在国会中对议员见利忘义的勾当愤慨不已，国会内有汤化龙一手把持，外面又有原同盟会一江姓会员为虎作倀的勾党，专司为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这个江姓人士的父亲，原来和胡汉民私交甚深，在胡汉民前往日本的时候，他父亲就委托胡将他儿子带到东京留学，并由胡汉民介绍就地加入了同盟会。辛亥年广

州起义后，江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出入于同盟会的会所，从此结交不少国民党成员，也没有人对他起任何的疑窦。

在国会选举时，江某因为和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有世交之谊，于是将收买国民党议员的任务就直接交给了他，目的是为袁世凯称帝作准备。当时位在北京西城的甘石桥梁宅，时刻能见到国民党议员出入的踪迹。另外还设立了一个名为“鼻鄙”绫的机构，专司挖掘国民党议员变节的任务。据记载，堕入其圈套的国民党议员几占议会过半数。其中居然有四位是属于同盟会的会员，这都是江某人的献媚结果。

在此期间，江某受梁士诒的委托，携带交通银行五千元支票，前往拜访伍汉持，满以为他会和其它意志薄弱的国民党议员一样很容易被收买，不料江氏碰了一鼻子灰，伍汉持严词拒绝了收受这笔不义之财。江氏面子上的尴尬和内心的气愤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月份，从上海传到北京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于三月二十日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当时在场的有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和陈少白等国民党要员，为宋教仁前往北京和袁世凯会晤送行，却遇到这一不幸事件。两天后宋教仁因伤重不治身亡。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访问，得悉此恶耗后立即致电国内称：“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而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耳里时，他正和章士钊在一起吃饭，

听到后立即表示：**‘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然后又继续不断地发出**‘慰令’**，**‘慰电’**或是**‘慰唁’**等，还赞扬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这一连串的赞颂之词背后究竟暗藏什么玄机无人知晓。但他那兔死狐悲的假仁慈确是尽人皆知。

至今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政治谋杀案，却很轻松地被侦破。凶手是当时被认为是兵痞子的武士英，抓捕到案后，查出背后支持者是上海青帮会的头目应夔丞(又名应桂馨)，然后又扯出袁世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为此又牵连上总理赵秉钧，也因此怀疑操纵谋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就是袁世凯。除了袁世凯之外，这几个人物都先后在扑朔迷离的现状中死于非命。武士英在被提审的头天在监狱中被害，据说应夔丞是在出狱后到北京向袁世凯索取**‘毁宋酬勋’**的诺言，遭到袁氏对这一许诺的否认，不久应夔丞即在京津火车上被刺杀身亡。而和赵秉钧有世交关系的洪述祖，也因为宋案难逃一劫而死于非命。至于总理赵秉钧最后到了天津，依然被袁氏毒死。这些人的惨死，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为宋教仁被刺的案件，至今仍然是个无法揭开的谜团，甚至有另一说，宋是被国民党人陈其美手下暗杀的。

重要的是宋教仁的突然被刺，对刚成立的民国议会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开启了政治界暗杀政敌的先河，国民党由此在国会中的地位彻底瓦解，让袁世凯坐大，扩张其政治的地位和势力。当时的同盟会重要人物谭人凤就曾经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

忌者惟宋教仁’。

此刻伍汉持在北京得悉宋教仁被刺的恶耗后义愤填膺，于是在国会中不仅对袁世凯予以诘责，并且主张用法律解决。于是伍汉持无形中就成了袁世凯的眼中钉。实际上伍汉持没有必要为宋教仁被刺一案去得罪袁世凯，当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尤其是中国人的乡土观念经常影响着政治场合里的团结，宋教仁是湖南人，他的同乡都没有出面为他的被害而呼吁，伍汉持却以广东人的身份为宋案鸣不平，这彰显了他的革命理念不是以私欲为出发点，而是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挺身而出。这在后来对宋教仁被刺的诸多文字中，没有任何伍汉持因为宋案而遭杀身之祸的记载，就可以分析出当时党内派系斗争的端倪。

到四月二十七日，袁世凯私自和英，法等五国签订“善后大借款”？的条约成立，国会中大部分的议员，明知袁世凯的举措不合法，却不敢吭声，惟独伍汉持挺身而出，愤而指责这是政府违法的勾当。有感于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责，维护宪政的尊严，而中国的民主宪法政治还在襁褓阶段，稍有不慎，这个用革命先烈鲜血换取来的神圣议坛，因为一个具有野心的政治人物，用一手遮天的行径来满足他的政治利益和目的，就有可能随时被夭折的危机。于是他在国会中直言：**“政府违法，一至于斯，身为国民代表，当实行监督，庶免专制复活，今之国务员，虽代总统负责，然傀儡而，赘疣耳。”**（注15）由此在国会中提倡反对擅行借债。

他自己草拟了一份查办袁世凯十大罪案意见书，列举袁氏的罪状，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并且上书促请袁氏退位，以平息民怨。当他向各议员连署这份意见书的时候，大多数议员都因为畏惧会因此惹火烧身而避退，结果仅叶夏声等十位议员连署签名。勉强向国会提出，当这份意见书送到议长汤化龙的办公桌上时，为了讨好保护袁世凯，他并没有在议会中传达，而是将其搁置导致无终而疾。与此同时伍汉持还用书信方式和上海等地新闻界联系，鼓吹民情。由于当时袁氏的爪牙已遍布全国，他讨袁的文件也被其爪牙获悉。一些怕事的议员好言相劝，认为既然已经达到申斥的目的，也可以就此作罢了，但是伍汉持坚持认为：“**此乃议员天职，苟利国死生以之。**”（注16）他的观点是，既然身为议员，就有责任维护议会的神圣地位，他一再强调这不是政治的斗争，也没有个人的利益，仅仅是要维护这来自不易的民主宪政。

同年七月十二日中旬，因为二次革命爆发，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发难，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高举讨袁义旗，江苏，安徽，和广东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稳定局势，在北京开始拘捕议员的阴谋。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国会参议员汤漪和报人冯自由等八人，在李铁拐斜街工余俱乐部被逮捕而关押在警署中，当时坊间即传出，袁氏准备大肆拘捕议员，议会中人人自危。但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又不愿放弃自身利益，其中有一百

多名议员就决定前往天津暂避风头。在那风雨飘摇的时候，伍汉持曾先后因为宋教仁被刺，以及袁氏未经国会讨论即私下向外借款两大案，对袁氏提出过责问和弹劾的严厉法律举措，众多好友都担心他的安危，而劝他暂时前往天津避避风头，但伍汉持仍抱着淡然处之的态度。

冯自由在二十六日获释后，第二天即匆忙离开北京暂避，在上车前，偶然见到伍汉持和他的长子伍伯良，于是和其它众多好友一同劝说，他才同意离开北京，但促使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苟且偷安，而是因为他友人在天津患病，邀约伍汉持前往为其治病。在旅途中，伍汉持和冯自由同一车厢，两人纵谈时局，并叹息如恢复帝制，将是祸国殃民而导致民不聊生。抵达天津后，冯自由暂住在日租界日本人经营的旅馆，而伍汉持则先住在日租界的德义楼客店。

两人都以为在外国租界，托庇于外国人的势力下，应该没有危险。不幸伍汉持在前往法租界佛照楼为友人诊治的时候，就在华人区和法租界交界的电车中，被天津警备司令杨以德手下军警逮捕。



杨以德照片

杨以德（1873-1944）原来是天津地方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家道中落，寄篱在人家做打更守夜的杂务。所以当地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杨梆子’。后来因为认识了天津的北段警察总办曹嘉祥，在处理盗贼案子中立了功，得到上级的提拔而推荐给袁世凯得到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当天津在1909年成立北洋警务公所后，杨以德被任命为警务道台。而从民国初年（1912）以来，历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和北洋行营营务处处长，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天津工程处处长等要职，因为他从整治天津当地的混混儿而特别设计出来一套酷刑而闻名，当时在天津有“屠夫”之称。

他在1920年时期，还抓捕过27名爱国学生，其中就有周恩来。因为他的劣迹斑斑，后人曾有诗一首，上联是：“**一人而兼特简荐，官上加官。**”下联则是：“**四维缺乏礼义廉，耻无可耻。**”可谓极其形象地描绘出他的嘴脸。到1924年时代，直奉军阀战争期间，他又使出左右逢源的手腕，再次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机会，晋升为直隶省长，兼全省警务处长和天津警察厅长。所以他长期在天津警察机构中任职，制造了难以估计的残酷悲剧。

伍汉持到了天津后，在八月一日那天被杨以德的手下逮捕，先被关押在军警所部，既然落入到军阀的手中，何况又是袁世凯的地方走狗，肯定是凶多吉少。

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伍汉持在八月一日被捕，显然是袁世凯为泄私愤为先，继而为对国会其他议员有敲山震虎的作用。而当时李準也正寓居天津，对刘师复一案仍耿耿于怀，趁此机会，将伍汉持置于死地方能解心头之恨。而自伍汉持被捕后，没有人得到任何有关他生死的信息，当时总统府还故意向外放空气称，不日将会释放伍汉持，事实上在放话的时候，伍汉持早已从容就义。



王廷桢照片

当时的天津镇守使王廷桢(1876-1940)，在现代历史的记载中都认为他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政治人物，然而他在逮捕伍汉持后，并没有设法将其开释，最后将其杀害时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同情。

王廷桢是天津本地人，出生在一个木工的家庭。投入军校后，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并在1902年毕业。随即返国投身于

军界，先后出任清朝禁卫军协统，民国成立后，担任了天津镇守使要职，又将前清的禁卫军改编成陆军第十六师，他出任师长一职，实际上掌控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民国初年(1912)9月7日他充任禁卫军的统制官，获加陆军中将衔，到9月19日被晋升为陆军中将，正式成为北洋政府首批授衔的将领。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他又被策封为一等男爵。然而他骨子里却反对袁氏称帝的野心。当时袁世凯在阴谋计划称帝的时候，预感到军阀冯国璋将会是他称帝最大的阻碍。那时候王廷楨在江宁担任镇守使，而且掌控着最精锐的第十六师部队，于是特地派了密使蒋雁行到江宁去游说王廷楨取代冯国璋的地位，如果他当时答应，他的政治生涯可能更会青云直上，但王廷楨婉言拒绝了来使的请求。抗战时期，天津沦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派人游说王廷楨出山担任伪政权的职务，他没有答应做汉奸，最后财产被日本人没收，并且在1944年3月6日被日本人用毒药杀害。

从他一生戏剧性的背景，可以认为王廷楨个性的反复无常，他曾周旋于各路军阀阵营中，一面接受袁世凯的勋章，背地里却又反对他的称帝。他拒绝作为日本人的走狗，对操纵在自己手里的忠良义士又无情地予以杀害。

伍汉持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而在就义前被押解到距离天津二十里地的韩家墅军营，那是当时行刑的场所，四面环水，中间是沙洲，如同一个浮在水中的孤岛。凡是被执行死刑后的犯

人尸体，就直接沉埋到沙中，作为鱼虾的饲料。手段极其残忍。

从他被捕那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和家人见面，开始的时候家人也不知他的下落，后来国会其他议员得悉他被捕的消息后，伍汉持的家人曾要求去探望，也没有获准。民国二年(1913)八月十九日夜，军营中的负责人，准备对伍汉持处以极刑，当时对伍氏执行死刑的营长姓刘。伍汉持从容地向刘营长说：“**我众议员伍汉持也，无罪，以劾袁世凯，为杨以德，王廷楨所捕，禁天津二十日矣，未尝作乞怜语，今死，我非畏死者，惟欲五事相求，其许我乎。**”意思是指(我伍汉持是众议员，根本没有犯什么罪，只是因为弹劾袁世凯而被杨以德，王廷楨逮捕，被关在天津有二十来天了，从来就没有说过什么可怜求生的话，今天我将死，我并不怕死，只想要求五件事，请问能允许吗?)

刘营长回复称：“**试言之。**” (刘营长答称：“请说吧”。)

伍汉持坦然叙说：“**一，稍缓时刻行刑。二，以一枪殪我，三，毋与盗匪并瘞，四，于瘞我处立标志，后人查访，请为指示。五，假笔墨草遗书，吾有眷属在京，请留代交。**”

(意思是：一，给他行刑的时间稍微延后，二，希望能一枪给他解决，三，不要和盗匪同葬，四，在葬他的地方立一标志，方便后来的人，可以辨识，五，要笔墨写遗书，为在京的家属作最后的交代。)

刘营长对他的要求都一一答应了，而且和伍汉持长谈了数小时，最后他起立，对营长说：“**虽死，我无憾。**” (注18)于是从容

就义。但是从被捕到就义，袁世凯等一伙始终没有宣布他的罪状，这无疑就是典型的暗杀。

一直到二十四日，才由那位江姓的人士传出噩耗，第二天众议员徐傅霖，刘裁甫，伍朝枢，司徒颖和参议员李自芳等前往天津领尸。二十六日，伍汉持的家属才得到他已被害的消息，于是从北京先赶往天津，再驳船前往韩家墅，从兵营中获得他生前留下的遗书。大意是：

“我以劾袁世凯而死，死于职权，泰山鸿毛，自有公论，人莫不有死，今以一鎗毕命，不犹愈于辗转床蓐求死不得者乎，勿哀，但教育子女自爱，爱国，爱党可矣。”（注19）

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情操，视死如归的精神，而且在临就义前仍不忘教育子女爱国爱党，实催人泪下。

伍汉持就义后的第二天，被捕的丁象谦，常恆芳等八位议员，也被押解到天津，囚禁在杨以德管辖的监



墓碑的拓片

狱中，大家都认为这八位议员的命运，将步伍汉持的后尘。没有料到的是，由于杨以德将伍汉持秘密杀害，受到舆论和社会的攻击，也许是良心的发现，他对这八位议员居然给予了宽容。伍汉持的被害，对他自己也许是“求仁得仁”，与此同时也因为他的殉难，挽救了八位国民党议员的生命。然而在国会中，袁世凯的滥杀无辜，先后有参众两院的议员徐秀钧，林文英，姚勇忱和徐镜心等继伍汉持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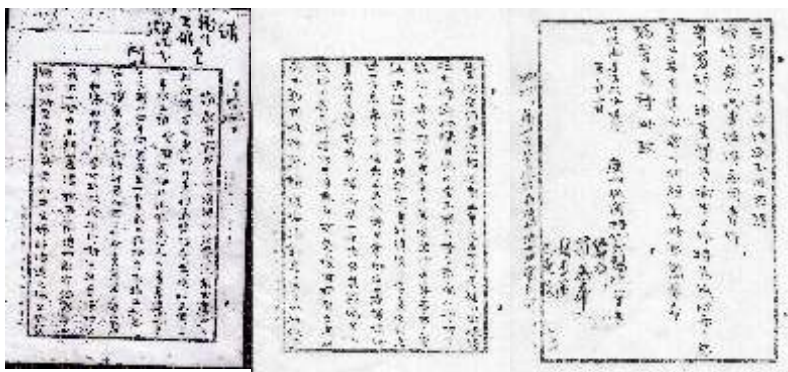
安葬烈士遗体的艰辛

伍汉持被害后的第六天，家属才得以前往天津领尸，当家属抵达他就义的刑场时，虽然是炎热的八月天，但他尸体仍然完好而没有腐烂，身上穿着的是官纱长衣，赤脚，右手遮脸，胸口有一鎗洞，有血水。家人就在当地备置了一具薄棺，将棺木先行运到天津，再换置另一灵柩。伍汉持遗体在被放入棺木前，家属先为其拍了照片作为日后的纪念，随即将灵柩寄厝在广东义庄。（遗憾的是这些照片都因为战争的原因而散失了）。

由于伍汉持生前一直慷慨解囊，支持革命事业，自身没有积蓄，而且所得收入也大都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用途，所以在殉难之后，家中萧条的困境令人唏嘘。据冯自由的记述（注20），在伍汉持就义后，他在香港，烈士的夫人李佩珍向他提起，烈士生前曾在康年人寿保险公司购得寿险二千元，请冯君代为申请保险金，来弥补开销。而烈士的丧礼，经过同好徐傅霖，李自芳，司徒颖等在北京向同乡及友好募捐，才在十二月一日，家人得以把灵柩运回广东。暂厝于穗垣东门外的永胜寺。到第二年（1914）八月十九日，也是他殉难一周年。才迁葬到基督教会的坟场。因为

当时的广东督军龙济光是袁世凯的爪牙，对烈士的丧礼尽量给以压制，所以参加执紼的亲朋好友只有二百多人。

一直到1932年，他的遗骸被迁移到东风路的“伍汉持纪念医院”庭园中。那是他女儿伍智梅为了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为社会公益事业，为贫苦群众救治病痛奉献，在美国等地侨界筹募款项，兴建了这座医院。



伍智梅申请补助文件(注21)

同盟会的元老胡汉民在中华民国21年6月就为伍汉持烈士撰写了悼文，而在民国24年(1935)，悼文撰刻在汉白玉的石碑上，竖立在伍汉持烈士的墓园中，该墓碑高三米宽一米。全文如下：

伍汉持纪念碑

胡汉民撰 陈融书

台山伍汉持先生，初毕业于佛山之英国惠师礼会医院，业医于开平水口，迁香港之油麻地，时史坚如方就义，其兄古愚及妹奉母来香港与订交，共谋革命。会南非洲招工，聘主船上华工医务。乃籍以结纳党人图举事。壬寅惠州之役与有力焉。旋于广州市旧仓巷图强医学堂，授生徒且赠医。而有志经世之学，复肄业于广东法政学堂，治政治经济学。同志刘师复谋炸清吏，僦居其邻，将发遗书致汪精卫及家人置案上，携炸弹出，误触其机，弹发受重创，先生驰往救之，瞥见案上书纳诸怀，而异刘于医院，既以书授同志朱执信，古勤勤等毁之，他人不知也。清吏以汉持就刘力，疑与谋，逮之，大索其家，获代理民报簿籍以去。狱将其矣，朱，古等联合学界力争之，法政学堂监督夏同龢，复为白于当局乃免。辛亥三月廿九之役，党人既失败，多亡匿，先生也徙家香港，与莫纪彭，林君复等运动驻香山新军反正，九月以香军光复香山趋顺德，将直薄省垣，而省垣已宣告独立，遂率军筹北伐。会南北议和乃止。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或以万金诱使脱党籍，拒弗纳，甫入都，袁世凯擅借外款成，愤然曰：“是违法也，不纠绳，专制将复活矣。”乃提言于议场力反对之。而于暗杀宋教仁案诘责袁世凯尤严。赣宁讨袁义师起，主法律解决，臚举世凯祸国罪状，依约法提案劾之，复上书请退位，以是深为世凯所基。有劝之者，则曰：“此议员天职，苟利国家，死生以之，他非所顾也。”更贻书沪上报界声其罪，世凯侦得之，会友人某旅天津病，延往诊，抵津经

河北被捕于途，旋移禁于距津二十里外之韩家墅军垒，盖刑人地也。夜向尽，曳出将死之，语其营长曰：“我众议员伍汉持也，无罪，以劾袁世凯，为杨以德，王廷祯所捕，禁天津二十日矣，未尝作乞怜语，今死，我非畏死者，惟愿以一枪殪我，我死毋与盗匪并瘞，识瘞所为示后人访我者。”索纸笔草遗书毕，从容起曰：“趣死我无憾矣。”遂死之，时民国二年八月十九日也。越五日家人始得讯，出都访遗骸，得其遗书曰：“我以劾袁世凯而死，死于职权，泰山鸿毛，自有公论。人莫不有死，今以一枪毕命，不犹愈于辗转床褥求死不得者乎，勿哀，但教育子女自爱，爱国，爱党可矣。”乃易棺殓归葬于粤。先生为人醇笃沈毅，怀利物济人之志。为公益事，不惜倾其财与力以赴之。庚戌奉天大疫蔓延，速且广，各省征医赴之，莫敢应，先生慨然曰：“医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惧哉。”应征往，存活甚众，奉人德之。尝与马达臣举办赤十字会，义捐资购学堂临近谋筑院赠医，以利平民，华人于国内创办十字会及西医院者，自先生为之始云。夫人李佩珍擅产科，助治其业，今之图强助产学校，伍汉持纪念医院，皆所手创。抚诸孤成立，能成先生之志。子伯良，智梅，伯胜伯就皆毕业国内外各大学，致力于党国社会事，有声于时。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谷旦

笔者在2011年1月前往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寻找烈士历史资料时，发现胡汉民撰写的碑文原始件，标题是”伍汉持烈士纪念

碑”。也许是在撰刻的时候，限于石碑的空间，原始碑文的开始三行被删除了，其原文为：

“吾自肇建共和代议之制始，确立顾儒者，退惠而丧其所守谄者，因缘以自利其私，而代议制辄为世所诟病，其以落落之身，处权恶淫威之下，纲维正义而不屈，牺牲身命而不悔，卓然能葆代议之精神于不坠者，盖自伍汉持始。”

原始碑文末端署名为：**中华民国二十有一年六月番禺胡汉民撰**



胡汉民撰写的铭文原稿（注22）

实际上，伍汉持之死因先是为宋教仁鸣不平，再则为袁世凯丧权辱国，向外借贷而公开在国会中提出弹劾不幸遭到毒手，为议会制度中向政府领导人提出公正的质询开启了先河。而孙中山先生直到是年的八月，才忍无可忍，用强烈的文字，要求袁世凯退位以谢国人。这封题为“先总理致袁世凯电”是民国二年(1913)八月发出，现保存在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里(档案号为50/315)，原文如下：

“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諄諄”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意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次语非弟对公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兵于公实有责言。文之初衷，未曾少易，何图宋案发生，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懣，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固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乃挑，以至东南军民荷戈而起。众只一词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姑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云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秉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策固未为民国计，亦未为公计也。清帝退位，公于其谋，清帝不忍人民之塗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

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执，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

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贲言，谓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文于彼时，其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制，不能自由，苟非託词，即为自表亡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拼，杀一不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天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维裁鉴之。

从这篇电文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径，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对宋教仁的被害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但没有提到伍汉持的被害，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信息流通缓慢，孙中山在八月发出这封通电的时候，袁世凯的爪牙隐瞒了暗杀伍汉持烈士的消息，一直到八月下旬，他遇害的恶耗才被传出，但为时已晚。假如孙中山能更早的发出这份通电，也许伍汉持还能避开这场杀身之祸。

同年12月27日，国会中的参议院议员吴景濂等七十二人联名向袁世凯发出通电，文中列举袁氏和五银行的罪状。这封通电也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台北国民党的党史馆里(档案382/1号)，全文如下：

“通电乃遽以为议决并授引海兰铁路借款合同之例，不知海兰铁路之借款确有正式公文提出，并确有正式公文咨复，岂能授以为例。且表决者仅为五款之大体，五款之大体可称为全案乎。至所以周总长声明即须签字众无异议等语，不仅景濂等未闻此言，即议事录亦未掲載，不知此语从何得来？借款合同系属财政法律案之最关重要者，按参议院法必须三读会始能议决，乃政府并未正式提出（原稿中有修改，本为‘并未议出’），遽论议决。以上各节均系实情，景濂等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并为主席，不敢不据实证明，前参议院议员吴景濂等七十二人同全叩。”

“袁世凯与五银行之罪状”：

袁氏借款不经(银行)国会议决是为违背法律，银行出贷协助政府违法，是为践绝人道丧我主权，破我财产。袁氏直接灭亡我国家，乘我危急制我死命。银行间接鱼肉我人民，违法签字，全国反对，袁氏乃充耳不闻，是真蹂躏民权。

史横民愤大陆危迫，银行乃袖手旁观，是真丧尽公德。

袁氏亟亟签字利用银行以达其政权专制之目的，是为政治之罪人。

银行汲汲定约，利用袁氏以达其利用专制之目的，是为商贾之罪人。

袁氏之祸可以乱中华秩序，是为中华民国之罪人。

银行之祸并以破坏东方和平，是为东方全局之罪人。

袁氏经两院反对，不肯取消合同，反欲运动翻案，是为穷凶恶极。

银行知国民愤激，不早出首转环，反欲试渐交款，是真狼狈为奸。

袁氏挟银行用以抵抗国会 (据政府人称，银行不愿取消合同依外凌内)，是真丧心病狂。银行依私法约，以破坏国际 (合同为私法上事，既侵国际自应取消)，以私废公，是真反道败德。

袁氏为法律之贼

银行为道德之贼

不弹劾袁氏无以谢中华全国

不对待银行无以保东亚和平。

附录宣言题端：

大注意，我国民，须平心，谋生存，勿利诱，失厥身，勿威怵，丧厥真。

又感怀一首：

伤心政海波澜倒 为语当途天地长

汉武秦皇公安在 斯民族古有天良

徐子铨 (镜心) (注24)

从这封通电的内容可以看出，袁氏在当时已人心尽失，伍汉持在是年的七月，向袁氏发难，实为卓越之见。而他因为维护宪政治的尊严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冯自由在广东文徵续集一书中，就以‘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为题，撰写了有关伍汉持的事迹。(注25)

因为他的流血，几乎陷于分崩离析的国会中，草拟宪法的呼声更趋积极，在国会中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的汤漪，于

1913年10月14日在天坛的祈年殿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世称‘天坛宪法草案’，并且在10月31日三读通过。这对袁世凯的皇帝梦无异是一大打击。于是他想方设法在幕后操纵反对。汤漪等议员于是以干涉制宪为由，对袁世凯提出弹劾。袁氏恼羞成怒下令将汤漪逮捕入狱，并在11月4日解散国会。

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先生(1885-1972)在台北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后，就他的口述，整理出口述历史丛书第64部，书名为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书中记载了他参加孙中山先生革命队伍的经历，多次对伍汉持有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在为了捍卫议院的尊严和宪法的精神，不惜挺身而出对袁世凯口诛笔伐，竟而以身殉国，为此莫纪彭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伍汉持在历史地位应该占到很重大的一页。我每次写稿以汉持为“东方宪法之神”。他是为宪法流血的，东方宪政史第一人’（注26）。

接着他又这样写着：

‘汉持初在香军任秘书，由香军提名，当选第一届众议员，在众院日，卓有声誉，后因弹劾袁世凯的违宪非法，在天津被捕，又后，被杀掉。’（注27）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里珍藏着一张伍汉持烈士的遗照，照片下方印着民国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先生遗像。

然而经历了对日抗战，接着是国共内战，位在广州市区内的伍汉持纪念医院命运也遭到了变故，位在其中的烈士墓地也是一

波三折得不到安宁。细节将在后细节将在后面再叙述。

夫人李佩珍 (?—1961)



烈士遗孀李佩珍(中坐者)与子女们合影

夫人李佩珍(?—1961)矮小的个子，还有一对和当时妇女一样的缠脚，后来把缠脚解放了。对她的身世没有太多的记录。只简单地记载着，她是广东台山横塘村人，父亲名叫李时植，同样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李佩珍是他的第四个女儿。当地同乡伍汉持在十八岁时和她结为夫妻。和丈夫到广州之后，伍汉持因为习

医，毕业后在开平行医，受到拳匪的骚扰，不得已前往香港，继续他的医生业务。但这时候，伍汉持开始了革命的活动，身为妻子，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回到广州，协助丈夫开办医院，她先在当地基督教办的柔济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成为一名助产士。这对她日后开办的助产学校有莫大的帮助。因为没有科班的医学背景，又不曾接受过正规教育，她不认识药名，但能够用鼻子来辨认药味。

他和伍汉持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除了小女儿文英早夭外，长子伍伯良在1893年出世，第二胎是女儿伍智梅在1897年出生，第三胎是儿子伍伯胜，在1903年出世，而最小的儿子是在1912年诞生的。夫妻两在广州旧仓巷创办了图强医院和图强助产学校，共同惨淡经营，而伍汉持还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作为妻子的担惊受怕是不言而喻了。

腐败的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创建了民国，伍汉持被推举为第一届国会议员，举家迁往北京，伍汉持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艰辛创业，建立教会，创办红十字会，同时又披星戴月不懈地参与革命行动，就没有享受过安逸的家庭生活。到了北京后，也许在他们的愿望中能开始勾画出一幅美丽融洽的家庭远景。

然而伍汉持的刚烈个性，以及不畏权势，秉公维护宪政的决心，遭到袁世凯的暗杀。他妻子没有料到，北京之行，竟然是他的死亡之路。这一家庭的突变，李佩珍女士从不惑之年即开始守

寡，大儿子才20岁，女儿也只有16岁，两个幼子分别是10岁和1岁。抚养四个孩子的重责，一下都压在她的身上，同时经营广州医院和学校的担子，也要她一肩挑起。唯一能辅助他的就只有大儿子伍伯良。

忍受着丈夫被害的痛苦，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并坚挺着日以继夜地经营着医院和学校的辛劳。她承受着各方的压力，孜孜不倦继承着先夫的遗志，在大儿子和女儿的共同努力下，并不懈地默默耕耘，医院的业务最终也有所发展，并在广州大东门外荣华南9号，开设了图强医院分院。



李佩珍和长媳胡燕襟在图强医院门首留影

唯一得到的安慰，是丈夫生前的革命同志，不时给以安慰和协助，而她又善待街坊四邻，在广州人缘极好，当地常以伍师奶尊称她。从艰难的生活环境中锻炼出经营的能力，来支持她先夫的事业和医院的运作。同时继承了先夫克己待人的风格，而为了纪念先夫的殉难，她还将图强医院扩建为‘伍汉持纪念医院’，作为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目标。后来女儿在南北美洲筹募到款项，在今天的东风东路兴建了规模较大的‘伍汉持纪念医院，在抗战期间曾遭到严重破坏，待抗战胜利后，伍家再度惨淡经营，恢复了医院的原来面貌。

广州在1949年解放后，当地政府曾告诉烈士遗孀可以继续经营这三座医院，烈士的遗孀也就安心地经营着纪念夫君的事业。在香港的家人都希望她移居到香港颐养天年，于是她在1950年带着两个孙女儿到达香港，住了大约半年多点时间，她仍然对先夫遗留在广州的事业寄以深情，何况中国人的落叶归根思维一直在她脑海中盘旋，所以她计划回广州。她在行前，对香港的家人说，抗战时期，她经历过日本人控制下的生活。伍汉持纪念医院曾遭受到一定的摧残，但日本人知道她是烈士的遗属，而大和民族又有对烈士尊重的传统精神，所以日本人对她没有给以任何的人身伤害。所以她深信，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当家，按常理，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应该会超越日本人。

本着这样的信心，她毅然决然地带着两个孙女儿回到了广州。

然而后来一系列的经历却是出乎她意料之外。先是在1951年接到政府的命令，两所医院必须在24小时内交出，所有家属每人除了拿两件换洗衣服外，其他物件一律不许携带。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得烈士的遗孀不知所措，但既然是政府的命令，就必须尊重。其中私力图强助产学校立即被改名为广东第一助产学校。接着在1953年8月广东第一助产学校再次被归并入广东省卫生学校。

这时候烈士的女儿已经去了台湾，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意大利居住，广州就只剩下长子伍伯良一家和幼子伍伯就的两个女儿，还有女儿伍智梅的后人。就这样烈士的夫人将一家人分开居住。她自己带着两个孙女，搬到位在大东门外荣华南9号的图强医院分院去住，大儿子一家则另外租屋居住，而伍智梅的后人，则被安排住在医院的太平间里。

两年后，政府再度下令医院分院也要求归公。烈士遗孀只得带着孙女，再次迁到惠福西路的老房子居住。其他原有的房地产也尽数被没收。在她晚年的时候，因病住院，那就是她先夫创办的图强医院，躺在病床上，看到护士医生使用的每一件医药设备上，都刻划着无限的记忆。她不尽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一直让她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人，就真的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给予一点人格上的尊重呢？

她以耄耋之年，带着一家大小，就这样默默地被不舛的命运所折磨直到去世。到文化大革命时，她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墓

地被红卫兵破坏殆尽，那些不学无术的暴徒，以为烈士的遗孀，曾经经营几所医院，墓中肯定有无法估计的珍贵陪葬品。然而当墓园被挖开后，里面除了白骨一堆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满以为一厢情愿的梦想是能在墓里找到什么陪葬品，可以拿来作为继续斗争先烈家庭的证据，然而他们的痴想最终落空，而一代先烈遗孀的墓地，最终被彻底铲平，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烈士遗孀李佩珍墓地被毁前家属扫祭
的唯一留影(1961)

当时将烈士遗孀等一并从医院里扫地出门，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说明理由，只凭当地政府的一句话，而且不仅将医院等财产没收，即便是个人的衣物也不许拿。更何况将烈士的后人，赶到医院太平间里住，这比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更为恶劣。如今事过境迁，回顾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烈士家庭的一切，可以斩钉截铁地说，那不是当时政府的政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短视和狭隘心态的‘报复’劣根性所使然。而且是发生在一个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家庭里，不仅是难以理解，也更反应出民族传统中个人在对人或对事的‘恨’与‘妒’的作祟。

继承父业的伍伯良

(1893—1972)

他是伍汉持的长子，在1899年到1904年期间，在香港基督教会小学，皇仁书院和圣约瑟书院完成中小学学业，为他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后来回到广州，从1904年到1913年，先后在培正中学，圣心两广方言学校和岭南大学医科预备班求学。父亲在天津遇难时，他才二十岁，跟随母亲到天津去认领父亲的遗体时，看到北洋水师医学院（北洋海军军医学校）招生，于是在办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他即刻报名，目的是想继承父亲行医的志向。在1915年获得录取后进入该校，一直到1920年毕业。

该校原名称为北洋西医学堂（天津西医学堂），是光绪二十（1894）年中国自主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也是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的附设学堂。

该医院的前身应该追溯到光绪五年（1879），基督教英国伦敦会派遣马根济（John Kennedy Mackenzie）前往天津担任伦敦会医院院长一职。在职其间曾向李鸿章建议创立西医医学馆。李鸿章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重一时，当即接受了马根济院长的建议，于光绪七年（1881）在天津创立了天津西医医学

馆，全名为(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也就是当时的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光绪十四年(1888)，马根济病逝，伦敦会收购了天津西医医学馆和总督医院，李鸿章则开始筹设更大规模的西式医院。于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落成了，是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西医医院。是根据当时的北洋海军章程而定名的。该学堂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暂时关闭，到1902年袁世凯恢复办学，更名为“北洋海军医学堂”，也被称为“北洋海军军医学校”。到1915年10月天津原校被中华民国海军部收编直接管辖，并改名为“海军军医学校”。

该校成立之初，曾委派英国爱丁堡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士广东籍的曲桂庭负责招生，而他招生的规范仅局限在广东一省，遭到天津当地人士的抗议。一直到民国时代，该校才改为每两到三年，在全国招考一次，每次仅录取新生三十人，但能顺利完成学业的毕业生可说是凤毛麟角。在十六届学年中，总共只有二百一十八名学生毕业，伍伯良是第十三届的学生，当时共只有十五名学生毕业。

他在北洋海军医学校毕业后，回到广州挑起父亲遗留下来的医院工作，而且为了纪念父亲的殉难，家中决定将图强医院改为‘伍汉持纪念医院’，他担任院长一职。这时候他已经成家，夫人胡燕襟也是医生，两人携手合作，除了经营医院外，还继续办理图强医学校，培养护士人才。颇有建树，当时伍廷芳，陈炯明，

胡汉民等十多位政府要员，深感伍汉持烈士后继有人，也是对先烈后人的赏识和栽培，于是他们在1921年1月3日在广州“广东群报”的第2页刊登了一则启事，亟力推荐伍伯良的医术，也是对先烈遗属的鼓励。启示的内容是：

“伍伯良医生为汉持先生哲嗣，少性聪明，覃心学术而佐汉持先生办理医院，赤十字会各事，成绩斐然。嗣复毕业于北洋医学校，学历更优，经验尤富，现回粤充旧仓巷伍汉持纪念医院(院)长，图强医学校校长，本其所学一应社会之需求。廷芳等知(之)有素，特著数言以为介绍，俾求医者知所问津焉。

介绍人：伍廷芳，汪兆铭，胡汉民，陈炯明，徐傅霖，陈廉伯，古应芬，谭民三，杜之杖，陈翼生，伍学晃，黄强，陈镛(融)，金章同启。(注28)

这份历史资料，广东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副馆长收录在他撰写的“陈炯明集”下册第521页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标题是‘与伍廷芳等介绍伍伯良医生启事’

伍伯良在广州工作不到一年，得悉庚子赔款条约中的留法学科，他有意前往欧洲深造，对提升自己的医术能有所帮助，于是他提出了申请并获得录取，于1921年10月3日作为官费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医科学习，经过三年的奋斗，于1924年8月10日毕业。

Liste des étudiants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IFCL)

里昂中法大學學生錄

N°	Nom (chinois)	Nom (pinyin)	Origine	Naissance	Sexe	Spécialité	=> IFCL	IFCL=>	Thèse
1	黄式坤	Huang Shikun	广东	1897	女	医科	1921.10.3	1924.08.10	
2	黄明敏	Huang Mingmin	广东	1901	女	法科	1921.10.3	1931.06.19	
3	黄伟惠	Huang Weihui	广东	1902	女	文科	1921.10.3	1931.06.19	
4	苏梅	Su Mei	安徽	1900	女	美术	1921.10.3	1925.05.22	
5	杨润余	Yang Runyu	湖南	1902	女	文科	1921.10.3	1929.09.06	√
6	潘玉良	Pan Yuliang	安徽	1894	女	美术	1921.10.3	?	
7	刘梧	Liu Wu	广东	1901	女	理科	1921.10.3	1926.10.17	
8	方蕴	Fang Yun	江苏	1901	女	美术	1921.10.3	1927.10.04	
9	方裕	Fang Yu	江苏	1904	女	文科	1921.10.3	1927.10.04	
10	陈峥宇	Chen Zhengyu	河北	1897	男	电科	1921.10.3	1923.12.04	
11	金绍祖	Jin Shaozu	广东	1897	男	实业	1921.10.3	1922.04	
12	韩旅尘	Han Luchen	广东	1892	男	理科	1921.10.3	1924.08.14	
13	杨KUN	Yang Kun	河北	1900	男	文科	1921.10.3	1930.12.20	√
14	吴文安	Wu Wen'an	广东	1893	男	兽医	1921.10.3	1928.10.16	
15	刘维涛	Liu Weitao	四川	1898	男	理科	1921.10.3	1929.11.29	√
16	叶LIN	Ye Lin	四川	1894	男	文科	1921.10.3	1930.01.24	√
17	黄秉礼	Huang Bingli	四川	1896	男	法科	1921.10.3	1922.08	
18	伍伯良	Wu Bailiang	广东	1892	男	医科	1921.10.3	1924.01.24	√
19	章桐	Zhang Tong	江苏	1895	男	理科	1921.10.3	1926.10.17	
20	阎维明	Yan Weiming	河北	1896	男	实业	1921.10.3	1930.07.31	
21	陈彝寿	Chen Yishou	浙江	1902	男	文科	1921.10.3	1923	
22	吴凯声	Wu Kaisheng	江苏	1900	男	法科	1921.10.3	1926.01.19	√
23	霍金铭	Huo Jinming	山东	1898	男	纺织	1921.10.3	1928.01.01	
24	何然	He Ran	浙江	1899	男	实业	1921.10.3	1927.01.14	
25	张继善	Zhang Jishan	河北	1898	男	理科	1921.10.3	1929.01.01	
26	袁振英	Yuan Zhenying	广东	1894	男	文科	1921.10.4	1924.08.14	
27	陈苾民	Chen Binmin	浙江	1895	男	理科	1921.10.4	1924.08.14	
28	汪德耀	Wang Deyao	江苏	1902	男	理科	1921.10.4	1931.12.18	√
29	李丹	Li Dan	湖南	1900	男	音乐	1921.10.4	1928.03.09	
30	虞炳烈	Yu Binglie	江苏	1895	男	建筑	1921.10.4	1933.07.28	
31	李亮恭	Li Liangcong	江苏	1902	男	理科	1921.10.4	1925.12.04	
32	李其苏	Li Qisu	广东	1895	男	工科	1921.10.4	1922.04	
33	商文明	Shang Wenming	贵州	1898	男	工科	1921.10.4	1926.09	
34	谭文瑞	Tan Wenrui	广东	1900	男	飞机	1921.10.4	1927.08.30	
35	黄国佑	Huang Guoyou	广东	1903	男	兽医	1921.10.4	1929.12.29	√
36	袁久址	Yuan Jiuzhi	广东	1897	男	理科	1921.10.4	1927.03.25	√
37	李煦寰	Li Xuhuan	广东	1896	男	药科	1921.10.4	1926.04	√
38	马竹捷	Ma Zhujie	广东	1900	男	化学	1921.10.4	1924.08.14	
39	杨潜	Yang Qian	广东	1901	男	实业	1921.10.4	1927.08.30	
40	方学芬	Fang Xuefen	广东	1899	男	化学	1921.10.4	1926.11.04	
41	陈锡爵	Chen Xijue	湖北	1896	男	医科	1921.10.4	1922.10	

法国里昂大学录取名单
伍伯良为第18名

伍伯良在法国里昂大学医科毕业后，即刻回国在广州服务了一段时间，然后在1930年前往德国，进入柏林医科大学继续深造，到1933年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分别在德国柏林大学卫生学院，和柏林大学社会卫生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两所大学的医院中担任妇产科的医生职务。



烈士长子伍伯良
1931年在法国留学时的留影

据家人的回忆，伍伯良在赴欧洲求学前，当时在国民党内有举足轻重的汪精卫曾亲自到码头送行，并且对伍汉持夫人李佩珍女士说，她再忍受几年的辛劳，等伯良学成回国后，她就可以享清福了。由于伍汉持为维护宪政而遭到袁世凯的毒手，所以那时候，汪精卫和其他党内人士，对伍家一直给予不同的关爱，后来汪氏改变他的政治理念后，伍家长者仍然告诫后辈，必须保持中

华民族的憨厚传统，牢记他人给予的恩德，不要做落井下石的举措。

在欧洲学成后，伍伯良回到广州，在广州市政委员会担任了近六年(1924-1930)的委员职务。并先后担任广东警官学校校医，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市政府购料委员会委员，广东法官学校教授，广州市立银行董事，广东参议会参议员，广州特别市社会局局长，广州市医师公会常务董事等职务。

当时负责广州市政的是国民党的元老林云陔(1883-1945)，林氏早年加入了同盟会，于1920年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秘书一职，和伍汉持女儿伍智梅及夫婿同事。此前又和伍汉持同为革命党人。

伍伯良从法国学成回国后，林云陔已经在1927年开始担任主持广州的市政建设了。他在1927年5月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的委员长一职，第二年五月广州市改为广州市政府，他的职位也改称为市长。到1929年秋天，广州市又先后改为特别市和广东省直辖市。在1931年当古应芬拒绝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后，陈济棠力荐林云陔出任省主席的职位。

有了这些渊源，又是留学欧洲的高材生，伍伯良在1929年9月被延揽进入广州市社会局出任局长职务，一直工作到1930年8月。在任职时对广州社会的易风移俗有很大的贡献。主要是在婚礼的改革和废除淫祠邪祀和破除迷信两大方面。他在婚礼的改革方

面，感到广东延续下来的繁文缛节铺张浪费传统，必须予以破除。于是他引用了西方的宗教结婚仪式程序，介绍到广州并予以改良。废除过去聘礼，仪仗，迎亲等等的繁文缛节，统一了婚帖的格式，简化为说明介绍人和结婚人姓名即可，而且在社会局里设立了结婚亭，新人在亭内办理婚事，政府派人作证婚人。结婚仪式是先向党国旗和孙中山总理遗像行礼，证婚人即向新人问是否愿意接受对方，然后交换戒子，双方在证书上签字或盖章，最后互相致意，并向长辈行礼，再向证婚人和来宾鞠躬致意表示感谢。当然这样的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争议在所难免，因为这等于是向传统宣战。但作为欧洲回国的留学生，中国落后的社会陋习，必须要给以适当的改革。

另外一个改革是破除迷信，谋求社会文化的推进。鉴于广州市内不仅是供奉牛鬼蛇神的庙宇林立，更有甚者是一般无赖神棍，专门引诱无知妇女的淫祠邪祀，设立偶像，骗取钱财。于是伍伯良雷厉风行地会合了警力出动扫荡。就在1929年11月到12月间，广州的民国日报几乎三两天即有报导。(注29)社会局安排货车和警察一同执行，将五花八门的偶像予以清除殆尽。然而在民间这种迷信早已根深蒂固，善男信女对社会局的这种举措不仅有怨言，而且还付之以行动。在原来的庙宇中被拆除的偶像再度树立符号或是石柱作为代替物。后来有人批评称伍伯良的行动过于严厉，但他铲除迷信的决心，的确在当地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对社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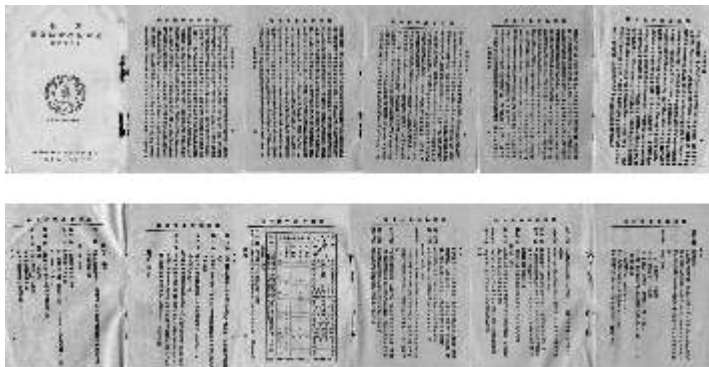
改革贡献很大。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地方上的利益集团。

这时候，广州出现了禁止吐痰的规则，广州民国日报在1926年1月25日刊登了这么一则局级‘令局执行禁吐口水规则’，内容为：

“市政厅昨训令公安，卫生两局云：为令遵事，查本月1月14日第16次市政委员会会议，伍委员伯良，提议禁吐口水规则，既经公布，应切实执行一案，业经议决，飭公安，卫生两局，分别切实执行…。遵照办理。”（注30）

这则消息反映出，伍伯良在近百年前，即已经有了公共卫生和立法的意识，这都和他在欧洲求学亲眼目睹他国进步的社会卫生环境有关。

除了继续担任图强医院院长，伍汉持纪念医院院长和图强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校长等职外，他又被推举为广东省参议院议员。这让他本为医务工作者，卷入了政治场合。所以在大陆解放前，亲朋好友都主张他离开广州，但他以为父亲为维护宪政而牺牲，从事医务工作也是继承父亲生前的救世济人的遗愿，不应该会有什么問題。而进入政府的工作范围也只是局限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范畴中。然情况的发展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图强助产学校的章程（注31）

解放后，还有人建议他将医院全部捐献出来，换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目的是保住人身的安全。但他以为守住医院，也仅仅是为了纪念父亲一生从不委曲求全，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父亲在临就义前，也没有为了苟且偷生而去向权势低声下气，保住了崇高的人格情操。此时如果仅为了求生，而拿父亲创办的医院来作为交换条件，这样做有违父亲毕生的革命精神，也辱没了他遗留下来的高风亮节，所以伍伯良坚持守护着父亲惨淡经营所留下的医院，目的也是希望继续为老百姓服务。在解放前后，广东的医疗设施非常落后，而图强妇产科和伍伯良的医术在当地也颇富盛名。

所以在解放初期，政府还动员伍伯良夫人胡燕襟出任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一职，但是伍伯良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自身的阶级成分，认为妻子不宜担任如此重职，于是只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担任妇产科主治医生。番禺地方的村民遇到生病，或者孩子有困难，都会通过伍家的亲戚找到他们的医院去找胡燕襟大夫诊治，所以村民和她结下了友情。

当然这些对伍伯良一家的生活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而更艰难的日子正在等待着他，三所医院还是遭到先后被没收的命运，他一家也被迫赶出了医院，在旧仓巷附近的豪贤路临时租房暂棲。

广州解放之后，伍伯良以一个医生的地位，认真地继续为当地百姓诊病，他有一位名叫陈汝棠的同学，也是医学界同行，因为大家都从事同一职业，在交往中伍伯良始终把他当成知己，所以解放后，伍伯良对他没有任何的提防，在和他如同兄弟般地话家常时，将家庭的背景以及他妹妹伍智梅的经历，没有任何的隐瞒都告诉了陈汝棠。他没有料到，这位他视为兄弟般的朋友，竟然把他听到的内容，作为佐证向人民政府告发，于是伍伯良在1952年2月22日遭到逮捕，在没有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禁了两年多，一直到1954年8月5日才由广东省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入狱十五年的劳改重罪。法院宣布的罪行非常可笑而且互相矛盾。

判决书中给伍汉持扣上的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上层骨干份子，但接下来又宣称，解放后被留用在政府接收的伍汉持医院担任院

长一职。而从伍伯良在填写个人历史的时候，在‘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一栏中，所填的是‘无’，也就是说，他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那么所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上层骨干份子’又如何解释？

判决书中还列举了他妹妹伍智梅是伪中央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和孙中山的儿子战犯孙科来往甚密。并和伍犯（指伍智梅）长期共同生活。这些被列举的罪名，担任审判的法官应该作实际调查后再于判决。伍智梅多年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和孙中山一家过从甚密。和孙科往来也是顺理成章的。而和‘伍犯长期共同生活’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两人是兄妹关系，共同生活是家庭关系，有那一点是不合理的？伍智梅是在1948年离开广州的，在她离开之前还接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亲笔信，希望她能够留下来，虽然她和宋庆龄之间亲如姐妹，但在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同，离开广州也是个人的抉择，谈不上反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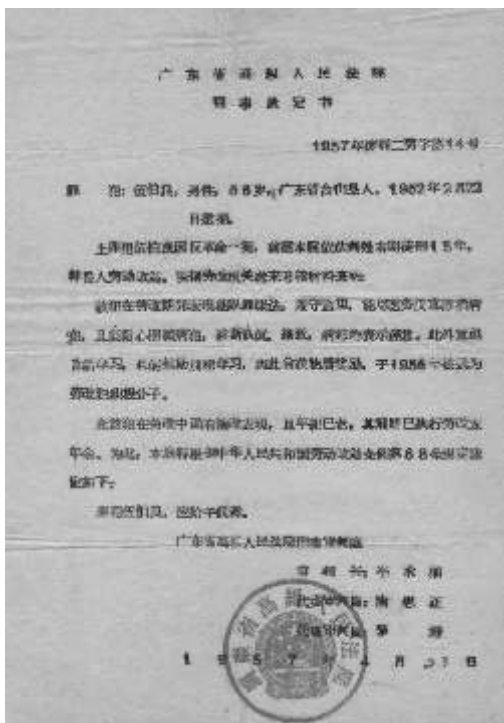
当然在判决书中还列有一大堆的罪名，伍伯良的家人都很清楚，这都起因于他遭遇到以前同学的密告，而要置他于死地，就必须罗织一些耸人听闻的罪名，才能达到其目的，而这些罪名，最终能让伍伯良成为最时尚的‘反革命现行犯’，从而将其绳之以法是最能行之有效的了。至于为什么他的同学，要对他下这样的毒手，伍伯良至死都想不透。

从他被剥夺做医生的权利，到牢狱之灾这一段的辛酸经历，在1954年8月5日广东省人民法院53年度刑字第72号刑事判决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刑事判决书中清晰地列出，广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就是送案机关，将伍伯良送进监狱的，而当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长。就是伍伯良一直认为如同兄弟般的老同学。

至今令伍家人无法释怀的是，这位人士和伍伯良是同庚，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应该和伍伯良的父亲伍汉持烈士同是革命同志，理应对烈士的遗属予以关怀，何况他在国民党内也担任过海军司令部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医务处处长等职，回顾往事，所以他不仅把伍伯良送进监狱，还将伍汉持烈士在革命时期艰辛创办的医院，没有经过任何的合法程序，就凭借个人的权威决定，全部予以没收归公，难脱卖友求荣之嫌。他的这些作为，固然给自己带来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甚至官至广东省领导地位。然而他这一作为，对伍氏家属彻底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因为他的假公济私，给外界造成以偏盖全的观念，无形中也破坏了政府的形象。迄今为止，烈士家属对政府并没有丝毫的怨言，但无法苟同那些造成恶劣后果的个人行为。

从非法逮捕到入狱服刑，一个杰出的医学博士，就这样在监狱中一呆就是五年，而在1957年4月2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57年度刑二劳字第14号刑事裁定书，使伍伯良获得假释。

(注32)理由不外是在劳改中有悔改表现，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等等。



烈士长子伍伯良于1957年
被释放的刑二劳第14号刑事裁定书

自监狱中释放后，不久伍伯良即被派到北京学习运动医学急救半年，回广东后，被分配到广州体育馆任馆医，负责运动员的保健工作，这和他在欧洲所学的医术可谓大相径庭，而且是人才

的浪费。最后因他年事已高，被获准返家养老。

当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时，伍伯良预感到厄运的再度降临，而在城市里，用学习班的名义开始遣送人员下乡，他也在1966年被送往老家台山，可是家乡的房子早已被挪作他用，也找不到三亲四戚，在举目无亲的现状下，他的大儿子伍诚信建议父亲去番禺。首先那里比台山更近广州，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他夫妇为当地村民做了不少善事，所以有较亲切的人情，而且他妻子就是当地人，所以他最后决定将户口迁往番禺。今天的番禺已经成为广州的卫星城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番禺交通还不是那么方便，他从广州去还要走水路，当时番禺刚修建了新码头，所以他必须先从广州乘船到达后，再从码头转乘车，到妻子的家乡明经村。



伍伯良夫妇劫后余生的合影

那时他已经是将近古稀之年，加上长期在城市生活，而且在欧洲留过学，突然到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条件和环境落差之大可以想象。好在他拥有乐观的人生观，对现实的状况也就逆来顺受了。他抵达之后，妻子的侄女儿夫妇为他挑行李，陪同去学习班报到，经过严格的审讯核查，才允许他留下接受集中管制，并分配他一些较为轻松的工作，而且可以看书。只是每次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就要向大众低头，而且拿出有关他的资料宣读一番，伍伯良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了，他还没有受到当众的辱骂或其他侮辱性的对待，也没有给以任何的刁难或者无法承受的惩罚。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也许是他年龄过大，在学习班仅呆了两周，就被允许回到村子里。由于他妻子的侄女儿家人口多，房子小，根本挤不下，幸运的是邻居住着胡应球先生，就暂时在他家里借住。胡应球先生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蒙难的时候，在永丰舰上担任过二副，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解放后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民国时代，伍汉持纪念医院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对口医院，而且伍伯良也担任过伍汉持纪念医院的院长和其他广东的要职，所以胡家得悉伍伯良因为住所有困难后，欣然将房子借给了他，而且不收取租金。

伍伯良生活中，长期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所以他每天都将房子和周围的环境打扫得井然有序，妻子的侄女儿则在生产队工作后，必然回家做饭后给他送过去，而且每个月还可以回广州探

视妻子和家人，日子也算是平静。只不过有时在广州市区，偶尔遇到一些不讲理的红卫兵，就会遭到他们的皮鞭抽打。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武斗越发不可收拾，为安全计，伍伯良的妻子带了几孙辈也到番禺暂避风头。

这时候村子里的生活反而显得平静。村里有些学医的青年，知道伍伯良的精湛医术，经常前去求教。而伍伯良每次到广州后，就会去购买一些有关医学的书籍，带回到村里，分送给那些好学的青年。

在下放到农村里的那段时间里，伍伯良有过两次中风。第一次中风后，生活上无法自理，但那些受过他教育的青年，都经常前往探视，还将给伍伯良治疗的药方给他先过目。经过了悉心的调理，他的健康逐步有了进展。于是他又开始洒扫环境，并且坚持用井水洗澡。不幸第二次中风后没有再恢复，就这样一个接受过中西方的医学培养，优良的医学人才，从此郁郁寡欢，一直到1972年3月去世。结果是人在广东去世，却要让生活在香港的一百多位亲友，在那里为他夫妇举行了追悼会。

综观伍伯良的一生，专心致力于医术的发展，为的是继承父亲的遗志，服务于社会，那位密告他的同学，当时担任广东省卫生厅长的要职，如能宽宏大度。爱惜人才，延揽伍伯良继续为社会提供医学服务，而能造福于民。遗憾的是在这位同学的举止上，完整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妒才毁才的劣根性。

从他的简历上了解，他毕业于广州中法医科专门学校，和伍伯良同是医学界人士。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将中法之间的庚子赔款奖励有志青年前往法国学习的里昂大学，误称为里昂中法大学。两者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在里昂大学从1921年到1948年间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中，也找不到这位人士的芳名。所以有人以为他和伍伯良是同学，也许仅局限在本国。但他在广州医学界担任过职务是事实。

也许他在医学界看到伍伯良在医学方面的成就高过自己，无形中产生了自惭行秽的自卑感，从而衍生出妒嫉的心态，导致他举发伍伯良，使其身陷囹圄。

到底他和伍伯良之间有什么过节或是介蒂，至今仍然是个谜。在近几十年中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多少都带有配额的色彩。如反右斗争，单位中必须有一定的比例被定为右派份子。如果真如此，那么伍伯良的罪行，必须就是配额比例的一个借词而已。

无容讳言，伍伯良后半生的厄运，完全是拜这位老同学的恩赐，以至于在他临终之前，那些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以及五年的牢狱之灾，和事业的被彻底毁灭，无法令他瞑目，那里面搀杂着永远无法对老同学的宽恕，最后要让后人为他磕上双眼。

他在凄凉地离开尘世前，曾想起母亲于1951年从香港回广州的理由。她认为在抗战期间，曾经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广州，因为大和民族有对烈士尊重的传统，她虽然是中国人的烈士遗

孀，日本人也没有给以任何的干扰。所以她相信，既然是中国人自己当家作主了，理应绝对不可能出现日本式的残酷。

始料不及的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竟然是和他母亲所想象的事与愿违。而这位人士的官运亨通，也只成为一个永远找不到合理解释的鲜明对照。



伍伯良及夫人合葬墓地照片

碑石内容：

伍伯良
胡燕襟
医师合墓
公元一九九一年十月立

众子
孙媳
同敬立



伍伯良夫妇合葬墓地

碑石内容：

伍伯良 医学博士 合墓
胡燕襟 医师
众子孙媳全敬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立



香港亲人为伍伯良举行追悼会留影

弃政从商的伍伯胜

(1903年8月5日—1988年6月2日)

他是伍汉持烈士的第二个儿子，在家里排行老三。父亲就义的时候他才十岁。父亲的遇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肯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他后来皈依基督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的青年时代在岭南大学度过，那里他和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同窗，又是宿舍的室友，在一起打网球，成了莫逆之交。他比廖承志大五岁，但年龄并



烈士次子 伍伯胜夫妇照片

没有使他们有隔阂。主要是因为家庭父辈的关系，又同是国民党革命同志的后裔，廖承志在十六岁(1914)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

随着时代的发展，廖承志的政治追求发生了变化，伍伯胜也因为远赴美国进修，两人的联系开始疏远。而从此天各一方，没有再叙友情。笔者在1978年12月初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廖承志刚

刚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主任职务。他得悉我是伍伯胜的侄女婿，就和夫人经普椿安排在北京饭店和我共进早餐。在席间他反复问起伍伯胜的近况。

伍伯胜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工作。在1927年他进入母校岭南大学担任秘书工作，那正是该校处于地位变革的时期。

岭南大学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由美国的基督教创办，前身为格致书院，到1904年迁移至广州河南的康乐村，改名为岭南学堂。一直到1918年才正式定名为岭南大学。在美国设有基金会。在1925到1927年期间，广州正处在大革命的高潮，校园里的工人和学生接连不断地实行罢工和罢课的活动，学校只得宣布停办。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1927年7月，广东省批准该校收归由中国人自己办学。并且正式定名为“私立岭南大学”。当时有一批从外国回归的留学生，观念前进，而该校的董事长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于是将大学里的行政人员等一概更换为思想活跃的人员担任，任命钟荣光为校长。伍伯胜一方面是美国留学生，一方面又因为父亲生前和孙中山先生同为革命同志，因此孙科将他延揽到学校作为校长室的秘书。

当时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主持市政，在1927年8月12日建议建立广州市无线电播音台，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划，终于在次年5月6日开播，一直到1934年3月播音台改有市政府直接管

理。林云陔委任伍伯胜负责管理播音台的工作。

在此之前，伍伯胜曾在1931年8月担任广州市政府的参事一职，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已经是刘纪文担任，他曾留学英美等国，对于欧美国家的市政建设很有感触，因此在他任内，希望能将广州建设为国际大都市。当美国芝加哥在1933举办世界博览会时，刘纪文筹备在广州举办广州市第一届展览会，邀请了伍伯胜出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总务部长。这时候，他已经和在芝加哥留学期间认识的当地华侨女儿梅燕娜，在广州结成连理。



伍伯胜结婚照片

抗战胜利后，伍伯胜转入到外交部，并于1947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在任期内，中国内战爆发，情势骤变，英国在1950年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也就随着宗主国，和台湾断绝了关系，伍伯胜只得将总领事馆下

旗闭馆。



伍伯胜在新加坡担任外交官工作时签发护照照片

因为他夫人是芝加哥的华侨，既然大陆无法回归，去台湾也非长久之计，经过慎重的商酌，他们决定回到美国定居。在那里伍伯胜转行从事股票市场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逐渐荣升为当地最大杜邦股票公司副总裁，客户遍布全美国。虽然他在商业圈中一帆风顺，但个人生活极为俭朴，为人处世低调。他继承了父亲的宗教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在个人事业有了成就后，他决定前往香港，将母亲留给他的房产出售，并将全部所得捐献给芝加哥唐人街的教会，作为建立教会中青年活动的经费。

他在1988年因病去世，享年85岁。



伍伯胜在芝加哥的墓地

一身音乐细胞的伍伯就

(1910—1974)

他是烈士最小的一个儿子。父亲遇难的时候，他才二岁三个月，所以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他一生不仅热爱音乐，而且视音乐如生命。实际上上苍赋予给了他一副好嗓子。他在21岁(1932)时考入上



伍伯就照片

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追随俄籍苏石林教授主修声乐。毕业后到香港进入当地的苏菲夫声乐专科学校，到1938年毕业。他母亲一直希望他能学到一技之长，于是安排他再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于1942年毕业。但他学法律只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望，自己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的兴趣，所以也从没有执行过律师的职责，一直从事音乐的教学工作，他先在香港培道女子中学担任教职，抗战爆发，他去了重庆，在当地国立音乐院作声乐教授。到1944年被应聘为教育部音乐委员会委员。笔者在1980年访问重庆的时候，曾去参观过当地的音乐学院，在交谈中，大部分的老师居然都是

伍伯就的学生。

为了抗日，伍伯就在重庆因演唱爱国歌曲而名噪一时，深得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赏识。他谱写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为了抗日，他在“北风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慰劳将士歌”，内容是：

起来了，起来了，我们四万五千万的民众。怒吼了，怒吼了，我们保卫着国土的弟兄。看，我们的空军翱翔，倭敌的铁鸟跌落在海洋。听，我们的大炮怒放，倭敌的军舰逃遁又负伤。中华民族，发扬伟力与荣光——杀敌的责任，我们大家一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誓拼热血头颅，誓拼热血头颅，取得民族自由解放。

上海淞沪战争失利后，与英美租界仅隔苏州河的四行仓库，有414名官兵(为了迷惑日本方面，向外宣称有八百官兵固守，故而有八百壮士之称)，由谢晋元团长率领抵御日军，掩护国民革命军向西撤退，从1937年10月26日到11月1日严守仓库，在此期间，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为仓库内的官兵向外传递信息，还亲自将中华民国国旗送到仓库内，以激励士气。消息传出举世震惊，远在重庆的伍伯就深受感动，谱写了“歌八百壮士”，而激动人心风靡一时，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充满了悲壮豪情。歌词是：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

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赶快赶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伍伯就和吉利的合影

他在1946年和妻子周静波同往法国，计划在那里继续发展音乐事业，但后来改变主意前住意大利，进入圣契齐丽雅音乐学院深造，于1948年毕业。由于他的音乐天分，获得当时意大利音乐界的泰斗吉利欣赏，将他的美声发声法尽传授给了伍伯就，罗马世界艺术学院在1962年，给他颁授了荣誉音乐博士学位。在1966年，他前往台北，在那里举行了个人演唱会，教育部阎振兴部长给他颁授匾额，表彰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台湾教育部长阎振兴为伍伯就颁发的匾额

在罗马居住了近二十年后，他最后决定返回香港执教，于1974年在香港病逝。国民党元老梁寒操先生在他撰写墓誌铭时，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和男高音施义桂齐名。

他一生与任何的政治都无缘，始终在他那自我的音乐境界中寻找人生的快乐。



伍伯就在香港的墓园照片

刚烈睿智的伍智梅

(1898—1956)



烈士女儿伍智梅照片

是烈士唯一的女儿，家中排行老二。上有长兄，下有两个弟弟，但从她的言行和个性中，完整地体现出父亲伍汉持烈士的刚强，沉静，善良，和正直精神。她嫉恶如仇，从不妥协，为了老百姓，她可以大声疾呼，就如同她父亲在国会中，向袁世凯发出咆哮正义之呼吁一样。所以说她三个兄弟，除了长兄继承了父亲的行医外，伍智梅无论在家庭或是在社会中，可称得上是父亲的正统遗传。

辛亥革命报人崔通约在他的‘沧海生平’中，推崇伍汉持烈士‘能以革命性遗传於儿女，其子伯良，伯胜，其女智梅，皆勇於公而忘於私…’（注33）此话不假。在伍智梅的心目中，一生只崇拜两个人，维护着一个始终不渝的理念。形成她一生2+1的人生观。她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契而不舍地尊奉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她的父亲伍汉持坚毅不拔，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引领着她一生在事业上的执着。用女中豪杰，或是巾帼英雄来形容她，都体现不出她真正的性格，而且过于庸俗，称她为‘平凡人中的不平凡’更为恰切。有了这两位伟人的影响，铸成她终身献身社会，继承父亲关心医疗发展，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精神，为医疗健康卫生事业奉献的理念，

她生长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中，她的教育也是在教会学校中完成。中学时代在教会办的真光中学渡过。并即进入教会办的广州夏葛医科专门学校，并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深造。就因为她对父亲的崇拜，尤其是父亲为了维护宪政，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而引领着她走上参政的道路。她在21岁（1918）时即加入了国民党。从那时开始，就开始奠定她为妇女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理念。后来认识了从美国留学归国的黄建勋（1895-1926），两人在1919年结成夫妇。有趣的是这对年轻人，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和宗教信仰，但他们没有自由恋爱，而是通过媒妁之言结成连理的。

两人结婚后，因为伍家和国民革命的密切关系，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紧密的合作，加上她夫婿语言才干和丰富的学识，被任命为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金库长，为孙中山先生负责财政事务，兼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因为当时大元帅府库空虚，捉襟见肘的窘迫是司空见惯的，而孙中山先生又有喜爱购买书籍的习惯，经常身无分文，于是他们夫妇两在陪同孙中山逛书店时，伍智梅就得抽身回家取钱，为孙中山支付买书的费用。孙中山和这对年轻人的密切关系也从这些生活细节中看出端倪。在她夫婿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之际，伍智梅是孙中山先生的行政秘书，从而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成为莫逆之交，共同为争取中国妇女及儿童福利而竭尽心智。同时追随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朱执信，古勤勤，孙科，和林云陔等父执辈，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南方革命事业。

伍智梅在1919结婚后，同年秋天，南下的护法国会计划在广东制宪。五四运动的影响，伍智梅身历其境，也激起了参政的愿望。女子国民大会在广州天马巷女子体育学校举行，伍智梅在大会里提议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并提出四点会里的工作宗旨。这四点宗旨是：

- 1 联络妇女界开启其自觉，灌输其所知；**
- 2 对于工商各业当提倡革命，使妇女在生活上得经济独立；**
- 3 多设各种职业专门以及大中小学校，并注重贫民妇女工业教育，**

使妇女得智识技能之解放；

4 注重道德以杜解放后误入歧途，致有损人格而貽后患之虞。

妇女国民大会通过了她的提议，在广东创办广东女界联合会，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个维护女权的机构。当时选出包括伍智梅，邓蕙芳，郑淑，李莲，罗颖新，廖素恩，和苏开瑞等十一名妇女代表，负责筹组广东女界联合会。伍智梅当选为第一届理事。由于是民间组织，缺乏经费，伍智梅就将会址设在旧仓巷家里面。她提出的四项宗旨成为她一生追求有关妇女工作的主要目标。广东女界联合会经过了多次的改组，最后在1931年共设立了儿童幸福，教育研究，妇女生活，法律，社会，卫生，妇女职业，党义研究（国民党党义），教育和艺术等部门。

从此她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蒸蒸日上，民国11(1922)年担任广州市参议会参事，民国14(192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民国18(1929)年出任广州市党部委员，领导妇女运动，提倡卫生行政工作，成绩卓然。这时候，有关她后来一直始终不移的关注妇女保健卫生工作的建议，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中均完整地保存着。

在社会福利，公共事物中，她日夜马不停蹄地忙碌着，还要肩负医院的工作重责。那时候她要主持广州市立育婴院院长，图强助产职校教授。与此同时，家里为了怀念伍汉持的殉难，就在图强医院原址，增设了伍汉持烈士纪念医院，由她和长兄伍伯良

共同主持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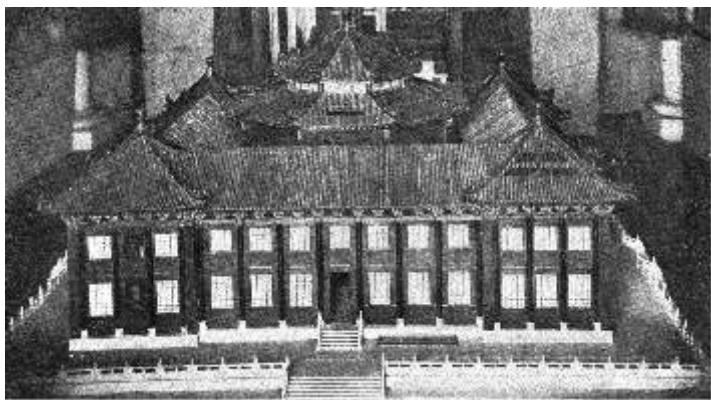
她和夫婿两人追随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奔走，从广州到北京，当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北上的时候，伍智梅和夫婿连同孩子一同随行。到北京后一直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去世，在国葬的仪式中，除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外，伍智梅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执紼人，足证她和宋庆龄关系的密切。

孙中山去世后，伍智梅夫婿继续在北京工作，到1926年病倒，不久即病逝，时年仅31岁。她和夫婿的婚姻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两人追随在孙总理身边，吸取了非常宝贵的工作经历。当时他们已有二子一女，伍智梅还怀了个遗腹子。她忍受着伤夫的悲痛，为了继续在外为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事业四处奔波，她在幼子出世后，只能将四个孩子送回到广州，交给守寡的母亲抚养。

伍智梅从此全身投入社会的福利工作，当然其中是以妇女地位和儿童健康为主。也因此广东省国民党里，她可被称得上是最活跃，最积极而实干的一位女性。从1929年当选为广州市党部委员后，她的职务有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中国国民党第四，五，六届广州市代表，广州市参议会参事，广州特别市党部特派员。1935年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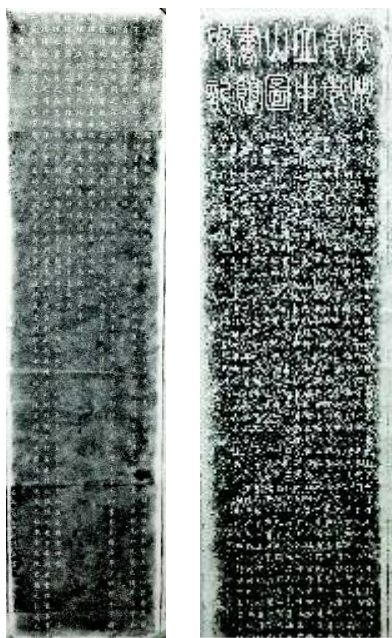
由于父亲生前为革命事业的奉献，伍氏家庭和国民党内的元老等结下了浓郁的友情，其中宋庆龄姐妹，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因为同属一辈，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莫逆之交。而在广州的医学界也广结人缘，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宋庆龄从南京飞到广州，军政首要都在机场欢迎，请示宋氏愿下榻东山宾馆还是城中的旅馆时，宋庆龄简单地说：“不用了，我就住在伍委员的家里”。(注34)展现出两人情同姐妹亲密无间的交情。

在此期间，她忙碌于社会福利和家庭医院的工作中，受广州市市长林文陔的委托，先在1927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考察研究公共卫生及妇婴卫。同时广州市长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提议兴建中山图书馆，令教育，财政和工务三局共同策划，制定经费为当地毫银一百万，其中16万为建筑费，14万为设备费，购置图书等费用为50万。林市长同时委任伍智梅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等国筹募经费，共募得美金十一万多元，折合广东毫银为三十万元，足够建造图书馆的建筑费用，于是在1929年开工，于1933年10月竣工。伍智梅被委任为首任图书馆馆长（从1934年10月15日到1936年8月止）。



中山图书馆门首的石刻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身是清朝末年的广雅书局的藏书楼。地址是广州市文德北路81号。民国元年(1912)，在原址创办了广东省立图书馆。民国16年(1927)，伍智梅在北美洲的侨界筹募到捐款后，兴建了广州市中山图书馆，民国22年(1933)，市长刘纪文向广东省政府请求拨款追加六万元，使得这座有历史价值纪念孙中山的图书馆在同年10月落成。至今在图书馆大门两侧的石板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伍智梅在北美洲集资兴建图书馆的记载。



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碑记

一直到1955年，当地政府才决定将广东省立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合并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该馆在1988年迁移到广州市文明路213号，而伍智梅在北美洲筹款兴建在文德北路81号的中山图书馆，正式改名为孙中山文献馆。

她在1931年再度受命前往美国，加拿大，古巴及墨西哥等国家考察，为兴建伍汉持纪念医院筹募款项，因为她父亲伍汉持烈士的革命事迹，以及后来为维护宪法而英勇就义的不屈不挠精神，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支持，成绩卓著。

崔通约在他的“沧海生平”一书中这样写道：**‘辛亥后，烈士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袁世凯阴谋帝制，烈士独弹劾之，袁怒，乃走天津，卒不免殉国，呜呼，不死不足表现烈士之革命性，人之生死何常有之，且能以革命性遗传于儿女，其子伯良伯胜，其女智梅，皆勇於公而忘於私，今智梅为中山图书馆而挺身来美捐款…。’**（注35）这一段记录，证实了伍智梅不畏艰辛，长途跋涉前往美洲，为筹建中山图书馆募款不遗余力，足见其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拜和尊敬。

由于崔通约为基督徒，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之初，革命党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人数众多。大都抱着舍己救人的胸怀大志，他在描述伍汉持烈士对其儿女的影响时说：**“予敢武断一句，不欲为真实基督信徒则已，如其欲之，非富於革命性，抑亦怜於主也之类而已，观果知树，吾徒共勉焉。”**（注36）

而在1924年的5月，她和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莲等发起演剧创办贫民生产医院，从六月十八日开办一直到1925年的六月，一共为一万多名贫民作了义诊。

抗战爆发后，伍智梅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重庆，当她留置在香港和广州的家，遭到了难以接受的变故时，她却仍然仆仆风尘地为家乡输送物资。那时候从重庆到台山交通极其不便，而公路也因为战争遭受到严重破坏。她只能组织脚踏车队长途跋涉。自己坐在脚踏车后面，越过千山万水，去给乡亲们精神安慰。在归途中她才得悉最小孩子遭遇了不测。

带着丧子的伤痛，继续不懈地为社会福利奔波。她在193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连任四届。与此同时还兼任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并创办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暨抗属工厂。她还有个头衔，是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那是抗战期间妇女运动的领导总机构，宋美龄担任主任常务委员。

在那段时间里，伍智梅因为长期在广东从事妇女运动，地方上的关系密切，这时候正举行广东省妇女会第二届会员大会，选举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按规定必须由当地省主席夫人担任。那时候广东省主席是宋子文，他夫人张乐怡是江西九江人，父亲为当地的建筑商，而她本人对社会活动向来不积极，所以她在获悉当选为广东省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一直想推脱，而伍智梅在妇女界声望崇高，于是就顺理成章的接下了这个职位。



伍智梅和张乐怡合照

为了公事，她和孩子们是离多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孩子教养的疏忽。她接受的是当时最新潮的西方教育，信仰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她对社会的贫苦群体有着慈悲为怀的情操，对受歧视的妇女社会地位心系同情，对青年人健康的孱弱忧心忡忡。为公她分身无术，于是她把孩子寄宿在最好的教会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家庭的革命传统，他要求孩子对国家要忠诚。在这之前她自己先树立了榜样，但也付出无法估计的代价。白瑜先生在1960年为伍智梅写的一篇悼文中，对伍智梅作了这样的描述：

“抗战时期在重庆，再遇见伍女士，她的一切情况，已有变化，成中年孀居，埋头于救济工作，由一个革命世家的名门小姐，变成了饱经风霜的妇女，恋镜绛帷之隙，还要仆仆风尘，为社会服务。她的热烈情绪未改，可是隐藏着的痛苦则遮盖不住，见者同生敬佩之感。经她救济教养成人的孤儿，现在台湾尚可见到。”（注37）

是的，也是因为她具备那坚韧的性格，一生中才能克服隐藏在内心的痛苦。没有人看见过她流泪，更没有人听到过她抱怨。从她那里得到的是积极的服务精神和乐观济人的情怀。从亲人的描述中就可以展现出她感人的精神，她对晚辈要求极严，但他们对她没有丝毫的怨言。为了远渡重洋去学习音乐，伍智梅的幼弟两夫妇，将两个女儿也留在祖母身边。所以当时周边的左邻右舍都笑谈，李佩珍的家里就成了托儿所了。而伍伯就的两个女儿从小就受到伍智梅姑母的严格教育，但是她们对这位历尽沧桑的姑

母却没有任何的抱怨，相反的却对她敬仰有加。

因为长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伍智梅对他倍加尊重，而且由于对先总理的景仰，每次只要一谈到总理，必定是滔滔不绝而深感自豪。事有巧合，伍智梅于1956年在台北去世的那天，恰巧是孙中山先生的九十一冥寿。那天台北正庆祝医师节，一千多名医生聚集在台湾大学医学院大礼堂举行庆祝会。伍智梅应邀发表演讲，他的长子在母亲仙逝后曾写道：“**先母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医学院举行的庆祝医师节大会中，面对着志同道合的朋友，说尽了要说的话，做完了她当天要做的事，就此在她毕生坚持的事业本位上，向尘世长辞了。**”（注38）

伍智梅生前好友，也是台山小同乡，著名的剧作家李曼瑰，在她去世后，根据伍智梅一生事迹，撰写了话剧“尽瘁留芳”，剧目是根据蒋中正先生给她颁授的诔词，从‘鞠躬尽瘁，百世流芳’中分别摘取了两个字合并而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从上而下表彰德行的最高赞扬。伍智梅得此殊荣，也是她一生奋斗奉献的认同。李曼瑰写道：“**梅姑娘—这位奇女子，生不平凡，死也特异。她一生最崇拜国父孙中山先生，平素言谈间，无时不提‘孙总理’。如今她却不迟不早，死于国父诞辰。她生平最兴奋的事，莫过于维护西医的科学精神。现在她却在庆祝医师节的会场上，获得数百医学界同仁的医治，慰问，送终。可谓死得其时，死得其所了。**”（注39）

‘梅姑’是自她夫婿去世后，因年轻守寡，终身不再嫁，周

围的亲朋好友对她的尊称。而她的去世是为终身的信念而死，为坚守岗位的工作而死。正如同她父亲伍汉持在就义之前写下遗书中所说：“**人莫不有死，今以一枪毕命，不犹于展转床褥求死不得者乎。**”

父女二人虽然死的方式不同，但都是那么令人潸然泪下，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为国为民献出生命直到最终。

伍智梅在1938年时代，政治地位节节上升，那时候国民党为了争取全民支持对日抗战，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最高的民意机构，宗旨是向政府提建议和询问案，但是对政府没有拘束力。这一年的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举行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共269人，中央执监委员98人，主席团共17人。伍智梅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中包括蒋中正，汪兆铭，居正，于右任等要员。是次的会议决定了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法。同年七月选出了200名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其中女性只有十人，即伍智梅，吴贻芳，史良，罗衡，张肖梅，刘蘅静，陶玄，邓颖超，王立明，和喻维华等。

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到十五日的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汉口），伍智梅一共有三个提案，一是有关“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条文的修正，在提案中，她和其他连署的参政员提出：

“日常生活节约(卵)装饰是应不分男女的，现在男子有用几十元或百元做一套西装，十余元买一双皮鞋，是其浪费并不在女子装饰下。同

项原文内‘禁止’二字，容易引起纠纷，不如采用新生活运动的‘劝导’方式，使能容易进行，所以主张采（卯）项条文修改为‘劝导国民勿服不需要之衣饰’。”（注40）

其他两项提案则与妇女运动有关，她提出“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因为此案有关战时妇女的全面动员，是该次参政会有关妇女的最重要提案，为使后人了解当时伍智梅的参政方向，有必要将该提案原文和大会决议完整地展现：

理由：

现代国际的战争并不是单靠武力可以取胜，最后的胜负还是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一切人力的总比较。人力是战争中很重要的部分，武力的建立，物力的生产，在在需要人力，所以我国长期抗战，必须动员民众，使民众一致起来，直接或间接参加战时工作，俾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能发挥到最高限度，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妇女占民众的半数，妇女的力量就是全部人力的一半，所以动员妇女是抗战建国中很重要的工作。

抗战一年中，在各战场上，在各种工作上，妇女曾以英勇的毅力，表现过不少的业绩，如救护伤兵，慰劳战士，战地服务，保育儿童，救济难民，以及献金救国，购买公债，妇女都能努力从事，这可以证明妇女在抗战建国的事业中，实具有一部极大力量如能善为领导，加以训练，妇女必能胜任更多的工作，表现更好的成绩，所以要持久抗战，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必须迅速动员妇女。

原文:

办法:

(一) 确定领导妇女运动的机关:

妇女运动在过去因受社会旧礼教思想的束缚，及经济力量的限制，不能迅速地发展，以致二、三十年的妇女运动，祇限于少数都会与城市的知识妇女参加，能微力弱，这样不健全的基础，怎能担起动员妇女的任务？今后应请政府确定领导妇女运动的统一机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协助妇女运动，训练妇女，增加组织能力，来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二) 妇女应参加壮丁训练:

在长期抗战中，男子源源应征兵役，开赴前方，妇女就得准备负担后方工作的责任。所以应该选择体力强健的妇女，参加壮丁训练，以备必要时从事警卫地方，协助军事等工作。

(三) 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事业:

在抗战中，应从速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以巩固国家经济基础。现在战区扩大，失业女工，难民妇女以及出征军士的家属，数目大量增加。这些妇女都陷于无以为生的境地，应该使他们贡献力量于工业，农业及军事国防等生产事业上，这样不独解决了他们生活的困难，又可以发展国家的经济。所以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很重要的工作。

(四) 实施妇女战时教育:

我国国民教育本来就没有普及，妇女教育普及更谈不到。不过为适应战时需要，为着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不得不使妇女受短期的战时教育。

妇女战时教育应分两种：**一是各种技术人才的培养；一是简单的公民训练。在战时工作有许多是妇女能够胜任的，如交通，输送，消防，救护，无线电收发，电话司机，以及传递信息等，都可以由妇女去做。各地政府应选择已受相当教育的妇女，施以各种技能训练，一供战时前方或后方的需要；其他一般妇女至少应该使受短期公民训练，使每个妇女都能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国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并使明了抗战建国的意义，以提高民族意识。**

(五) 救济战区妇女：

抗战以来，战区妇女被敌人蹂躏杀戮痛苦万状，此种无抵抗的妇女徒作无代价的牺牲，殊堪痛惜，应请政府对于战区妇女设法予以救济。体力强健的可以组织起来，参加军事训练，从事协助抗战的准备；老弱的应由政府予以协助，作有计划的撤退，俾得运送后方从事生产事业。

(六) 改善妇女生活：

为着迅速动员全国妇女起见，对于妨碍妇女动员的一切因素，应该尽量设法解除，使她们有充分的自由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有下列两点：1. 应该用政治力量明令废除一切封

建束缚，如禁止缠足，贩卖妇女，取缔童养媳，蓄婢纳妾等，籍以培养妇女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2. 对于劳苦妇女，应相当的改善她们的生活，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之内，有余力可以为国效劳。例如女工方面，拟请求政府严令各工厂实行工厂法，以保障女工最低限度的生活。

决议案文：

本案经大会决议如左：

（一）确定领导妇女运动团体的机关：

妇女运动在过去因受社会旧礼教思想的束缚，及经济力量的限制，不能迅速地发展，以致二、三十年的妇女运动，祇限于少数都会与城市的知识妇女参加，人微力弱，这样不健全的基础，怎能担起动员妇女的任务？今后应请政府确定领导妇女运动团体的统一机关，以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协助妇女运动，训练妇女，增加组织能力，来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二）妇女应参加社会训练：

在长期抗战中，妇女就得准备负担后方工作的责任。所以应该选择体力强健的妇女，参加社会军训，以备必要时从事警卫地方，协助军事等工作。

（三）妇女应参加生产事业：

在抗战期中，应从速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以巩固国家经济基础，现在战区扩大，失业女工，难民妇女以及出征军士的家属，

数目大量激增，这些妇女都陷于无以为生的境地，应该使她们贡献力量于工业，农业及军事国防等生产事业上，这样不独解决了她们生活的困难，又可发展国家的经济，妇女参加生产是很急要的工作。

（四）实施妇女战时教育：

我国国民教育本来就没有普及，妇女教育普及更谈不到。不过为适应战时需要，为着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不得不使妇女受短期的战时教育。妇女战时教育应分两种：**一是各种技术人材的培养；一是简单的公民训练。在战时工作有许多是妇女能够胜任的，如交通，输送，消防，救护，无线电收发，电话司机以及传递信息等，都可以由妇女去做。各地政府应选择已受相当教育的妇女，施以各种技能训练，以供战时前方或后方的需要；其他一切妇女至少应该使受短期公民训练，使每个妇女都能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国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并使明了抗战建国的意义，以提高民族意识。**

（五）救济战区妇女：

抗战以来，战区妇女被敌人蹂躏杀戮，痛苦万状，此种无抵抗的妇女徒作无代价的牺牲，殊堪痛惜，应请政府对于战区妇女设法予以救济。体力强健的可以组织起来，参加军事训练，从事协助抗战的准备；老弱的应由政府予以协助，作有计划的撤退，俾得运送后方从事生产事业。

（六）改善妇女生活：

为着迅速动员全国妇女起见，对于妨碍妇女动员的一切因素，应该尽量设法解除，使她们有充分的自由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有下列两点：**1.应该用政治力量彻底执行禁止缠足，贩卖妇女，取缔童养媳，蓄婢纳妾等法令，籍以培养妇女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2.对于劳苦妇女，应相当的改善她们的生活，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之外，有余力可以为国效劳。例如女工方面，拟请求政府严令各工厂实行工厂法，以保障女工最低限度的生活，农村妇女方面，建立保健事业。**（注41）

伍智梅在第一届第二次大会（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重庆）所提的议案是‘**动员妇女抗战建国工作案**’经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交有关单位‘妥议办法呈核施行’。

她提出的第三个提案是：“**促进公共卫生建设加强救护工作增进抗战效能案**”

该提案的背景是鉴于抗战时期，前线伤员在所难免，必须有后方的救护和支援。于是这个提案中涉及的是加强前方救护工作，包括增设医疗队，增加医务人员，增设战区伤兵运送队。并与此同时促进后方卫生的建设和防疫。并大量培养训练战时的卫生人员。

为了搜寻有关先岳姑母生前的工作记录，我在2011年1月飞往台北，在国民党党史馆里，目睹一份份她在担任党内工作期间所

提的案件，对她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其中有一份她对国民党要为社会服务，为民生福利，而直接向国民党总裁蒋中正的建议书。

※伍智梅上总裁书※

总裁钧鉴：

顷届本党第十中全会开幕之期，谨拟具党务工作意见二项连同说明及办法敬陈如次：

一、本党在各地地方党务工作，要从社会服务，福利民生之事业着手，切实达到党与民众结成一体之目的。

说明及办法：各地方学校医院救济院等福利慈善事业，现多由政府主办。惟为本党切实达到与民众结成一体之目的起见，应由本党在各地地方党务工作，增设社会服务部门，以民众之身份，经办学校医院等福利民众之慈善救济事业。兹训政时期要树立党在民众之基础，以利本党宪政之推行。

二、本党应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时期生产工作，以补充及替代役男之工作。

说明及办法：统计全国妇女二万数千万人，此项人力确属极大，要发动而利用于各部门生产工作方面。其所生产之物资数量更为庞大。在第一次欧战时期，男性壮丁服役前方，在后方之生产工作由妇女替代补充，甚至教堂宅院内之隙地，皆由妇女耕种小麦菜蔬供应军粮。至于纺

纱织布缝纫衣服装，制食物干粮等，尤为安定民生供给军需之重要工作。此项工作均以动员妇女担负较为适宜，况动员妇女从事生产工作，使妇女生计无困难，则出征军人自无顾念家庭生活之必要，其影响于军心必大。是动员妇女亦即增强抗战力量，惟在动员之前，本当应有详秘之计划，组成各部工作之体系，分别部门实施短期之训练，再按其受训之技能分发给各工作部门服务，足可补救现在人力缺乏之困难。处此抗战第六年人力物力均感困难之际，对于半人口数之妇女不应放弃其人力，令其无发挥之机会。

伍智梅在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曾提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案，又在第五次大会，曾提请政府推进妇女代耕以增战时粮食生产案，又在第五次大会曾提请政府通令各省均应推广妇女手纺织业，以利战时生产案，均经决议在案。惟动员妇女办法应确定之负责机关办理方能切实施行。

所拟本党工作意见二项是否有当，理应禀陈钧鉴以备采择谨肃恭叩

崇安 伍智梅谨具备(印)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这份保存在国民党党史馆里的资料，用的是‘中华妇女职业协进会抗战缝织工厂’用笺，信纸下方还印有该厂的厂址：重庆西岸海棠溪罗家坝。文件中还附有批条：

“伍智梅同志意见书一件移送大会党务组参考”

铁城(签名) 11.11

在国民党党史馆里，我还发现了一份伍智梅早在民国24(1935)年11月18日就曾提出“促进完成我国公共卫生行政设施计划案”，在提案中，她建议“负行政之责者宜用科学方法，以保护国民之生命及幸福。在消极方面当减少疾病与死亡之数量及预防痲疫之发生。在积极方面，须增进国民之健康及寿命。”(注43)

她还将中国当时的健康情况和欧洲作了惊人的数字比较。她举出欧洲每年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以下，而中国人民之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左右。两相比较中国人每年死亡之数约有六百万人之众。



伍智梅在参政会议中提案的部分联署人名单(注44)

她还举出中国学童的健康情况令人担忧。常态学童百分之八十均患有缺点，已有病症者三分之一，如不速求纠正，防患于未

然，则此过半数之优秀青年身体日渐积弱旋至病死。

为此她在提案中呼吁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性，为延年益寿及增进健康之科学艺术，并不仅以诊断及疗治为满足，更须研究疾病之起因，凡人体遗传，家庭状况，个人习惯操作休息，所处环境等，均须详加考察改善，范围至为广泛。

以后在历届大会中，她几乎都会有提案，内容几乎都是围绕在公共卫生，人民健康的议题，非常实际具体而不是空洞无物：

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上(1939年2月12日至21日重庆)，她的提案是：**‘中央及各省县市农业机关应尽量辅导农村妇女发展生产事业’**。

大会决议：**‘原案通过，送请政府采择施行’**。

第一届第五次大会上(1940年4月1日至10日 重庆)，她提出**‘请政府通令各省切实推广妇女手纺织业，以利战时生产案’**。此案通过，送请政府采择施行。

同一次大会上，她有提出**‘请政府推进妇女代耕以增战时粮食生产案’**。

在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上(1941年3月1日至10日重庆)，她提出询问**‘关于优待抗属办法之实施情形案’**。同时提出：**‘请政府为出征抗敌军人子女实施教育养成其生产技能以增抗建生产力量案’**。

在第三届第二次大会中(1943年9月18日至27日重庆)，她提出询问：**‘关于训练人才通盘计划案’**。同时分别提出；**‘请政府从速加强培植医事卫生人才积极推行公共卫生实施’**和**‘广东沿海各地灾情惨重应**

请政府迅拨巨款救济案’两个提案。这后一个提案叙述了当时广东灾情的惨状催人泪下：

查广东素来缺粮，平时洋米进口岁逾千万市担以上，人民生计端赖侨汇鱼盐，自广州潮汕失陷，洋米接济已断，除增种什粮补救外，缺米仍多，所赖邻省接济，数亦不逾百万市担，各属人民多自节食，改饭为粥，已历数年。迄太平洋战争发生，美洲南洋侨汇全断者几及半年，今虽略有恢复，已不及平时五分之一，而侨胞被迫归国，为数又在六、七十万以上，政府曾拨巨款救济，幸获还乡，但生计骤失，都成赤贫。去年不幸，早晚两造无收，今年春夏间，复遇亢旱，粮荒益甚，米价暴涨，每市担高至一万元，低亦二、三千元，重以粮价高涨之故，使沿海产盐县份，因运费增加，而无法运销之存盐，达三百万市担之巨，盐民生计感断绝，遂致饿殍载途，弃孩到处，见者坠泪，问者伤心。现查灾情最惨重之区，如台山本百万人口，今仅存七十余万，惠来，陆丰各四十余万人口，饿死者皆逾十万以上，海丰人口五十万，饿死者逾五万，此一带沿海渔民，已死去十之七、八，惨状尤难尽述。其他如潮阳，揭扬，普宁等县，饿死者皆逾万数。除江北一带各县尚无严重灾象外，其他各县饿死数千人者，不便悉举。逃亡赣，闽两省者数在二十万以上，今犹络绎不绝，灾情之惨，实为数百年所未见。虽幸赖五月中旬后天降大雨，早稻平均尚有五成收获，政府亦曾拨赈款千万，施行急赈，人民始得稍甦，惟灾余人民，已将耕牛宰杀，即衣服用具甚至屋舍木瓦，亦变卖无存，其因饥不择食，致身体由疴瘠变成双脚浮肿，不及早救治，亦终难活命者，亦尚有数十万人。

最近旅渝粤籍同乡，组织粤灾筹赈会，曾筹募一千万元，派员回粤散赈，杯水车薪，仍难济事。近冬令将届，饥寒交迫，非赖政府迅拨巨款，加筹急赈，标本兼施，其惨状有不堪言者。（注45）

从这个提案中可以窥见当时中华大地南方的灾情，伍智梅人在重庆，却细心地观察了解到广东地区的悲惨情况，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态，向政府提出给灾区伸出援手。

并要求政府对于征购广东粮食一事，予以豁免一年，这一提案获得通过，并特准酌于豁免。

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国民健康公共卫⽣的关切，始终不渝地向政府呼吁。在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中（1944年9月5日至18日重庆），她提出：“**请政府从速切实推行县市乡镇卫⽣工作以保民族健康而维国本案”**。

在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中（1945年6月7日至20日重庆），她连同其他三十六位参政员提出：“**请政府从速加强卫⽣建设实施案”**。此案经修正通过。在提这个案子的时候，她特别倡议采用公医制度，使得全国人民不分贫富，均获有享受同等保障健康及医疗之机会。因为她看到当时的中国一般国民健康水平太低，人民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而且传染病普遍，医疗条件极端缺乏。

在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中（1946年3月20日至4月2日重庆），她提出两项质询案：**一是有关发展民营航空事业之计划，另外一个则是如何推行农业五年计划。并且提出“请政府从速加强职业教育设施以利建**

国案”。此一提案经修正通过，抗战胜利后，政府迁回到南京。第四届第三次大会也就在南京举行(1947年5月20日至6月3日)，她先提出一项询问，是有关赔偿物资分配之标准如何案。接着她又为广东提了两个议案：一是‘为增加粮食生产请政府拨水利贷款四百亿元以兴办粤省农田水利工程案’，另一是‘请政府迅速完成广东省水利工程籍增粮食生产以裕民生案’。(注46)

综观上面所述各项提案及质询案内容，伍智梅在四届参政会中，尽忠尽职，始终不懈地在每次大会中，必定有提案，而她所提的案件中，几乎都和妇女，抗属，卫生，医疗，教育，生产，和救灾有关，而具体的目的是要在抗战大业中，争取民族独立胜利。而她的提案都得到当时其他参政员的支持连署，大都得到通过施行。这反映出作为一个参政员，她认真，负责，不唱高调，



伍智梅的墨宝 现存国民党党史馆

所有的提案都和她的业务有关。从提案的内容看，里面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任何政治的宣传。她执着的是对人民健康和福利的关心。

她生活在政治圈里，但没有把玩弄政治作为她的方向，也从不参与任何政治的派系，她只是兢兢业业地通过政治，积极地推广医疗，卫生，特别是妇女的权益和社会地位。她既继承了父亲的革命理想，也延续了父亲行医的善举。同时肩负着母亲对弱小女子关怀的情操。有了家庭的教育，再加上自身的努力，配合了宗教信仰培养出来的爱人如己的心胸，伍智梅的参政目的也由此可见一般。她没有为自己。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她的无私精神，促使她能放弃一切的享乐，不计较个人的利益，而专心致力公共的事务就是她生命中的最大乐趣和安慰。

她在一九四八年当选为立法委员，这时候中华大地风起云涌，烽火四起，她人在广州，宋庆龄以多年挚友的身份，从上海将一封英文书写的私人函件，托人送到飞往广州的最后一个航班上，目的是想劝说伍智梅留下不要去台湾。何香凝也作了相似的劝说。但她对任何事情既然作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的个性，没有让她接受宋庆龄的劝说。宋庆龄的失望可以想象。于是她从广州先去了香港，而两个好友从此天各一方。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她在一九五零年决定前往台湾。

就因为她一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亲眼目睹孙中山为推翻满

清，创建共和的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以及他父亲伍汉持烈士，将短短的一生全心全意地奉献在为民族前途，以及维护宪政，不惜挺身而出冒犯袁世凯，导致以身殉国。这两位革命先辈赋予她终身深切而巨大的影响。她在政治圈里没有所谓的敌人，有的只是理念的不同。伍智梅完整地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从而对父亲不仅崇敬有加，而且在日后一生中的追求，凡事皆以父亲为楷模。所以她对国民党的忠诚，也是从孙中山先生和父亲的革命传统中一脉相承。

伍智梅到了台湾之后，生活和事业与在大陆时不可同日而语了。从她十八岁加入了国民党之后，始终不渝地勇往直前，也因为她的大公无私，遭到周围一些不公的批评也很自然。在家里她也曾被子女误解，因为她把孩子都交给了母亲照顾，她自己就一心一意为社会奔波。但也因此得到了当代‘奇女子’的尊称。在医学方面，她继承了父亲仁医的荣誉，为人民健康，为社会卫生，为妇女保健，为贫民义诊。从而献身于中国医学现代化，台湾今天的全民健康保险，在很多方面是伍智梅高瞻远瞩的实现。作为一个当代的女医生，她还将充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运用在其他诸如社会，教育，经济生产，慈善事业甚至救灾等领域里而奔驰驰骋。

然而到了台湾后，也许是社会环境使然，她和其他从大陆到台湾的人士一样，虽然没有以前的雄心壮志，但却安贫乐道，得

到了家庭乐趣和温暖。也弥补了她年轻时对孩子的疏远。在她一生中的最后六年里，终于让她享受到短暂的天伦之乐。

而她在台湾立法院的最后一场论战，是有关筹设中医学校的提案。她并不是反对中医，只是认为中医缺乏科学分析，其中含有过多的迷信和落后概念，要发展中医，必须要具备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因此她建议应该先设立中医药研究机构。当时她的小同乡李曼瑰，亲眼目睹立法院里唇枪舌剑的火爆场面。伍智梅用她数十年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强调中医需要科学化的论调，在大会中力排众议。那时她的健康情况已大不如前，而且患有甲状腺病，按照医生的告诫是不能动火。而在那次的辩论中，李曼瑰摸着她的手，只感到冰冻如水，听见她的心房蹦蹦在跳。当时另一位立法委员高廷梓对李曼瑰说：“**梅姑发言的时候，连我的心也蹦蹦跳，生怕她晕倒在台上呀!**”（注47）

事实上，就是因为她的急性子，使她一生在对公的事业上毫不留情，她快人快语，但从不与人争自己的利益，她的一言一行都是为着妇女，儿童，社会的弱势者。尤其是医学卫生方面更是坚持己见。因为生活在一个积弱贫穷落后的社会里，个人的安逸不是首要，更多的是亿万人民的福祉，因此她没有因为有了家庭为她打下的基础而稍有意惰，反之她更趋向努力奋斗。目标是强国强身，纵然舍己为公也在所不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九十一诞辰纪念，

同一天也是台湾的医师节。医学界一千多人集聚在台湾大学的大礼堂举行庆祝会。伍智梅因为追随孙中山工作多年，而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是医生，所以应邀在大会讲述孙中山的生平事迹。与往常一样，她激动地讲完后，用简单的结尾说：“**敬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就突然昏倒在讲台上，瞬间离开了她鞠躬尽瘁一生的世界，终年五十九岁。她的去世就如同她一生的利索果断经历，没有任何的痛苦，瞬间即逝。

在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资料中(230-3174号存档)，我看到中央日报在民国四十五(1956)年11月13日和14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立委伍智梅逝世，友好今商讨追悼**”

文中记录了她昏倒在讲台上的情况，当时在场的有医师高大成，台北医院院长熊丸，医师工会理事长周百鍊，卫生司药品经理处处长陈东震等，都立即先后给以急诊，但回天乏术，事后立法院张道藩院长，和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等都一致赞扬伍智梅出自革命世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这说明她一生光明磊落地完成了对社会的奉献。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在她后人的陪同下，我去了台北近郊阳明山的基督教公墓，向伍智梅致敬。公墓中不乏金壁辉煌的墓园，唯独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见到一座已经斑剥的白粉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好几个简单的骨灰穴，外面用灰白的大理石封住。



伍智梅在台北的墓地照片

在最靠边的一个大约一英尺见方的骨灰穴，大理石上刻的字都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需要走近才能依稀可见左上方是她的遗容，依稀可以感受到她那慈祥的笑容，然而笑容中含着她那刚毅沉稳的性格。墓碑中间刻着她的名字，旁边是她的出生年月日和逝世的年月日。她是在1896年12月24日出生的，逝世的日子是1956年11月12日。离她的花甲之年只差六个星期。巧合的是她出生的那天，正好是基督耶稣的诞辰日。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履行了一个教徒的职责和义务。谁又能知道，在这个简单的墓穴中，竟然是为振兴中华而在医学发展，卫生服务，妇女运动，儿童福利，人民健康，和救灾扶贫各领域里呕心沥血了一生的女性最后的归宿。这也展现出她生前的朴素和死后的平凡，

代表着她生命中的真谛，以及对待生命的价值观。即便当时蒋中正先生为她题写了“尽瘁留芳”谀词，至今也早已无影无踪。这反映出她对浮光掠影般的名利的淡薄。

烈士家庭的命运

伍汉持烈士在1913年被害的时候，伍伯良是唯一成年的儿子，他那时已经二十岁，女儿伍智梅才十六岁，其他两个儿子分别只有十岁和一岁，都需要母亲的抚养，夫人李佩珍含着悲伤的心情，一面要秉承先夫的遗志，把治病扶伤的医学事业继续下去。还要肩负起培养四个孩子的重任。为了前途长子伍伯良远赴天津，考入北洋海军医学堂学医，所以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人，独自挑起位在广州市旧苍巷伍汉持生前创办的图强医院和图强助产学校，也因此更增强了李佩珍不屈不挠的个性。

由于伍汉持为维护宪政尊严，而被袁世凯谋害，同盟会的一些革命同志，对烈士的遗属照顾备至，对烈士的子女也呵护有加，尽量给以协助，尤其是胡汉民等前辈，对聪明伶俐的伍智梅的照料更是无微不至。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和伍智梅情同姐妹，两人经常是形影不离。也许是父亲的遭遇，或是父亲的遗传，锻炼出伍智梅嫉恶如仇，处事果断的性格。她在十八岁(也就是父亲被谋害的第二年)决心加入国民党，就可以看出她要继承父亲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勇气。她的能力和智慧令她从1922年就开始在国民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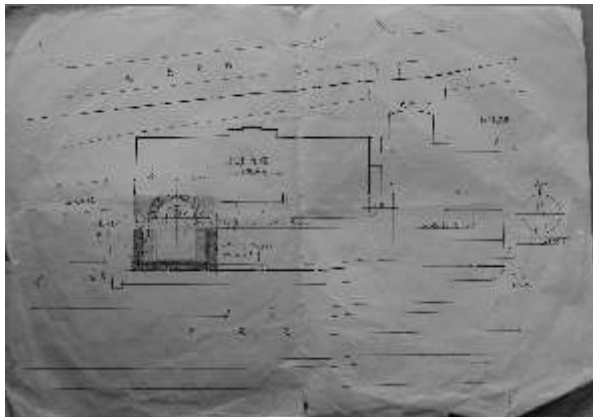
展露头角，她在192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时，开始主持伍汉持纪念医院，广州市育婴院院长，和图强助产职校教职。

在广州中山图书馆珍藏的资料中，就对伍智梅的机灵善言有这样的描述，为了公益事业，她需要政府支持时，只要通过她和胡木兰到胡汉民办公室，叫一声胡伯伯，她就能把所要的政府援助拿到手。抗战胜利后，广东曾发生粮荒，伍智梅偕同胡木兰进京呼吁，并进谒党政要员，叫声世伯，即解决了广东的粮荒。

她的能辩善言也获得当时广州市政府的青睐，在1928年指派她去美国等地，为筹建中山图书馆募集资金，那时候她才华出众。广州市在1932年又委派她去美国等地，为兴建伍汉持纪念医院筹募赠款，她也顺利完成任务载誉归来。

她筹建的中山图书馆至今仍然在广州市运作，而且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新图书馆已经扩建落成。当年图书馆建成后，她担任了第一任的馆长一职。为筹建新的伍汉持纪念医院，广州市政府东郊外东沙马路汪岗拨地(就是今天的东风东路)，在1935年开始动工，1937年落成。医院的宗旨是本着烈士的博爱精神，为社会提供贫病医疗和救伤救护工作，并协助政府推行卫生等公共利益。在抗战期间，该医院不幸遭受到日军的蹂躏。待抗战胜利后，医院几成废墟。经过当时的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拨款在1947年予以修复。

烈士后人在1937年将原设在旧仓巷的伍汉持纪念医院迁移到新址后，也将伍汉持烈士的墓从耶稣坟场迁移到医院的庭园中，作为烈士的永久安息处所。



伍汉持烈士墓原址图

伍汉持烈士生前在1906年自香港回到广州后，夫妻两人在仓边路的旧仓巷39号，先惨淡经营创建了图强医院，随后为了让夫人能协助当地妇女接受现代化的接生技术，他们就在旧仓巷51号开设了图强助产学校。他夫妇选用“图强”命名医院和助产学校，意思就是鼓励后人要发奋图强，振兴中华。后来在大东门荣华南路9号，开设了图强医院分院。建立的具体日期应该是在1929年左右（广州市政府统计年鉴里有记载）。烈士就义后，家人为纪念他，就在旧仓巷的图强医院里设立了伍汉持纪念医院，由长子伍伯良夫妇和女儿伍智梅主持日常业务。一直到1932年，经过伍智梅在

海外筹得捐助，又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拨地，在今天的东风东路，兴建了伍汉持纪念医院。经过两代人，用了三十年的辛勤工作，才有了后来的规模，烈士在医院庭园中安息，如在天之灵有知，肯定也会含笑。

然而在内战爆发后，伍汉持医院以及他后人的命运，居然都因为伍智梅的政治信仰而出现一连串始料未及的牵扯，继而遭受到意想不到的厄运和折磨。其实伍智梅的政治理念仅止于对孙中山的崇敬和对父亲的怀念。即使她对政党的忠诚，就如同任何政党对其党员的要求一样，也是极其自然无可非议的。然而在背负着数千年封建传统，受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观念束缚的中国政坛中，失败的政党成员，就必须面对成功者的惩罚或处置。伍智梅也因此无法逃过这历史潮流中的‘常规’。也因为她的信仰，父亲虽然为国牺牲，也无法避免遭受牵连的命运。

自她追随孙中山后，他和宋庆龄之间所建立的姐妹之情，也因为信仰理念的不同，最终也必须要被一笔勾销。当内战接近尾声前，她接到宋庆龄从上海发出的函件，希望她能够留下来，但她还是决定离开广东，先去了香港，再转到台湾。但她把孩子都留在母亲家里。却因为她的政治背景，家人和孩子们也就受到无情的‘株连’。

广州在1949年迎接解放后，烈士的遗孀接到通知，被允许继续经营原有的各医院，家人都以为可以相安无事，为此而感到无

比的欣慰。然而事与愿违，到1951年整个的情势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烈士遗孀接到通知在24小时之内，必须将图强医院和图强助产学校交给政府。医院内所有的财产一律不准移动，家属只准许带一两件换洗衣服离开。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已经高龄的烈士遗孀不知所措，但她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彻夜商议决定，长子伍伯良一家在仓边路附近的豪贤路临时租屋居住，烈士遗孀则带了幼子伍伯就的两个女儿，搬到大东门外荣华南路9号的图强医院分院居住。在搬出医院的时候，伍伯良要求准许他保留和妻子结婚时的一个金戒子，也被拒绝。这个来得突然而且是有违常规的命令，家人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

两年之后，政府进一步下令要接管图强医院分院，烈士的遗孀和两个孙女，再度面临被搬迁的命运。她在惠福西路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小楼，也是烈士遗孀唯一的产业，成了她的最后安身之所。而三座烈士及其后人经营的医院，从此成为伍氏家人的一个心结。

政府接管了三家医院后，图强助产学校在1952年9月由广东省卫生厅接管，改名为广东省第一助产学校，随后在1953年8月归并到广东省卫生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医药学院的前身。与此同时图强医院的所有财物一并移交给惠福路的广东省人民医院。烈士遗孀后来在生病住院的时候，目睹先夫呕心沥血经营的医院财物后百感交集。

其他的家属则被安置在一间阴暗的屋内居住，当时他们还年幼，而广州又地处热带，夏天酷热，而他们所住的屋子却是出奇的阴凉。等他们长大后，才发觉原来给他们安置的地方，是医院的太平间。而这些天真的孩子居然在停尸房里住了两年左右。

经过这一连串的急剧变化，伍家了解到原来他们的命运是被操纵在一个和伍汉持烈士先后为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又是医学界的同行。然而使烈士后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有革命渊源的确‘同志’。据说他也曾参加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在1922年北上的时后他也随行。应该同伍智梅很熟捻，后来还晋升为军医总监兼陆军军医司司长。在1926年随国民党革命军北伐，任第四军军医处长，而竟然将伍汉持烈士的子女陷于绝境。因为他的举报，伍智梅被带上‘反革命现行犯’莫须有的罪名。理由是她烧毁了国民党给她的委任状。其实伍智梅早在广东被解放前就已经离开了，即使她烧毁国民党的委任状，也不是在新政权的眼皮下。只是对她罗织这样一个罪名，目的是为关押她长兄伍伯良而塑造一个借口。

假如她接受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慰留，真的留了下来，虽然和她们之间存在着亲密无间关系，但是在那疯狂而又不讲理的时代里，她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吗？那么她的离开也就是自身明智的选择了。而这个莫名其妙的罪名，也正体现出大圈圈和小圈圈中非理性的斗争结果。她一生奉献给国家，默默地为争取妇女社

会地位，保护儿童卫生，增进青年身心健康。是她生活中的全部。

而这位告密者，和伍伯良之间究竟有什么界隙，由于当事人没有明说，也就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只有他给伍伯良造成五年的牢狱之灾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大革命期间，伍伯良被控制在广东番禺接受劳改。但他始终以坦荡之心，对待那个陷他于不义的人，一直到他临终，始终没有说过一句非言，只是家属感到，后人应该知道，这身心的创伤。烈士遗属被扫地出门，医院被接管，家产被没收，烈士子女背上莫须有的罪名，都原自于一个人的一句话。经历了一个甲子的时代，又有谁出面说一句公道话？

烈士墓地的无妄之灾：

伍汉持烈士于1913年8月19日在天津遭遇不测后，由于袁世凯的爪牙遍布全国各地，他的遗体也经过了几番波折，才得以在第二年的八月十九日，也就是他就义的一周年，安葬在广州的耶稣坟场内。到1937年位在广州市东风东路的伍汉持纪念医院落成后，家人将他的墓地也迁移到医院的庭园中，满以为能使先烈从此长眠安息。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要面对敌人的屠杀摧残，遭受生灵涂炭的厄运，位在广州市的伍汉持纪念医院也未能幸免，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所幸烈士墓逃过了一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经过八年艰辛的抗战，医院修复了，也堪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但命途多舛，内战结束后，家人目睹烈士生前追求的共和体制得以实现，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期待着安享太平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迎

接来的希望之光，如同那灿烂的烟花，瞬息间就化为灰烬。当家人忍受着悲伤离开医院的时候，烈士的墓园也无法避免人间的灾难，如同活人般地，从此沦为被斗争，破坏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灾难已经不是烈士家人的专利品了，所有的中国人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满目疮痍的恐怖时代。假如中国人都必须面对那无法逃脱的灾难，那么烈士的家人也只有逆来顺受。经过了坎坷历程的医院，因为他的历史背景，也就必须被贴上不光彩的标志，医院里的员工也没有权力拒绝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当然伍汉持烈士的墓地也在不分青红皂白，没有是非对错的时代，彻底的被破坏殆尽。在那种阶级对立的环境里，在家人自身的安危都无法顾及的现状下，谁敢去过问先人墓园的命运？

一直到1979年的夏季，笔者和妻子第一次回到广州市访问，妻子满怀着对祖父的崇敬之情，和对祖母抚养她姐妹的感恩，自己去了伍汉持纪念医院寻找逝去岁月中的点滴。那时候医院已经被改成肿瘤医院。而1937年建造的老建筑，像孤独的老人，日夜守望着，盼望着家人的归来，她抚摸着那斑剥的粉墙，似乎那里仍然隐隐约约存留着她童年的欢笑。



伍汉持烈士墓，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的现场

展现在眼前的一切无法令她相信那是事实，就在她第一眼望着祖父的墓地时，她惊呆了，她无法接受被那些无知狂妄流氓式的摧残。她记忆中的那座庄严的墓园已荡然无存，散布在四周

的是被敲碎的石块，祖父的墓碑被敲成两半，石碑上“伍汉持烈士墓”六个大字，分别在两块破碎的石碑上。妻子万没有想到，为争取共和，为这个苦难民族牺牲的祖父，在中华民族经历了逾半个世纪的坎坷路程，却还要遭受这无法想像的屈辱。最令她愤怒的是，医院的职工散坐在那被毁的墓园周围，手里端了一碗饭，边吃边嘻笑，厨房里的员工，还在墓园里一些较大的石块上晒咸菜，是有意的无视烈士墓，还是对历史的无知都已经不重要，悲哀的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全丧失了传统的对逝去者表达崇敬的道德观念。

含着悲痛的心绪她回到酒店，将这情况对我大概地叙述了一番。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海外，对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丝毫的概念。也不了解那些红卫兵是何方神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为所欲为，即使对为维护宪政而献出生命的先烈墓园，也竟然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摧毁。



经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拨款修复后的烈士墓

回到加拿大后，我向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出函件，请他们就岳祖父墓园被毁的事作出调查，并要求按照中国的习俗，将

烈士的墓园修复。经过十多年的等待，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广州市拨了人民币二十万，作为修复先烈墓园的经费，最终得以将墓园修复，但其规模和材料都和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原来的花岗岩，成了粗糙的水泥地面。原先的墓园中有一块汉白玉的墓碑，上面刻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撰写的碑文。但是这块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汉白玉墓碑却不知去向。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接到我的要求，决定拨款修建烈士的墓园后，因为医院在紧邻烈士墓园的空地旁边建了厨房和供应室，显得极为拥挤，而且将烈士墓修建在厨房旁边也显得不尊重，于是在医院中另外选择了一块空地，作为烈士的安息处所。

就在施工复原先烈墓地的的时候，医院厨房旁边供应室的一个屋顶角落漏水，院方安排了工人给以修理。当工人们打开屋顶下方石灰内墙的时候，赫然发现一块近三米高，宽一米的汉白玉石块藏在墙内。经搬出来检视，那竟然是失踪了多年的伍汉持烈士墓上的石碑，而且完好无损。工人们立即通知医院，院方再通知文物单位前往了解。经过了检验，让文物单位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在墓园修复后，这块记载着历史的石碑重新树立在墓园中。唯一遗憾的是，伍汉持烈士的遗骸仍然是毫无踪影，修复的墓园也只能作为一座令人瞻仰的代表性文物古迹了。



伍汉持烈士墓修复后，海外后人到广州扫墓祭奠留影

因为这块渺无踪迹的石碑失而复得，使我深信，烈士遗骸的谜底也会被揭开，只是需要时间。也因此引起我追踪烈士遗骸下落的决心。在这期间，我曾再度前往广州，去拜访肿瘤医院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他们曾经在被砸毁的墓地里外四周探寻过，墓

里既无烈士的遗骸也没有任何的遗物，根据他们的推论，先烈的墓，就如同红卫兵破坏其他古物一样，可能被彻底毁灭，要不然烈士的墓可能仅是一座衣冠冢。他的推论只能让我将信将疑，但对红卫兵破坏烈士遗骸的解说，我还真有点担忧。果真如此，那么即使恢复了烈士的陵园，也只能是一座象征性的墓园了。但我内心始终存有无法解释的疑惑，成了我追寻真相的推动力。我告诉自己，对这位亲人又是为了维护宪政的烈士的墓园，我必须找出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来釐清心底的疑惑。

因为这块渺无踪迹的石碑失而复得，使我深信，烈士遗骸的谜底也会被揭开，只是需要时间。也因此引起我追踪岳祖父遗骸下落的决心。在这期间，我曾再度前往广州，去拜访肿瘤医院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他们曾经在被砸毁的墓地外四周探寻过，墓里既无烈士的遗骸也没有任何的遗物，根据他们的推论，先烈的墓，就如同红卫兵破坏其他古物一样，可能被彻底毁灭，要不然烈士的墓可能仅是一座衣冠冢。他的推论只能让我将信将疑，但对红卫兵破坏烈士遗骸的解说，我还真有点担忧。果真如此，那么即使恢复了烈士的陵园，也只能是一座象征性的墓园了。但我内心始终存有无法解释的疑惑，成了我追寻真相的推动力。我告诉自己，对这位亲人又是为了维护宪政的烈士的墓园，我必须找出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来釐清心底的疑惑。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逐渐地发现许多令人宽慰的资料和

旁证。先烈的后人看到这失而复得的文物既高兴又感慨。高兴的是先烈的墓园得以还原，而感慨的是先烈在就义后，因为袁世凯幕僚及其爪牙的诸多干扰，家人给他安排的丧礼更是一波三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半个世纪后，如此荒唐的行径居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演。

令烈士后人欣慰的是，伍汉持在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披荆斩棘开拓了医疗的服务，他牺牲后，长子及女儿继承了先人的遗志，将医院的业务发扬光大，继续为老百姓服务。虽然后来医院被没收，但在政府的支持下，规模日渐扩大，能为当地居民造福，也等于是实现了烈士生前的理想。医院里最早的大楼，是在烈士子女的努力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等地的华侨捐献支持兴建，于是将原来在旧仓巷的伍汉持纪念医院，搬迁到现在的位置。大门首原来悬挂着伍汉持纪念医院铜牌，据说是孙中山为最早的医院亲笔书写的墨宝，也从原来的医院移置到现址的。当医院的名称更换为肿瘤医院后，原来的旧楼已经无法满足日渐增多的病患者，于是医院在原址加建了新楼，并将原来的旧楼融合在新楼中，如不仔细观察，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新旧楼的区别，只是那块具有历史意义的铜牌，也因此下落不明。

先烈的墓园修复之后，后人的唯一愿望，就是希望院方能考虑将原有的铜牌恢复悬挂在旧楼的入口门首，作为纪念烈士和孙中山先生之间的革命精神。于是先后多次和肿瘤医院进行交涉，

笔者最先到广州和当时的医院院长商酌这一要求。院长在答复笔者的建议前，先婉转地赞扬犹太人对公益的热心，尤其是在美国，犹太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社会捐献兴建医院。

他话锋一转，立即向笔者提出，先烈的家属可以参考犹太人的传统，不妨考虑向肿瘤医院先作捐献，这样院方即可按照家属的要求，将原来的医院铜牌恢复悬挂。对他的这一建议直接的反应是，原来要和烈士的家属谈判利益的交换。我直截了当地回复他称，医院是在1951年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而被没收的，而且原来的医院是海外华侨捐献所兴建，其意义和犹太人向社会的捐献是一样的。而我的提议并不是向医院索取赔偿，只是要求医院给以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意义。当然那次的谈判最终是不欢而散。

居住在美国芝加哥和加拿大的先烈后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先后到广州肿瘤医院提出类似的建议，而医院方面的答复却以更为苛刻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甚至是明码开价，在1992年旅居在美国芝加哥烈士的次子伍伯胜夫人梅燕娜，经烈士孙女儿伍敏德陪同下，访问了广州，并和肿瘤医院接触。院方告称对烈士的墓园将会妥善保护，并对伍汉持纪念医院的发展给以支持。伍伯胜夫人在临行前，还特地写了封信给广东侨办(见原件)，表达了对医院安排的满意。信中还特地指定两位家属继续和有关方面联系。然而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信息了。代之而起的

是令家属感叹，无可奈何的经历。

在那次的会晤中，医院方面还对伍伯胜夫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假如先烈家属可以捐献人民币一千万，院方就可以考虑将医院还给家属经营。伍伯胜夫人并没有给以直接的回应，只觉得这样的要求明显的是敷衍和敲诈，因为政府将医院接管后，包括院长在内的领导层，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权利代表政府提出如此既不合法也不近情理的建议。最令家人诧异的是，肿瘤医院在当地是位高权重的机构，负责的院长都拥有‘学’，或是‘院士’的头衔，然而他们的谈吐却是那么地现实和庸俗。

实际上，医院负责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目的只是让先烈后人知难而退。在几次和医院的交涉中，从他们的话音中可以揣摩出，归根结底是医院很担心先烈后人会向政府提出收回医院或是赔偿的要求。在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充分证实医院一直想方设法摆脱和伍氏家属的所有关联，包括不承认伍汉持烈士墓园的存在。

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拨款修复先烈墓园后，广州市方面将烈士墓园正式定为广州市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文物保护法中清晰地说明，凡是文物所在地，不论是个人或是单位，均负有保护该地文物的责任。(注48)得到这个信息后，家属认为有政府的保证，先烈的英灵从此可以安息。



伍汉持烈士墓于2000年代再度被损毁

然而伍汉持烈士的墓园修复后才十多年的光景，医院方面不仅没有按照明文公布的文物保护法给以妥善保护，反而是再度遭到破坏。展现出一片令人心酸惨不忍睹的景象，无法得悉导致这样的现象，究竟是医院的疏忽还是有意的漠视？工人公然在墓园的石碑上晾晒衣物鞋袜等，周围还堆积了无法清理的垃圾。墓园周边的铁链多处断裂，汉白玉石碑上的字迹已多处模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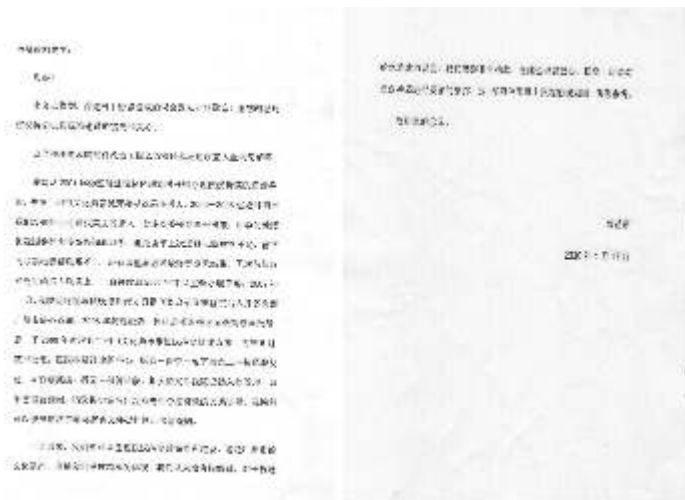
再度被破坏的烈士墓地

笔者在2010年冬季和广州联系，商议准备在清明节前，安排海外的家属前往拜祭的事宜时，居住在当地的家属在电话中，先是一阵叹息，接着大略叙述了先烈墓园被糟蹋的情景，随后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送了多张图片，看着那图片中杂乱无章的墓园我心如刀割。中国的重点肿瘤医院，对为国牺牲的先烈墓园，竟然如此无情地践踏。更令我震惊的是，亲属在电话中告知，医院方面为了新建大楼，已经将先烈的墓地拆除一净，墓地上的石碑和所有物件，都被放置在先烈后人无从得知的地方暂行保存，要等三年后新建大楼竣工，才能再另行择地修建先烈的墓地。

为了了解真相，我在2010年1月6日，先向当时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曾益新院长办公室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秘书陈悦

而在1月12日收到陈悦珠秘书以曾院长的名义发来的传真。传真中的内容和陈秘书在电话中的交流完全是南辕北辙。首先他称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在寻找烈士的后人，希望在拆除烈士墓园之前，征求家属的意见，但没有结果。这样的借词纯属无稽之谈，也说明该医院就从来没有重视过烈士家属的要求，如前面所述，笔者及海外家人曾先后拜访过历任院长，假如医院真诚重视对烈士墓园，按照中国和外宾交往的规定，历任院长几次和家属的会晤后，必定有记录存档。如今居然以联系不上烈士家人来搪塞，显然是自打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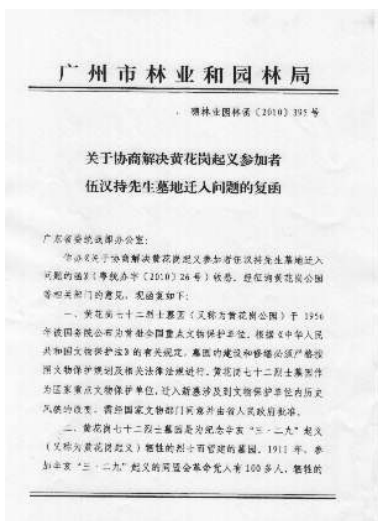
而且笔者收到这封传真后，对是否在曾院长亲自授权下发出的存有质疑。按照曾院长的领导地位，即使是秘书代表他对外行文，他办公室肯定有专用信笺，然而我收到他办公室的传真用纸只是一张普通的A4白纸，上面没有医院的抬头和传真号码，曾院长也没有签名，曾益新三字是电脑上打出来的，而且没有医院的公章。



曾益新1月12日的回信

鉴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冷漠态度，我以宋庆龄基金会国际理事的身份，向该会的联络部发了文件，请求他们协助就如何恢复先岳祖父的墓地，和广东方面联络。在宋庆龄基金会联络部的大力支持下，安排了我和当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任的基金会副主席黄跃金先生会晤，就广州市对待伍汉持先烈墓园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和漠视表示家属的看法，而根据烈士在建立共和维护宪政而牺牲的地位，希望统战部向广东有关部门转达家属的意见，为一劳永逸计，将烈士的墓迁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去。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黄副部长将我的要求，立即发文到广东省统战部门。

广东省委统战部门一直到同年4月12日才开始和广州市园林局等地方单位取得联系，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到5月27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以穗林业园林函(2010)395号文给广东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作了答复。对烈士家属的要求予以拒绝，理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是为辛亥“三·二九”起义牺牲的烈士营建的墓园，此后并未发生起义时幸存而后来牺牲的起义参加者的墓地迁入墓园的先例等等。



广州市林业局文件

当我看到这些文件后，感受到广州市的地方政府内一些干

部，居然公开向中央上级撒弥天大谎。根据我亲自的考察，至少有四十座墓园，和‘3.29’起义没有任何关联的墓，都被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其中有三座颇具规模：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惠州起义烈士史坚如（1879-1900）墓，他就义后，被安葬在广州市的青菜岗（1913年），后来因为都市的建设，墓园在1978年被迁移到现址，在迁移时，政府对原来墓地后的一座祠堂和迁墓事宜，给烈士家属作了经济损失的补偿。现在黄花岗的烈士墓，还保存着胡汉民题写的“史坚如先生祠”作为纪念。

另外一座是加拿大华侨王昌（1886-1918）的墓园，和孙中山领导的十次革命毫无关联，他是在加拿大西海岸维多利亚城居住的一位年轻人，生前以理发为生。因为袁世凯派遣汤化龙到北美洲作为北洋政府的借款谈判代表，王昌内心痛恨这种卖国行径，就在当地的唐人街将汤化龙就地枪杀。然后举枪自尽。国民党后来以党内的礼仪，将他的遗骸安葬在黄花岗。

黄花岗中占地相当大的邓仲元将军（1886-1922）墓，因为在当时的粤军中的显著地位以及他辅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夫人和十五岁即病逝的儿子邓伟东也分别葬在邓将军墓的两侧。



邓伟东墓照片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广州人民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的黄花岗一书中，居然将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列为革命烈士的行列（见119页），而这本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和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合编的著作，居然在黄花岗公开出售，体现出广东方面在研究先烈的工作上，有多么地马虎！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如此撒谎，或者可以被认为是推卸责任，不仅毫无说服力，而且暴露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恶劣态度。更讽刺的是，除了在书本中发现将一个病故的孩子，张冠李戴地被列为是革命先烈外，在黄花岗内还发现，作为经营瑜伽术的商业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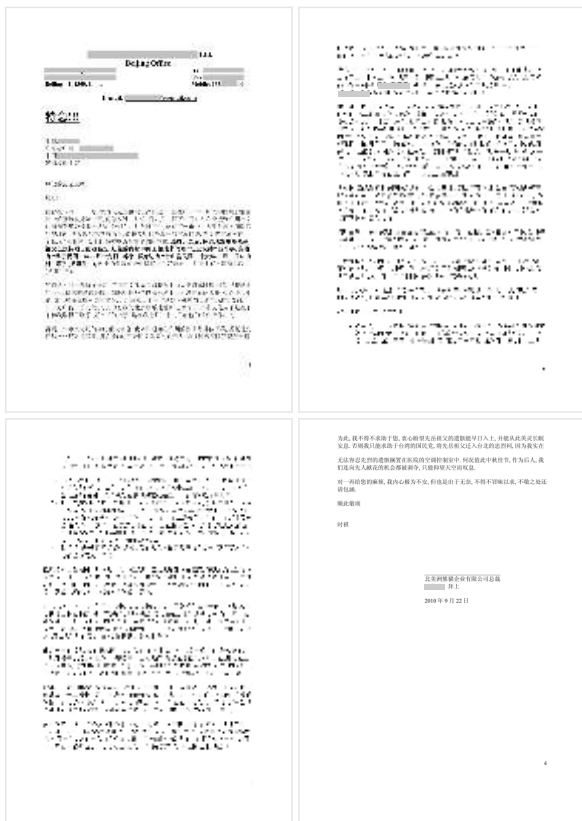
黄花岗内瑜伽术商业广告

陵园部门煞有介事地将烈士陵园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与此同时利用陵园里的幽静环境，操作一些见不得人的商业行为。

既然广东方面对待烈士墓的态度是如此地虚伪，而医院方面为了自身利益，随意将烈士墓地拆除，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保护墓地的法规。但作为烈士的后裔，仍然期望有关方面出面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个无法容忍的恶劣行径。

于是我在7月29日，向广州市万庆良市长发出信件，请他在可能范围内给以协助。

在8月23日我也致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汤柄权副主席



致汤柄权函

提出相同的请求。而且我还特地将我在加拿大和北京的联系地址，电话和传真号一并附在信里，方便他们和我的联系，

这时候，肿瘤医院的曾益新院长，给我回了信，然而信中满是冠冕堂皇，不切实际的外交词令，对烈士的墓园被拆，也只作了些猫哭老鼠般假惺惺的表态，根本是与事无补。他的信发出不久，即接到调令，远走北京，出任协和医院院长一职。而且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但他有无想过，当他得意洋洋上任的时候，他事业的光辉和那神圣的白洁大褂，是烈士家属欲哭无泪的痛苦所堆砌出来的？

烈士遗骸奇迹般地出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的2010年，整整三十个念头，我亲历伍汉持烈士墓地的沧桑变迁，一个在推翻满清，创建共和，奉献出青春岁月和个人幸福的革命斗士，在建立民国，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第一个宪政而献出了生命，被尊称为“东方宪政之神”的革命先烈，因为不能见容于军阀袁世凯，殉难后几乎被葬身鱼腹，抗战期间，他的安息之处幸运地躲过了日寇的毁灭。而在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之际，难以估计的古今文化被摧毁，英雄伟人在红卫兵面前，都是要被消灭的封建残余。伍汉持的墓园也没有幸免。经过了拨乱反正的变化，和政府的协助，他的墓园才得以修复。

可是好景不长，全社会的GDP作祟，文化伦理道德和传统都要给经济利益让路。耳濡目染的尽是金钱和物质财富。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更是意气风发，因为他属于当地创收的大户，连政府官员都要给他捧场助威。由于要新建大楼，伍汉持的墓必须要被铲除，因为一个死人的墓地，阻碍了医院的发展，即便是中华民族的“慎终追远”礼教，也说服不了财迷心窍，利益发展

的既定决心。一个壮烈牺牲的烈士，就这样如同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被赶了出来，沦落成为一个居无定所的孤魂野鬼。比袁世凯时代所给予的折磨更残忍，那时候军阀的爪牙想灭尸毁迹而未能得逞。如今医院的处理方式犹如是‘鞭尸’的行径，而且是彻底的消灭。

但是从我探寻伍汉持烈士墓园的那一刻开始，这三十年里，我始终感受到冥冥中有一股无法解释的力量推动我不懈地努力，也因为那股力量告诉我，总有一天会出现峰迴路转的机遇。因为不论社会上伦理道德沦丧到何地步，人间的公道始终是存在的。何况伍汉持一生清廉自守，献身民族，当他的墓地在被整修的时候，隐藏在医院供应室墙里的碑石突然的出现，不是巧合，而是印证公理是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出现的。

于是另一个公理居然再度出现，而且就发生在医院挖掘工地的时候，仅仅用‘巧合’来形容已经呈现不出它的奇妙。还不如把他看成是颇具戏剧性的进展。那是2010年9月9日，笔者正好在北京访问，下午四点钟左右，电话铃响了，是广州市文化局打来的。我正在奇怪，因为我在广州市文化局里没有任何熟悉的人。对方是一位女士，问我是否为伍汉持烈士的后人。由于多年追踪先烈墓地的不懈，骤然听到这一问，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传递和烈士墓地有关的消息，但不管是什么信息，对一直既毫无头绪又毫无结果的折腾，总是一种刺激。

对方告诉我，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地挖地基的时候，先后挖掘出包括自西汉以来一直到明代一百多个墓群，为此医院的兴建计划必须要先停顿，待这些古墓被清理完毕后才能继续施工。在清理古墓过程中，九月八日下午，距离明代古墓约四十公分的地方，发现一个当地专门安置先人遗骨的传统陶器，因为靠近明带古墓，文化考古单位最初以为是古墓中的陪葬品，于是专家们共同决定先打开骨坛，以了解实情。当他们将骨坛外边两层互盖打开后，发现第三层盖子的内部中间，工整地写着：“**伍公汉持**”四个字。右侧有“**终于民国二年八月十九日**”等字。盖子的旁边还有“**台山县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日斗山村**”等字。对于文化考古人员来讲真是如获至宝。但是除了姓名和烈士吻合之外，也肯定这个骨坛，就是失踪多年的烈士遗骸，但考古人员无法掌握那些日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烈士的后人，才能证实骨坛中的遗骸就是伍汉持烈士。

这一重要的偶然发现，不仅给广州市的文化考古部门带来欣喜，多年的疑惑也暂时得到解答。接下来的问题是，由于烈士的墓园被整体挖掘一空，如今发现了遗骸，按照传统习俗对先人的尊重，或者是从科学研究观点分析，必须要立即给以适当的安葬，而且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要找到烈士的后人来共同商议。于是文化考古部门找到了医院，请他们提供烈士后人联系的方式，对文化考古部门的工作人员始料未及的是，医院方面居然声称，



伍汉持烈士的骨坛被发现后，文物考古界打开后，
证实是烈士的遗骸

他们从来没有和烈士的家属接触过，也不知道去那里寻找烈士的遗属。得到那消极的答复后，文化考古部门着急了。如果真联系不上烈士的后人，就如何处置伍汉持烈士的遗骸，必须作出决定。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文物，而是烈士的具体遗骸处理不妥，后果将是非同小可。

于是在九月九日上午，广州市文化局举行了紧急会议。这时候奇迹出现了。时间是上午十点钟。文化局正在会议室里举行会议，商讨这个重要议题的时候，广州市政府派人将万庆良市长的文件送到文化局，文化局将文件打开，那是我在7月29日发给万市长的信件。他在我信上作了批示后，随即派人将这封信送到文化局，交给他们处理。广州市文化局从这封信里，才得悉我在北京的联系电话，所以在九日当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医院供应室墙里发现烈士的墓园碑石，到2010年9月8日发现他的遗骸，这一连串出现的迹象，似乎是烈士在向后人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自他就义后，他就一直遭受到无尽的骚扰。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只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让他从此能安息。



2010年7月29日致广州市万庆良市长函

结束了和广州市文化局的通话后，我立即以电话通知在广州市的伍伯良孙子伍子英，也就是烈士的嫡系曾孙，请他立即和文化局联系，并到医院发现烈士骨坛现场了解情况，并拍摄照片留存，同时要求医院立即择地安葬。当天晚上，伍子英给我打来电

话称，医院方面因为没有空余的土地，而原来的墓地，现在已经成为工地，无法立即安葬烈士的遗骸，只是请工人制作了一个极为简陋的木箱，装入烈士骨坛，存放在医院楼顶的空调控制室里。还理由十足地说，空调控制室内的恒温，可以保护烈士遗骸避免暴露在空气中被氧化。这样的歪理居然是来自一个所谓的名牌医院？



装有伍汉持烈士遗骸的骨坛被发现后，广东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因为要施工，于是草率地制作了一个木箱，将烈士骨坛放置在木箱中，没有即刻择地安葬，只是安置在医院的空调控制室中

我得知这样的安置后，觉得有必要亲自去一次广州，于是在九月十四日从北京飞往广州，下机后就直接前往医院工地，和文化及考古部门的负责人接触，并了解他们发现烈士骨坛的经过。

根据他们的陈述，再加上我多年来的跟踪，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状况，那就是早前发现烈士墓碑石的供应室，离烈士墓原址，大约是十五米左右的距离。而发现烈士骨坛的现址，是烈士原来墓地另一边大约十五米处，而且是在地下四米深处。我分析这肯定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医院里的好心人，为了避免烈士的碑石

和骨坛被破坏，于是从墓地的原址搬移加以保护，才有后来发现墓地里空无一物的现象。

同时我告诉文化考古界的人员，首先是他的姓名验证了这就是烈士的遗骸，姓名旁边书写的‘终于民国二年八月十九日’正是公元1913年他在天津就义的日期。骨坛边上书写的‘台山县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日斗山村，正是伍汉持纪念医院在1937年落成后，家人将他的遗骸从耶稣坟场检出，安放在骨坛里后，送到医院庭园中安葬的日期。两个日期足以证实烈士遗骸的真实性。同时按照中华民族的习俗，一般在举行丧礼时，都是由长子来经办。根据家人的理解，骨坛盖子里的文字，正是烈士长子伍伯良的亲笔书法。而他又是学医的，从骨坛里烈士遗骸的安放，是依据人体解剖学进行的。呈现坐的姿态。最令文化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当他们打开骨坛的时候，浸泡遗骨的液体清澈见底，一点都不浑浊。按照他们的经验，在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一般来说，凡是有液体的几乎都呈现浑浊的色泽。据文化考古人员的解释，伍汉持烈士骨坛中的液体如此清晰，反映出他生前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

烈士遗骸何时得以安息？

根据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计划，医院兴建的大楼要在三年后才能完全竣工，烈士的墓园必须要等到大楼竣工后才能修复。从他们的设计图中，了解到整个墓园的布局，位在新建大楼的正前方，在该大楼投入使用后，可以预期那里出入的患者人数众多定必杂乱，而且周围还设有停车场，根本不适合作为烈士安息的场所。而在这未来的三年里，医院将烈士的骨坛暂时安置在空调控制室里，也非万全之计，在医院方面没有给出一个确切方案之前，虽然文化局的领导层一再给我安慰和保证，骨坛安置在医院里，绝对不会出现意外，我仍然是寝食难安，因为稍有闪失，任何的意外都会给烈士的遗骸造成无法估计的毁坏甚至流失。

鉴于多年来和肿瘤医院谈判和联系的负面效应，无法建立起我对他们的信赖，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文化局，医院过去一贯的冷漠态度，使家属对医院已经完全失去信任。骨坛安置在空调控制室，我们更是一万个不放心。假如医院稍微做一些手脚，或是编制一个理由，将烈士的骨坛破坏了，我们作为后人的，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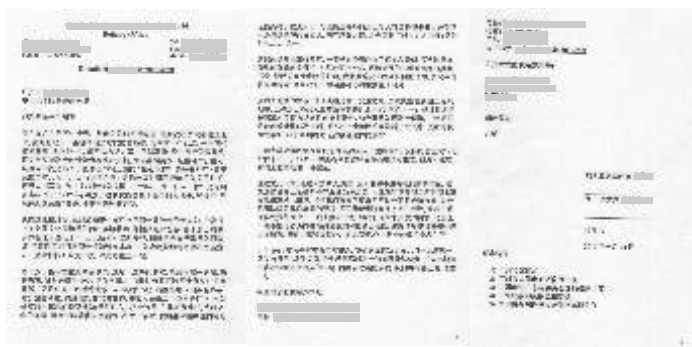
何向上苍交代？最令我感叹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上出现对先人的冷酷态度，以及对历史文物漠视的反常现象，都间接地影响着我对肿瘤医院的信任。

结论是我坚持烈士的骨坛必须从医院移走，更重要的是，烈士的骨坛必须尽快入土，这样无限期的暴露在空气中，导致烈士骨坛遭受损害，那将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经过我这一提醒，文化局意识到我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同意设法寻找适合安葬烈士骨坛的墓园。首先他们找到广州市的银河公墓。那也是一个烈士陵园，虽然和伍汉持烈士的背景不尽相称，至少能先安葬总比暴露在空气中要妥善得多。可是银河公墓在经过思考后，觉得责任太大，就拿公墓中只安葬骨灰，对遗骸的安置还没有先例为理由。拒绝了文化局的要求。

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令人焦急，我只得在2010年9月22日，再次分别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黄跃金副部长，广州市万庆良市长和广东政协汤柄权副主席，要求将烈士骨坛和墓园迁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去，实际上将伍汉持烈士安葬在该陵园中，是名副其实的，因为烈士曾经参加过策划黄花岗的起义，然而今天的官员和年轻的一代，又有几人了解那段惊天动地的革命悲壮事迹，以及对后来创建共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当我发出信件后，了解到广州市正在筹划亚洲运动会，我估计当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投入该项工作中，不可能处理我的信

件。我告诉自己，等亚运会结束后，至少万庆良市长会如同前次一样，给我一个答复，可是我的想法过于天真，亚运会结束后，我的函件却如同石沉大海渺无音信，我只得再次向肿瘤医院曾新院长发函，要求他立即安排为烈士骨坛安葬。



2010年9月24日致曾益新函

我如同坐针毡般地等待，直到十一月初，广州市文化局才来电告知，他们已经获得上级批准，但没有说明是那个“上级”。可以将烈士的骨坛暂时安葬在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中。

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坐落在广州市天河区广汕公路燕塘牛眠岗瘦狗岭。是民国 28 (1939) 年兴建的。陵园中建造了一座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由东向西呈长方锥形的建筑物，外面砌有花岗岩，内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碑高三十八米，底层建筑面积为一百九十七平方米，底部外边长十五点二米，四周建有气窗，宽十五点二尺，深为十二点九尺。碑身共有九层。分上下两部分。



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碑塔全貌

下面部分一到三层是四方台基座，上部四到九层是四方尖顶，碑身第四层长各六米，每一层有收分。第一层是一个大厅，旁边有旋梯，直通顶层。碑身向西正面镌刻着“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十一个字，和“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年”年款，是蒋介石所题，碑身顶部刻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

粤军第一师是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底组建的第一支武装部队，部队中大部分是广东人，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担任参谋长，蒋介石是参谋。在粤军第一师的基础上，到1925年发展为国民革命军，以后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为纪律严明，英勇奋战，素有‘铁军’的声誉。而军中有叶剑英，叶挺等诸多的著名共产党员，到抗战期间英勇的新四军，就是以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来命名的。叶挺担任第四军的独立团团团长。

牛眠岗一带后来开辟成为粤军第一师和扩编后的第四军阵亡将士公墓。目的是纪念东征和北伐战争中牺牲的第四军将士而兴建的。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公墓被夷为平地。剩下来的纪念碑上面的国民党党徽和碑文都被凿平。虽然在1986年广州市政府将该纪念碑重修，并在1993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已经是面目全非。根据历史的记载，该烈士陵园为斜坡状，烈士的墓地横竖排列在纪念碑周围，整齐划一如同星罗棋布。先烈的灵位前，都树立了一尊由景德镇烧制的立体瓷像。一律气派威武穿戴着戎装，栩栩如生，瓷像上清晰地注明烈士的军

阶，姓名。

陵园中曾经埋葬了一位孙中山的亲信何贯中。是孙中山情同手足的同盟会员何子渊的第六个兄弟。何子渊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期间，一直给以援手，他将六弟托付给孙中山，辅助革命事业。所以何贯中先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讨袁战争结束后，被编入粤军，担任北伐军第二十二步兵师第八十七团第三营营长，和邓仲元并肩成为孙中山先生身边两位最忠诚的干将。由于陈炯明的态度转变，孙中山将何贯中安插在陈炯明身边，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幸在和桂系军队作战的时候受重伤被俘身亡。敌军鉴于他的英勇，将其遗骸薄葬在广州北郊，孙中山先生随后要求何子渊将其弟的墓地迁移到广州东门外二望冈“陆军忠烈祠”对面的浸水山。最后再被迁移到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公墓中。他的墓原先安置在纪念碑正面大约十五米处。

往常烈士的侄女何瑛每年都会和家人亲属到公墓向何子贯烈士拜祭。何瑛的丈夫梁世骥原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五四师中将。遗憾的是何贯中烈士的墓园在1959年被铲除。究竟是何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当我从广州市文化局方面，得知他们计划将伍汉持烈士的骨坛暂时安葬在粤军第一师诸先烈公墓中的信息后，几个月来的担忧如释重负般地，让我稍感安慰。只要能将烈士的骨坛迁出肿瘤医院，再有广州市文化局的关顾，至少烈士的骨坛不会有任何的

不安全感。于是我在十一月四日再次飞往广州，广州市文化局，统战部，广东民革以及文物考古等单位都有代表在华美达酒店等我共进午餐，我一坐下就深情地向他们为烈士骨坛暂时安葬入土的费心安排表达了谢意。但文化局的领导随即打断了我的话题，颇为尴尬地先对我表示歉意，接着说原先安排将烈士骨坛入土的安排又有变化，广东省有关部门的批示，只允许将骨坛先安放在陵园的纪念碑塔中，要等到上面的最后决定才能入土。我听闻后只感到一阵恶心，肿瘤医院在没有家属同意的前提下，就将烈士的墓地铲平了。家属不仅没有听到一句歉意，而政府部门又开始施行他们那一套官僚主义，一个为国捐躯的烈士遗骸，经过了数十载的重重折磨，一直到2008年2月才被广州市列为第七批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而就在批准一年后，整个的墓园又因为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兴建大楼而被挖掘一空。烈士家人咸认为广东省方面对待文物的态度形同儿戏。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子英夫妇的陪同下抵达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公墓，这个被广州市在1993年列入第四批的文物保护单位，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生锈的铁门，进入到公墓后，眼前的景色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我无言以对，只感到凄凉和无奈。顺着生了青苔的水泥石阶，进入到纪念碑前，我仰首对那碑石上望了一眼。碑首的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和蒋介石名字只剩下被凿的痕迹。很明显，中间“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十一个字是重新

经过加了工的。



烈士骨坛被孤零零地安置在废弃的陵园碑塔中

走进大厅，除了新粉刷的墙上仍然散发出浓浊的石灰味道外，似乎历史又在那旋梯，气窗，和过道中徘徊，装着伍汉持烈士骨坛的木箱，已经安置在大厅深处，感谢广州市文化局的古道热肠，他们在木箱周围一直到纪念碑的大门两侧，布置了近两米高的常青树，给那苍白的大厅里增添了些微的生气。但我总感到把讨袁烈士的骨坛安置在这个和他毫无关联的公墓废墟里，处处都是那么地格格不入而显得滑稽可笑又可悲。一个为维护宪政而奉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被袁世凯谋害后，他的墓地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修复后烈士又要把自己安息的墓穴让出来，为

的是满足当地发展社会经济利益的目的。肿瘤医院挖了烈士的坟墓，却没有给他选择一个安息之所，甚至从医院移灵到碑塔时，医院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向烈士家属说一句安慰的话，充分反映出当今的世态炎凉。我跪在装有烈士骨坛的木箱前，忽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奈和无助，对自己先人的遗骸毫无保护的能力，只能任由他人的摆布，让一个已经逝去近百年的遗骨还要寄人篱下地，孤零零地独守着这一栋荒凉却充满历史悲剧的纪念碑



伍汉持烈士骨坛从肿瘤医院移置到
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碑塔中后的拜祭现况

我祭拜完毕后，带着沉重的心情，缓慢地走出纪念碑，百思不得其解，当满清帝国在那么腐败无能的时代，对挖他人祖坟的行径，还看成是严重犯罪。在大清律中明文记载着“偷坟掘墓，斩立决”的法令。当然那是专制帝王时代的产物，但也反映出祖

宗家法高于皇帝的传统，即便是后世帝王也必须遵守。在野史还记载着，大臣和珅和刘墉打赌称，刘墉绝对不敢因为乾隆皇帝修复乾清宫而拆了明十三陵，挪用该地的木料修复乾清宫一事来弹劾皇帝。没有料到刘墉搬出大清律指出皇帝的不当。虽然乾隆后来重修了明十三陵，但是仍然破坏了前朝皇帝的陵寝，仍属于偷坟掘墓。乾隆无言以对而认罪。

其实这只是民间流传的一则故事，但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古墓的敬畏，是儒家孝道和对祖先崇拜的文化现象，体现对先人的尊重，从而推演为中华民族文化历年来来自于对历史，对祖先，和对民族的敬畏，这敬畏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传统。侵犯死者和破坏文化是典型的“国殇”。

对个人及家庭而言，扫祭先人的墓园是中华民族孝思追远，以志不忘的传统道德。在封建社会中，对祖坟的尊重居然上升到国家的法律保护范畴。而当中华民族的共和体制走了将近百年之时，以南方文化为首的广东，居然无情地将伍汉持烈士的墓园挖掘一空，不啻是现代广东的一个无法愈合的疮疤。更讽刺的是，伍汉持烈士诞生在满清末年，一直致力于推翻满清而参加革命，随后在广州起义，目睹共和成立，担任国会议员，最后为了维护宪政而从容就义。这样一位建立共和的先驱者，到头来却保不住自己的安息之所，难道这不是广东的羞耻？

时光又过了一个多月，到十二月上旬末，我再次从广东省市文

化局的电话中，得知广东省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伍汉持烈士的骨坛终于可以暂时在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的墓园中入土安葬。于是我在十二月十四日再度飞往广州，我从未经历过广州的奇寒，接连三天不停地下雨刮风，气温下降到在零度上下，我心境也和天气一样奇冷无比。仰望着灰暗的苍天，他似乎在为烈士所受到的不公平而一掬同情之泪！

在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天空仍挂着厚厚的云层，但风停了，雨也不下了。我心情跟着天气的转变，也稍为感到舒适些。一大早，我和子英先到达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虽然墓地不尽如人意，那终究还是经过文化局的努力结果。令我心存感激。十点左右，市文化局，统战部，广东民革，考古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朋友都陆续抵达，参加这次的‘葬礼’。

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先从纪念碑中，将装有烈士骨坛的木箱抬到预先设计好的墓地，由于伍汉持烈士生前是基督徒，我特地要求在安排常青树和黄白菊花时，添置三十盆红色的圣诞红，因为再过一周就是圣诞节，也是对烈士的缅怀和崇敬。而这三十盆圣诞红。的确把这杂草丛生的历史遗迹增添了一丝生气。当工人们将烈士的骨坛小心翼翼地放置到墓穴里的那一刻，云层散了，透过灿烂的阳光，上苍似乎在告诉我们，烈士将会在他的怀抱中安息。



暂时安葬的场景



按照广东的传统习俗为烈士举办骨坛安葬仪式

安葬的仪式是按照广东的传统习俗进行。烈士后人对出席此次葬礼的广州市各单位代表都心存感激，至少略微解除了内心因为肿瘤医院多年来对待烈士墓园的冷漠无情并予以挖掘的反感情绪。但在安葬仪式中，仍然没有看到医院方面负责人的身影。事后我得知，原来的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先生已经荣升调到北京，出任协和医院的院长，而且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作为一位高级医务人员，应该拥有对于逝者表达尊重的基本医德。我不知道他对亲自主导挖掘医院庭园中的烈士墓这一作为有何感想？

仪式结束后，按照地方的传统，家人安排了午餐，向与会的各单位代表表达谢意。在午餐上，我坦率地表示，虽然今天将烈士的骨坛暂时入了土，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有了一个永久安息的地方。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的感受是，烈士的‘家’被拆了，

就好像当前在中国如火如荼的拆迁工程。为了经济发展，为了繁荣社会，为了刺激市场，贫困必须向富贵低头让路，文化历史必须向利益屈服，因此地面上活人的安身立锥之地，在有权势撑腰的地产商面前除了屈服还是屈服。在利益驱使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前提下，历史文化的价值早已是明日黄花，不值一谈。所以肿瘤医院为了发展医学，造福人民，烈士的安息之所更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了。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政府的主导，法律中也不允许如此地胡作非为，可是地方上的部分官员却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餐桌上我只是轻描淡写地作了个比喻，烈士现在就好像活人世界里发展旅游，鼓励人民外出旅游一样，他也要一尝现代化的新鲜事物，暂时住“酒店”了。而且正符合现代国际旅游发展的标准，远离喧闹的城市，寻找原野的安详。然而烈士当前暂时安息的地方，似乎也太过于安静了些。白天除了几个守护陵园的工人外，就嗅不出一丝的生气，入夜后，周边没有一点灯光，只是漆黑一片。

我在回北京的航班上，百感交集，泪水往肚里吞的悲哀陪伴着我一直到目的地。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今一些地方官员对文化历史如此地无情和冷漠？我一直反复地思考，即便是那么腐败的满清帝国，还有大清律来约束规范社会的传统风气。那“挖坟掘墓，斩立决”的法律，不仅仅是局限在震慑的权

威，而是要维系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传统。藐视历史就是否定自身的存在价值，践踏文化就是民族走向堕落。

多少历史的人物，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事业成就，能流传到后来，给人怀念，受人尊重，都是因为文字的记载，有实物的佐证。有如实的报道，也有夸张的吹嘘。然而伍汉持烈士，生前专注在革命斗争的事业上，关心穷困病人的健康，到了北京，为维护宪政而伸张正义，最后献出生命。他没有为后人留下金银财富，因为他生前从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荣华，所展现的只是如同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而被钉上十字架的牺牲精神。所以他在就义后，除了国民党几位元老，为他写下简短而朴实的怀念文字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惨淡经营所创办的医院，被没收后，所用过的医疗器材也不知所终。他就是那么一个朴实无华，为民族献身的革命烈士。

当我开始筹划撰写有关他一生的记录时，发现困难重重，首先是很难找到有关他一生的相关资料。从家里流传下来的也只是几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值得怀念的是，其中有一张是烈士和妻子及五个孩子的全家福，连夭折的幼女也在照片里面。在烈士后人的心目中，这张照片比任何物质的流传都更有无可代替的价值。

为了这个艰巨的写作工作，我在2010年10月6日前往南京，希望能在中国第二国家档案馆查找到有关烈士和她女儿的事迹记录；为了伍汉持烈士墓的事，我几次前往广州，在行程中，得悉中山

图书馆珍藏有一些烈士父女两人的资料，于是我请生活在广州的伍子英夫妇，代我去查找资料。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先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满足了我的愿望。而南京之行却是失望而归。因为档案馆一般不对外开放，所以只能委托馆里的负责人代我查找，为此我将需要的资料留下交给他，岂知等我离开南京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的只字片语，我去电子邮件查询也没有回复。最后我只能失望地放弃了从那里查找资料的奢想，我万万没有估计到，进入国家档案馆寻找历史资料，就如同古代进入门禁深严的衙门一般，是那么的困难。

因为有了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不得其门而入的经验，我也不想到北京的第一国家档案馆去自讨没趣了。只得寄希望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但对是否能找到有关伍汉持烈士的事迹资料完全没有把握。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去试试我的运气。为了寻找伍汉持烈士墓园的真相，我经历了当今社会世态炎凉，亵渎先人的冷漠，为了经济利益，藐视文化传统的继承，根本无视烈士后人心灵遭受的创痛。我决心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2011年1月17日从北京直飞台湾的桃园，并驱车前往台北，联系上了国民党党史馆。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国民党党史馆，党史馆坐落在中山南路，正对着台湾的“总统府”，那是在日本人占据台湾时代的总督府，色彩和造型是标准的日本建筑。党史馆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所在地，原来的旧楼早已拆除，现在的新大楼，是国民党

在2007兴建的，竣工后整栋大楼转让给张荣发文教基金会经营，然后再和基金会签订十年租约，将大楼的六楼和七楼作为党史馆办公用。

查找资料的工作比我来之前的想象要顺利得多。我在1月18日上午抵达该馆后，馆里的工作人员亲切的接待，和协助我开始搜寻资料的热诚，让我放下了刚抵达时心中的疑虑。国民党党史馆里所有的档案都已经电子数码系统化，查找资料非常简便，仅仅一个上午，我的收获比到达台北前的预期要丰盛不少。

我查找到伍汉持烈士的遗照，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烈士撰写的墓碑文原稿，烈士女儿伍智梅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时的提案，还有她和胡汉民的合照。意想不到的，党史馆里还珍藏着她的墨宝，是为同盟会元老叶楚傖在1946年去世所写的挽联。字体苍劲有力，反映出她刚毅的性情。

她夫婿黄建勋因为去逝较早，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里，我只找到两份孙中山先生给他颁发的委任状，弥足珍贵。（注49）国民党党史馆得悉我是为撰写烈士事迹，专程到台北查找资料，所以在工作上给了我特殊的礼遇，在这方面我必须要向该馆的工作人员，表达最真诚的感谢。

在台北的收获还不仅仅止于党史馆里的文字和照片，工作结束后，因为天时尚早，而且从国民党党史馆到酒店的距离也不到两公里，沿途风景优美，俨然是一个公园，台北的正月不冷也不

热，气温非常舒适，一面轻松漫步浏览着道路两旁青翠的树木，感受宝岛的热带风貌，一面因为一天顺利的工作而衍生出来无比的愉悦心情，我反复在回味着台北党史馆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善良，和南京国家档案馆趾高气扬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同样是炎黄子孙，怎么会有这样待人接物的差异？在台北的收获也将我压抑在内心的不平一扫而空。

台北发现烈士的灵位



台北忠烈祠正门

回到酒店，我正在反复阅览着白天获得的资料，心里面却在思虑着另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愿望。我在抵达台北之前，自己一直在盘算，也许伍汉持烈士的灵位，会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里，因为这个想法其来有自。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加拿大温哥华的中

国国民党分部礼堂里，曾经悬挂着几幅革命先烈的遗照，其中就有伍汉持，由此可见他在国民革命的历程中，应该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但在没有到忠烈祠亲眼目睹之前，我无法骤下结论。

就在我独自被复杂的心绪所苦恼时，电话铃响了，是台湾的一位远亲打来的，他传递给我的信息，使我欣喜不已，他告诉我伍汉持烈士的灵位一直供奉在忠烈祠里，而且和忠烈祠联系好，安排我前往参拜。我放下电话后，坐在房间里，方才在电话中得到的信息，如同那老式留声机上的唱片，一遍又一遍地地在我脑海中旋转。与此同时我的思维又飞到广州去了，这近三十年来对烈士在广东受到的不公对待，我心里只感到无助和无奈。也无法为烈士的委屈伸张正义。如今台北忠烈祠里供奉着他的灵位，使我这多年来落漠的心情豁然开朗，这说明还有一些炎黄子孙，仍然坚守着传统的文化伦理，维系着中华民族尊崇先烈的固有道德风尚。这一夜我失眠了。

庄严肃穆的忠烈祠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2011年1月19日的上午，我前往士林，过了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车渐渐进入到北安路和明水路交汇点，呈现在眼前的是有六层楼高牌楼造型的拱门。共有三个拱门，中间的一个较高，上端有蒋介石先生在1968年10月亲自题写的“忠烈祠”三个大字，两旁分别写着“成仁”和“取义”，顾名思义可以了解，在这座庄严肃穆的祠里，供奉着的是从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烈士。

台北的忠烈祠是蒋经国先生在担任台湾行政院长任内指示成立的，一九六七年奠基，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落成。其实台湾一共有数十个大小不同的忠烈祠，他们的前身几乎都是日本人建造的神社。为了消除日本人的影响，国民党迁台后，将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神社，逐一改成了忠烈祠。

国民党时代建筑各种不同类型忠烈祠的观念，原自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个忠烈祠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褒奖在该事变中阵亡的将士，于是建立了忠烈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还制订了“设立忠烈

祠办法”，于是建立忠烈祠模式被广泛运用。国民党迁台后，继续沿用以前的办法，先将日本人的神社改造成忠烈祠，然后在1969年建立了这个最具规模的忠烈祠。

台北忠烈祠紧邻圆山大饭店，庄严肃穆地坐落在绿荫丛丛风景秀丽群山环抱中，巍峨的拱门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震撼力。大门的警卫问明来意后，立即用电话和内部的办公室联系。没过一会儿，警卫告知办公室已经知道我是烈士的家属，并允许汽车可以开车直接进入。

它原来是台北市军人公墓的旧址，面对基隆河，背依群山环绕。环境幽雅而肃穆，衬托出建筑的庄严。整个祠内有五万平方米面积，建筑仅占十分之一。从大门进入，中央广场两侧是外宾休息室和长官休息室。现在外宾休息室已改装成办公室。蒋介石先生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来祭奠，所以这个长官休息室实际上是专为他建造的。

正前方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建造的仿造皇宫式山门，屋面是琉璃瓦，有中式的彩画平顶，门楣上有四个六角形的门眼。门前有一对大理石雕塑的狮子，脚踩彩球的是雄狮，而脚踩幼狮的是雌狮。山门两边有钟鼓楼，每逢春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山门后面是仿北京故宫太和殿所建筑的忠烈祠大殿，门口终年有两个礼兵站岗守卫。大殿内高十七米，屋顶高二十七点一六米。它比北京的太和殿高出二米，表示烈士的地位要比皇帝崇高。即便是皇

帝，也没有资格进入到忠烈祠里来，意义非凡。地面铺红地毯，中央设有神坛，上写“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前面有供桌和香案，围着黄菊花，在下方是祭台。

祭台前的地面上镶着一个‘主祭’的三角形铜牌，两旁是音乐台。大殿一侧是‘中华民族’的神坛，另一侧是孙中山先生像和远祖皇帝灵位。大殿前的红门开启，但参访者只能伫足门外，即便是值勤的礼兵也不允许随便进入。沿着大殿外侧向后环成长廊，内有国民党历次战役的简介和部分烈士的半身塑像，包括秋瑾和林觉民。

在大殿的两旁分别为文武烈士祠，只有为党国捐躯的文人和军人才能进入忠烈祠。自然亡故的人士，纵然有彪炳功勋，也不能在祠内受到供奉。两个祠里靠入口的两侧，部分烈士的遗照陈列在玻璃柜内，还配有中文，日文和英文三种文字的介绍。

忠烈祠负责人是一位现役军官，他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的眼神炯炯有光，看上去他是属于学者类型的人物。在会客室里，他先详细介绍了忠烈祠的内容，并且从他的一言一语中，都可以体现出他对烈士的尊重和敬仰。他还真诚地说，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他们对待每一位到来的烈士家属都给以最高的敬意，惟独如此才足以表达对烈士的景仰。我被他诚挚的言辞所感动。介绍完毕后，他建议在瞻仰并拜祭伍汉持烈士的灵位前，先观赏忠烈祠里礼仪兵哨岗的交接

仪式。

忠烈祠里礼仪兵的换岗每小时进行一次，每天从上午九时开始，最后一次的换岗是下午四时三十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礼仪兵是由海陆空三军中严格挑选出来的，条件是身高必须在178公分以上，体型适中。皮肤上不允许有任何的刺青，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清白的家庭背景。海陆空三军每年分别担负四个月的值勤。在此期间是不能离开忠烈祠的。他们的纪律严明，站岗的时候面目肃穆不拘言笑。手持七公斤重的M1步枪，在换哨的时候，还要表演各种的姿势。

我在广场上观摩礼仪兵的换哨程序。礼仪兵由五名士兵组成，其中小队长一位，礼仪兵四位。换哨的礼仪从入口的拱们开始，顺着中轴直线，以踢正步的方式向大殿前行，距离大约为二百米长。因为是以慢速度的正步前行，而且在每到一定距离时还要作各种各样的举枪花式表演，那杆七公斤重的M1步枪，在他们的手中翻飞轻盈，步调和手势一致而无瑕疵可击，严肃中带着令观众兴奋的娱乐性。

礼仪兵的服饰很吸引来宾。他们都头戴银色钢盔，军服裁制合身，有黄色腰带缝制在军服上，胸前有一块钢牌。左肩镶白色肩穗。注明军种仪队识别的红色小牌别在左胸前，我们去参拜烈士的那天，正好是陆军值勤，所以他们的红色小牌上写的是“陆军仪队”四个字。礼仪兵的右胸前别着蓝色的姓名牌。制服的长

裤不及脚踝，皮靴上系着白色鞋带。从头盔到皮靴将礼仪兵裹得严严实实，即使我去参观的时候是正月，也看到士兵脸上沾满了汗水。在台湾炎热的夏天，这些为守护烈士灵位的礼仪兵所付出的辛劳，令人肃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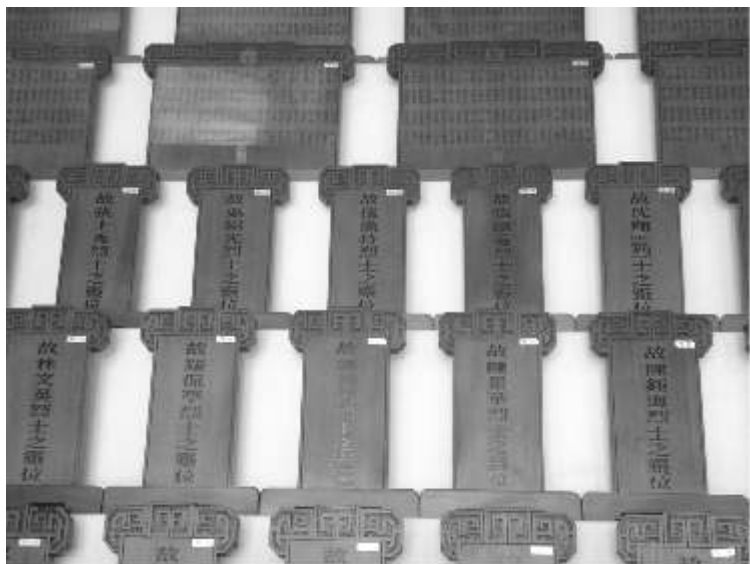
台北忠烈祠里的文烈士祠

参观完毕后即来到文烈士祠，从入口处就已经看到香案上放置着一尊黄木的灵牌，上面刻着黑色的“故伍汉持烈士之灵位”，灵牌后面是一只硕大的铜香炉，里面点着一个盘香，散出袅袅青烟。再后面的供台上摆设着一盆插花，衬托出祠里庄严安详的气氛。我内心感受到从来没有的震撼与感动。



忠烈祠安排了烈士的灵位，供家属祭拜

在祭拜之前，忠烈祠负责人先引领参观了入口旁边玻璃橱窗里陈列的烈士遗照，其中有伍汉持烈士的遗照下方有中文，日文和英文三种文字的简单介绍。所有供奉在祠里的烈士灵位，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等按照时代而顺序排列，伍汉持烈士的灵位是供奉在“讨袁革命”的区域里。祭台上共有六层。前三层是烈士的个人牌位，再上面三层是烈士群体的牌位，每一个牌位上书写有一百位烈士的姓名。王上校告诉我们，忠烈祠里记载有三十九万多烈士的姓名，能上到祭台的烈士为数并不多。



文烈士祠中的诸烈灵位，最上端中间为伍汉持烈士灵位

因为伍汉持烈士生信仰基督教，我用教会的礼节，跪在他的牌位前，欣慰和感触交织成复杂的思潮在我心中汹涌澎湃，也许这是自他在1913年殉难后，他的后人能够在安祥平静的环境里，向他致以最虔诚也是最崇高的祭拜，可悲的是，即使我已经到了他曾经工作过，也曾经为革命奉献的故乡，却无法有如此刻的平静心态，代表生活在海外的亲属给他献上祝祷。

尤其是从1951年他的遗孀和后人，在广州被赶出医院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在他那荒芜的墓园献上一朵鲜花。作为他的晚辈，我谦卑地向他叩头表达景仰和崇敬，也是弥补多年来心里的歉疚。我含着眼泪心中默思，这一代忠诚的烈士，远渡重洋安祥地受到尊重和保护。我感谢那些日日夜夜为护守烈士们的礼仪士兵，是他们使得烈士的后人没有顾虑，是他们让烈士的灵魂得以安息。我仰首望着那祭台上一排排的灵位，不仅是给我自己多年来因为烈士遗骸及墓园在广州被破坏而导致的悲伤得到了少许的安慰，也对面前一个个烈士的牌位上的名字，传达了对他们的崇敬。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每一块牌位上都书写了可歌可泣悲壮英勇的故事。就如同伍汉持烈士一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伫立在烈士的灵位前，我的思潮又迅速地飞往广州，这三十年来烈士墓地一幕幕难以接受但又无法磨灭的凄凉场景，如同银

幕上的图片一般在我眼前闪烁。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次看到他墓地的被彻底破坏，到九零年代修复后的感怀，而在本世纪的开端，因为地方利益的驱使，他的墓地干脆被完全挖掘。因为文化历史，在金钱和功利面前，早已经是苍白无力。在经济挂帅的政令下，慎终追远的传统也早被嗤之以鼻了。我仰望着香案上烈士的灵位，感触良深却找不出答案。两岸不都是同属五千年的炎黄子孙吗？怎么会有如此的天渊之别？唯一让我欣慰的是，烈士在这里不再寂寞，因为在他周围都是和他有着共同理想的革命同志，他们都是为了追求理想，抱负，这些理想和抱负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命运，为了子孙世代的幸福。他们牺牲了。伍汉持烈士在这里和他的同志，看着民族的长河中仍然有着汹涌的波涛，在崎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难以挪动的障碍，但它是在健康地成长，为此先烈们在向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微笑中带有对我们的期盼和希望。

在走向忠烈祠办公室的路上，我仍然无法平息内心的激动，也为伍汉持烈士的英灵，能在宝岛上山清水秀的忠烈祠内，和他的革命同志一同安享着宁静而感到欣慰。临行前，我从负责人那里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大殿中供奉的“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的灵牌。他说，这一份小小的礼物，只赠送给烈士的后人，礼物代表着对先烈的怀念，也是对烈士后人的尊敬。听了他的解释我内心有无限的感怀。

离开忠烈祠的时候，原先的灿烂阳光，被灰茫茫的云层遮住，天空撒下了丝丝细雨，这是否代表着伍汉持烈士因我离去不舍而洒下的亲情泪水？坐在车里，我只是不断地向后望去，忠烈祠的拱门渐渐地在我视野里消失，但我心里扬起从未有过的舒畅之情。我为伍汉持烈士高兴，他的忠魂得到安息，他的精神受到尊重。作为晚辈的我们，今后也可以随时来向他祭拜并追思。

带着对台北忠烈祠的无限怀念，我离开了台北，那里不仅仅是供奉着先人的灵位，更重要的是镌刻着一个个令人敬仰，赞叹，又敬畏的故事，值得我们追忆，学习。于是我在六月一日，和妻子专程再次前往台北，去祭拜她的祖父。忠烈祠的负责人得悉烈士的孙女儿前往拜祭时，特地为我们布置了庄严肃穆而隆重的仪式。首先是将烈士的灵位从祭台上请下来，供奉在香案的正中央，还安排了两位空军礼仪兵，分别伫立在灵位的左右两侧，香案前摆了一个用黄菊花制的花圈，由烈士的孙女儿



主祭（见图）。开始的时候先宣读烈士生平，继而由我妻子敬献花圈，与会的亲人都带着热泪向先烈的灵位行礼如仪。

临行前，我向忠烈祠负责人表示，公元2013年8月19日，将

是烈士殉难百年纪念，希望分散在海外各地的烈士后人，能有机会聚集在台北，前往忠烈祠向先人致以最崇高的追思和怀念。我甚至产生了将烈士的遗骸迁移到海外的愿望。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遐想，主要是来自于对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彻底的绝望所始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折腾。开始的时候，烈士后人对该医院还存有一丝希望，总认为白衣战士不至于作出丧心病狂的举措。然而接二连三发生的情况，不禁让人开始怀疑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产生失望之情，从而到达彻底绝望的境地。令人发指的是，当医院拆除了烈士的墓园之后，还假惺惺地按抚烈士家属，保证今后一定会为烈士重建墓园。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世间凡是不合情合理的谎言，到最后都会被拆穿的。医院用瞒天过海的手段，隐藏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原来为烈士预留墓园的地方，正是医院在兴建的大楼竣工之后，准备在那里建造一座医疗垃圾的处理场。将辛亥烈士的墓园建在垃圾场旁，还大言不惭地说是烈士后人的恩赐。

烈士的骨坛目前暂时安葬在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中，是没有办法中的权宜之计。笔者对广东早已失去信心，所以将烈士的遗骸安葬在那里，总让人寝食难安。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铲除得一干二净。散居在海外和台湾的烈士后人，向广东方面一再要求将陵园予以修复，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艰辛抗争，最后得到的反馈是陵园将于修复，但不在原地，而

是要迁移到黄埔军校旧址。果真如此，目前暂时安葬在该陵园中的伍汉持烈士遗骸，最终还要再次迁出。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兴建大楼，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的确“乔迁”黄埔军校，归根结底是不是“利益”的作祟。因为在广州，这两块土地早已成了是人都会垂涎而企望能纳入囊中的肥肉。只要有利可图，在那些人心里，什么“慎宗追远”，“文化传承”早已成了一块心病，须除之而后快。

所以在满怀希望，痛苦失望，而最后彻底绝望后，就产生了帮助烈士“移民”的遐想。

作为烈士的遗属，我们的愿望只局限在能为烈士的墓园，尽一份敬畏的心意，更希望烈士的英灵不要再受到任何的骚扰。如这一遐想果真能如愿以偿，也是给广东侨乡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头衔，那就是在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家乡广东，将成为举世第一个先烈“移民”的输出地而扬名天下。



家属向先烈祭奠前的安排

延绵不息的烈士精神

在这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散居在海外各地的烈士后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为人处事都是遵循着先烈的精神。伍汉持烈士生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短促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济世救人的医术工作和振兴中华的革命任务上。他开设医院，培养助产士，本着基督的救世精神。尤其是在救治贫穷的病人时，他更是义不容辞地全力以赴。当中华大地遭受到瘟疫猖獗的肆虐，一向以济人救世的医生都畏首不前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前往灾区抢救病人。他和马达臣等创办广东红十字会，目的也是推广社会的福利工作。

他的革命精神自始至终坚定不移。自从在香港受到革命的洗礼后，他一生中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到他的殉难。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性格，使他和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间肝胆相照，义无反顾。以推翻满清为己任，为缔造共和为目标，甚至为捍卫宪法而不惜献出生命。

烈士在医术上的奉献，以及在革命道路上的奋进勇气，在他的儿女及后人身上，始终不断地传承着。他的长子伍伯良和女儿

伍智梅继承了父亲的专业，一生奉献在医学界。不幸的是伍伯良在时代变迁中，遭人暗算郁郁而终。他的女儿虽然一生从政，但坚守着自己的意愿和目标，为妇女解放，为儿童成长，为青年健康，为社会福利，始终不渝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告慰于她在天之灵的是，当今在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原自于她终身的呼吁和坚持所得到的结果，终能造福于人民。

第二个儿子伍伯胜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展现出才华，他继承了父母的基督信仰，将香港的房产出售所得，悉数捐献给芝加哥华人教会，作为培育青年的基金。最小的儿子伍伯就一生在音乐界里闯荡。他为抗战讴歌，他为艺术献艺，他为培养后进奉献，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佳话。

但他们都保有一颗纯厚善良的心，就如同他们的父亲，从不与人勾心斗角，也没有背后陷害他人的阴谋。坦然对待社会和人类。他们虽然都信仰基督，但从从不向他人宣扬宗教，只是本着基督的爱人如己的精神默默地奉献。

因此烈士的后代虽然散居在海外各地，但都能延续烈士的情操，安分守己地生活。伍伯良的孙子伍子英在广东医学界任职。伍伯就有四个女儿，都生活在海外，大女婿是加拿大著名的婴儿心脏手术专家。其他的后人在文学和学术界都各自本份地坚守工作岗位。

也许是有感于烈士的英勇牺牲，身后又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

他的后人没有一个踏入政界，而在各个不同行业中，兢兢业业，安分守己地工作，这是烈士身前循循善诱，殉难后的精神感召，引导着后人，在人生道路上循规蹈矩，紧捏分寸地做人处事，这足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烈士墓留给后人的思考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目睹伍汉持烈士墓地的遭遇，一直到2010年的广州之行，在这长达三十年的岁月中，我一直坚信，除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真的被红卫兵彻底铲除，不然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遗体，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不合情理的，我的信念是总有一天烈士的遗骸能被找到。当他墓园里原来的石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供应室的墙里出现后，更坚定了我寻找烈士遗骸的信念。于是我独自一人默默地在搜寻有关他的历史资料。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2010年9月8日，他的遗骸在肿瘤医院为了兴建大楼而挖掘了他原来的墓园后不久，在工地上被发现。由于烈士墓地的先被拆除，接着又发现了他的遗骸，我开始了和广州方面交涉对烈士的安葬，却得不到使家属心悦诚服的安排，为此激起我在2011年的正月，前往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进一步搜寻烈士资料的意愿。

从烈士墓园的被破坏到发现他遗骸的过程，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我冥冥中感受到，似乎是烈士的英灵在引导着我，把所有失

去的一切，都一步步有序地还原成一副完整的拼图。尤其是在台北的忠烈祠里，当我第一眼看到供奉在香案上烈士灵位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那并不仅仅是代表对先辈的怀念，以及因为多年来他所遭受到的不公对待而感叹。也就是在那顷刻间，中华大地上近百年来经历了民国，抗战，内战，还有政党本身的内讧，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烁，我豁然开朗地明白了为什么经历了近百年，中华民族还只能有共和之名，却没有统一之实。孙中山先生在逝世前留下的遗嘱：“**革命尚为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经过了八十多年，仍然是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

从伍汉持烈士在海峡两岸受到的不同对待，就可以窥视出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仍需要后人披荆斩棘。因为两边都无法从‘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个更小的圈圈’的怪圈里挣脱出来，延续着前人留下的敌视，猜疑，继而引起的恐惧和不信任。

蒋氏父子从大陆退出，在台湾执政近半个世纪，政党轮替后，其领导人并没有以宽容的心态，为台湾老百姓福祉着想，却沿袭中华民狭报复的劣根性。对蒋氏父子极尽羞辱的能事。陵园的防卫被撤消，铜像被击毁，还不断挑起省籍族群之间的矛盾。利用‘民主自由’的假象，糊弄百姓，还浑水摸鱼贪污能事，导致最后铛銜入狱。台湾的政治现状不是本书探究的内容，只是在那充满暴戾之气的时代，当时的政府对位在圆山的忠烈祠，是否要采取和对待蒋介石铜像相似的举措，还是有一定的顾虑。

因为在忠烈祠里供奉着的先烈，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值得欣慰的是，忠烈祠自1969年落成后，依据颁布的礼仪，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没有忘记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的先烈们，是因为烈士的献身，中华民族才能从数千年来的封建帝制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逐步地迈向民主政治。当然这走了近百年的民主路程，仍然是艰辛重重，归根到底是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以为夺得胜利目的就是标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自身功勋，而忽视了民族的整体团结。换言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民主共和的奋斗，缺乏一个大公无私能维系团结合作的凝聚力，这所谓的凝聚力就是整个民族所共同尊重的灵魂。

每当我们的邻国日本朝野拜祭靖国神社的时候，都会挑起中华民族的仇恨，激起中国人的痛处，这很易了解，因为日本人丧心病狂的屠杀和侵略，中国人无法容忍日本人去祭拜那些供奉在神社里头犯下滔天大罪的战争贩子，因为我们是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去审视日本的战犯。然而这些犯有滔天大罪的战犯，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是大和民族的精神灵魂，他们认为这些在中国人眼里的战争罪犯，是挺着胸膛面无惧色走向死亡的勇士。因为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共同敬仰的大和民族。

既然如此，当我们看到广东方面如此无情地铲除烈士墓地的恶劣行径时，扪心自问又如何作出解释呢？当我们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无情践踏的时候，那么对一个即便在我们心目中是个

残忍凶狠，而且对中华民族曾经施行过惨绝人寰暴行的大和民族，我们又凭借什么去控诉他们？

在2011年北京举行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文化广播公司记者，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非常关心“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请问中国将如何发挥这种优势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文化领域有什么具体政策和发展方向？’

温家宝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历经劫波而现在还保存完整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一个典范。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懂得，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常说的，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国家强大。

在‘十二五’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要把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强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和大繁荣。我们还要善于把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明结合起来，使祖国文化再展辉煌。”

温家宝先生特别强调**‘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然而我们的

民族魂，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遭受到史无前例毁灭性的血腥摧残，也是在那个时代，打着‘政治理想’的旗帜，呼喊着‘除四旧’的口号下，中华文明几乎被捣得支离破碎。

直到1978年后的三十年，中华大地在发展经济和物质腾飞的时候，盼望着文化传统的复苏。在一定的程度中事与愿违，举着‘经济挂帅’的旗帜，自私的个人本位主义，利欲熏心的门户之见，却无孔不入地在社会中肆虐。当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目的是要消灭‘传统’，最终导致失控的相互残杀，而当前在‘利益’的面前，就是一个披着‘文明’外衣，实质上是吸取社会精髓的文化摧残，它丧失了政治理想，对社会经济利益的掠夺与‘揠苗助长’，‘拔葵去织’无异，如同一栋华丽的大厦，被成千上万的白蚁啃蚀着每一个角落。

最后是连历史遗迹被消灭，烈士陵园也不放过，讽刺的是这样的行径竟然发生在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即使一些辛亥革命的遗址也难以幸免被拆除的厄运。

中国青年报在2011年5月2日报道称，天津原来有十六处辛亥革命的遗址，到2001年还幸存十一处，然而十年之后，只剩下北洋女师范学堂，河北公园，天津总站和广东会馆四处了。消失的理由是各区整体拆除，历史遗迹也连带遭殃。

与此同时浙江杭州也将唯一的辛亥革命历史旧址拆除了，那是革命女烈士秋瑾当年策划暗杀事宜的旧址。在2010年9月，东北

吉林发现，抗日将领冯占海将军的墓遭地产商挖掘的厄运，经当地人士的抗议，政府才出面将这位抗日将领的墓园易地修复。

南京的将军山明代古墓群被破坏，早在2000年当局就将该地出售给地产开发商建别墅。而位在北京的宣南辽金故城和杭州的南宋皇城遗址都不断遭到房地产项目的侵蚀。但这还仅是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的房地产业中的冰山一角，之所以能让地产商如此地胆大包天，肆无忌惮地挖掘他人坟墓和先烈陵园，原自于路人皆知的没有文化意识的官僚的撑腰所致。而这样肆无忌惮消灭文化的行径，居然发生在世界新文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二十一世纪。

河南登封市石道乡后河村的一个村民，在2011年3月间，挖出了一块距今二百年的石碑，是清代后河镇的地方建石。碑石高128厘米，宽60厘米，厚16.5厘米。刻有楷书字体的碑文，详细列有对盗窃，赌博，卖淫嫖娼，酗酒滋事等违法行为的惩处措施，其中对挖他人祖坟的罚银一两。在那么一个封建时代的小镇，地方官吏还本着良心教育百姓要敬崇先人，尊重历史文化，而当今的官吏，为了贪赃枉法，成了冷冰冰的行尸走肉。

这些寡廉鲜耻的发财致富手段，还不仅仅局限在这铺天盖地挖古迹，掘他人祖先坟墓的恶劣行径，就连国家级的文化宫殿也变成敛财的场所。举世文明的故宫，就在2011年5月8日，先发生盗贼石柏魁大摇大摆地在故宫里行窃的笑话，将香港委托的展览会中几件珍品盗走。可笑的是区区一个小贼居然轻易地过了故宫

的四道保安。公安部门在5月11日宣布破案后，故宫官员不仅不因为工作上的疏失向社会大众表示歉意，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强辩称博物馆的失窃全世界都会发生，意味着对故宫此次的失窃，社会上也无须大惊小怪。

故宫为了息事宁人，匆忙地在5月13日向当地破案的公安部门赠送锦旗表达敬意，居然出现错字，将‘捍’写成‘撼’，开始的时候故宫方面还狡辩称两字是通用的。到了无法抵御众怒时，才承认发生错字的丑态而道歉。

接下来故宫又爆出2005年由香港恆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名下的文物基金会修复的建福宫，居然由故宫博物院下属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和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以故宫宫廷文化公司名义，将故宫的历史文物摇身一变成为富豪的会所。并且在2011年4月23日举行了开幕典礼，邀请北京长江商学院CEO班一百多名毕业学员出席。众所周知北京长江商学院是香港地产富商开办的，为什么故宫建福宫的富豪会所仅仅邀请长江商学院的高端学员出席不言而喻。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于5月11日在他的微博上披露建福宫改建成为一个顶级富豪独享的私人会所，向全球发售500名限额的会员籍，每一位会员的入会费是一百万。故宫在13日的官方微博回应予以否认。此时曾经出席过开幕典礼的富豪，先后在微博上公布了入会协议书。同时贴上开幕典礼摆设的豪华餐桌，以及

故宫墙内通往建福宫的通道两旁，站立着身着铠甲，手持兵器的‘御林军’作为摆设的图片。

为了掩饰这一不能见光的丑闻，故宫先是否认，接下来就使用暧昧的态度来应付，最后就拿官场惯用的掩耳盗铃方式，为了能将责任推卸给下属，给自己下台阶。就宣布**“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

故宫的一波三折刚落下帷幕，南京又爆出美龄宫被改成举办婚礼的餐厅。这是一栋中西合并的别墅，建于1931年。被列为南京保护的文物，也在利欲熏心的支配下，把一栋文物建筑，转化成商业的处所。当这新闻被披露后，负责官员的解释和故宫的辩解如出一辙令人发噓。而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内也将蒙古包和它周围的建筑装扮成‘避暑山庄皇家会馆’，占地3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7300平方米，首批限量100名会员卡需要存入20万。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就这样被那些贪得无厌的昏官悄然地蚕食。

早在2011年的年初，广东南方日报就曾披露了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先生，在一次省委全体会议上，痛批当地官员对待群众‘拖’，‘躲’，‘捂’，‘推’的恶劣态度，他认为当地官员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不但不为人民群众造福谋利，反而是见利忘义，鱼肉百姓。他进一步批评，当前不少干部在对待群众工作的时候，出现恶劣的作风。**一是‘拖’，认为自己有任期，拖几年，一走了之，对上任留下来的矛盾更是避犹不及；二是‘躲’，群众从前**

门来，领导从后门溜，躲矛盾，躲难听话，想一躲了之；三是‘捂’，怕暴露问题，影响仕途，考核丢分，就掩盖矛盾；四是‘推’，群众的一个问题涉及几个部门，谁都不出头，推来推去，一推就是几年。

实际上，借用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先生痛批当地官员的‘拖’，‘躲’，‘捂’和‘推’，来形容故宫官员对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丑闻后，对外界的反映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也反映当今中华大地上，类似的官场弊病几乎是遍地开花。

汪洋先生对当地领导干部一针见血的痛批，这‘拖’，‘躲’，‘捂’，和‘推’恰恰印证了广州市各机构在处理伍汉持烈士墓地被肿瘤医院强制拆除后重建事宜的恶劣态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一直采取‘拖’的伎俩来应付烈士的后人；每得悉烈士家属到访的时候，所给的答复不是‘领导开会不在’，就是‘领导正忙着呢’来‘躲’；当烈士的墓地被挖掘后，家属安排媒体到医院实地采访时，有关部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为避免媒体的披露，当地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用‘捂’的策略来应对媒体；甚至到最后中央办公厅统战部发文到广东，要求地方部门就此事给以合理安排时，各部门之间互相‘推’托避免承担责任。

这也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有掩饰过失的本领，却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的劣根性。自官员到医院负责人都

清楚挖掘烈士的墓园，是极大的错误，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达一下歉意，更不要奢求他们心中会有些微的罪恶感。而只用沉默和拖延来掩饰他们铲除烈士墓的拙劣行径。

其实，为一劳永逸计，烈士后人希望将烈士墓迁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一则避免今后和肿瘤医院之间再生枝节，再则伍汉持在孙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中，直接参与了两次，其中一次就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他的墓地迁入七十二烈士陵园是名正言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广东当地官员一再的反对，不是非不能也，是不愿也。他们心知肚明，要将烈士墓迁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是要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假如他们真有出面协助的诚意，向中央文物单位写一份报告只是举手之劳。然而所采取的只是一贯的拖延方针。而伍汉持烈士墓的被挖掘，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见怪不怪，也是解决问题的一劳永逸的良策。

文化素质和民族魂

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满清被推翻后，民国建立，他又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此同时更关心国民的教育。他在1919年发表的孙文学说中用深入浅出的理论，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力图改变国人传统的知易行难的错误心理。在他的学说中，他用有志竟成作为结论。整篇学说后来成为他后来发表的‘建国方略’中第一部分的心理建设。

他感到当时国民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是国民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所以他积极提倡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建立学生——国民——官员——国家的基本教育系统。虽然他认为，有必要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优良传统，但其内涵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比如历史上传统的忠于君主的封建观念，他认为应该转化为对国家的效忠，狭隘的‘**父为子纲，不孝有三**’的封建孝道，应该扩大为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的道德观念。而社会上如不讲诚信定必发生混乱，也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

要发扬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首先要从教育学生入手。而学

生接受教育时，不仅仅局限在智力的发展和体能的锻炼，道德教育在很多时候需要放在首位，所以从‘德智体’的排列来看，就可以理解道德的教育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担负着社会的发展重任。学生有了良好的道德教育，进入到社会就成为优良的国民，国民的素质优良，进入政府工作，就是奉公守法的优良官员，有了高素质官员的运作，国家才能兴旺。

为了实现这高标准的兴国目标，孙中山先生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的普及，他认为要建立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必须提供有高师质的教师。而在道德教育中，要教导学生立志，他坚信学生**‘第一要立志，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立志要合乎国情’**。

在谈论国民教育的同时，孙中山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人缺乏公共道德和团结精神。都是肇因于长期封建社会中的过分亲情，在父慈子孝的家庭道德熏陶下，养成了自私的心态，而淡薄了对社会的公益奉献，对公共道德的不尊重，造成人心不齐，自私自利的散漫风气。孙中山先生感慨地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他又说：**‘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盘散沙。’**

时光的流逝瞬间已是百年之后，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历历在耳，然而中华民族儿女的道德教育仍然令人焦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整个的社会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形容 - 那就是‘利’的当头，为了利，仁义道德都已经不重要。文化传统在追求‘时

尚’的大环境下已被看成是历史的渣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谈到社会道德的时候忧心忡忡。

单有蓬勃的经济发展，而没有坚实的文化传统基础，整个社会就好像建筑在沙漠中的大厦，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坍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揪心的焦虑。孙中山先生所担忧的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自私，无公德心的流毒，却变本加厉地在社会中滋生。他对国民素质教育的呼吁，归根到底就是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华民族之魂，什么是民族之魂？就是对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尊重，而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就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没有凝聚力的民族，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是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的。

更有甚者，要尊重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关键是要有大公无私的基本精神。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革命道路上，始终是体现出他那无私的精神，他不计个人得失，为的是民族的前途。所以孙中山先生毫不迟疑大度地将自己的总统职位，谦让给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孙中山先生的思维里，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手握权力治理国家的机构，但政党不能驾驭在至高无上的民族之上。任何的政党都不能替代民族的地位和尊严。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灵魂，孙中山去除己见，发出了‘天下为公’的豪情。

然而在推翻满清创建民国的艰险历程中，能响应和继承孙中山先生这大公无私的政治理念的比比皆是，那些为了民族前途而

不顾自身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的豪情壮志，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伍汉持也不例外，他在革命时代，就已经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民国建立后，他进入了庄严的国会议坛，但是军阀的跋扈，议员的贪婪，令他对如同刚呱呱诞生的婴儿般的民主议会忧心忡忡，宋教仁的被刺，袁世凯向外大借善款，激发了伍汉持的正义，向权力挑战，向邪恶搏斗，当有人劝他不要和袁世凯对抗时，他义正词严地称：“**此乃议员天职，苟利国家，死生以之。**”

他在被捕后就义前，他仍然毫无惧色地告诉即将对他行刑的军官说：“**吾乃众议员伍某，自问无罪，惟曾提案弹劾袁世凯，被杨以德，王廷楨捕禁天津近二十日，吾从未有一乞怜语。今死矣，吾非畏死者…**”假如没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面对死亡是无法表达这样的豪情壮志的。

他和对他行刑的军官交谈之后，起身说：‘虽死，我无憾’，仰首挺胸从容就义，终于遂了他一生为革命献身的意愿。他在革命道路上曾经是同盟会的会员，民国建立后，他以国民党产生出来的议员进入到国会，然而他从不为自身的利益去争论，也不是因为政党的利益而死。他的死就是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发扬中华民族之魂的精髓。同盟会的革命元老莫纪彭用‘东方宪政之神’来推崇伍汉持烈士，但笔者认为用‘民族魂’来形容烈士短短一生的革命精神，似乎更为恰当。

他殉难后，袁世凯仍想对烈士毁尸灭迹一发泄胸中的妒恨，然终究未能得逞。但是在近百年的民主坎坷进程中，这样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宪政而献身的烈士，留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思考，这其中包括：

1) 伍汉持烈士是为革命奉献了一生，为维护宪法的尊严而献出生命。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华民族的儿女，从此摆脱封建的桎梏，享受民主自由和平安祥的生活。然而他自己的后人，却要分散在世界各地生活，这是为什么？

2) 烈士的子女，为了继承他的遗愿，一生从事医学卫生工作，但最后却被冠上莫须有的反革命现行犯的烙印，这又是为什么？

3) 烈士在就义后，袁世凯想毁尸灭迹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他那简朴的安息之所，为什么会在一百年后，被无情地挖掘一空？而要被安置在那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的荒冢中？为什么？



墓园被迁移后暂时安置场景

4) 从文化大革命到近期，四十余年中，位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的烈士墓园，三番五次的受到无情的破坏，最终是彻底被挖掘不留丝毫痕迹，而位在台北的忠烈祠里，他的灵位却受到最崇高的尊重。更有甚者，烈士在故乡广东，他的安息处所，居然会在一百年后被毁灭，而要到海峡的对岸去‘避难’，两地同属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

5) 烈士家属要求迁移烈士墓园的时候，广东方面官员反应的冷漠无情，以及态度的傲慢不屑，令家属心灰意冷，不寒而栗。一个讲求和谐，崇尚和平的社会，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

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得到答案，就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正在温哥华访问的广东省代表团的那位官员，对我说过，假如烈士的家庭有李宗仁或白崇禧那样的权势，那么也就不会留下这么多的‘为什么’。也诚如中国京剧中那两句唱词，‘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个圈圈’。如果继续在社会中流行时，那也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了

2011年5月20日修改稿（北京）

2011年6月27日再次修改（北京）

伍汉持烈士生平年表

1872年—出生于广东省新宁(现台山)县斗洞村斗山乡

1890年—和同乡李佩珍女士结为连理

1893年—长子伍伯良出世

1895年—前往广州，在惠斯礼教会听道，接受洗礼

1896年—进入惠斯礼教会创办的西医学院习医

1897年—女儿伍智梅出世

1899年—从惠斯礼西医学院毕业

1900年—在广东开平单水口开业行医

因为义和团拳匪之乱蔓延到广东，波及南海，顺德，番禺新会，新安，和饶平等地区，伍汉持在开平开设的医院因为有教会和西医的背景，也未能幸免而被洗劫一空

1901年—伍汉持前往香港谋出路，在油蔴地开设医院行医，并且获得在南非轮船上医务工作，专职为船上华人劳工诊治，利用其工作之便，宣扬革命，吸收革命党人，一直工作到三十三岁

- 1902年—连同革命党人史古愚，马达臣等，在广州举事，是为广州起义，失败返回香港
- 1903年—4月连同宋居仁，萧敬宗，谭民三，黄其馨和谭思义等在香港筹建“中国基督徒会”，开创中国人自主的教会，次子伍伯胜诞生
- 1904年—中国基督徒会正式成立，并设立华英学堂，作为宣传革命基地
- 1905年—和妻子李佩珍回到广州，进入广东政法学堂学习法律等课程，和陈炯明为同学
- 1906年—夫妇两在广州市旧仓巷开设图强医学堂，为中国人开设西医开创了先河。同年和马达臣等创办广东红十字会，是现在的红十字会前身
- 1907年—孙中山发动钦廉起义，遭遇瘟疫，而革命行动艰巨，负伤革命党人甚众，于是通过冯自由联系伍汉持支援医疗协助。同年革命党人刘师复在伍汉持医院附近布置暗杀清吏，不幸受伤，伍汉持因为其治疗伤势，以革命同党为由，被清政府逮捕。后经夏同龢，古应芬，杜之枬和朱执信等担保才获释。至此伍汉持又开设了图强助产士学校，专司培养接生的人才，并以行医来掩护革命斗争

1910年—幼子伍伯就出世

1911年—率领革命党人，策划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事败后，退回到香港。同年九月在香港连同莫纪彭，林复君，谭民三，叶夏声等革命党人商议，策反了香军，光复香山前山。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炯明担任广东都督，因曾和伍汉持同学，了解他的为人敦厚，工作沉稳，于是延揽出任都督府医务部长一职

1913年—经香军的推荐，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伍汉持携家属往北京出任议员职，于四月一日上任。因要求袁世凯在国会中说明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的真相，以及弹劾袁氏向五国借善款的不当之举，遭到袁氏的妒恨，派人于八月一日在天津将其绑架，同年八月十九日不幸在天津郊区韩家墅被害，时年41岁。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家属方得知恶耗，前往天津领尸，并将棺木暂厝当地广东义庄。其灵柩到十二月一日才得以运回广州，先寄厝在广州垣东门外永胜寺中

1914年—烈士的灵柩最终在八月十九日被谋害一周年之际，安葬在广州市的基督教会坟场

1937年—伍汉持烈士女儿伍智梅于1932年被广州市政府推

荐前往海外筹募捐款，作为兴建伍汉持纪念医院的基金，该医院于1935年开始兴建，于1936年竣工。地址在广州东郊外东沙马路汪岗(即现在的东风东路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纪念医院落成后，家属决定将烈士墓于1937年3月2日移灵到院庭园中

1951年—伍汉持烈士生前创办的广州图强医院和图强出产士学校，以及1937年由其女儿创办的伍汉持纪念医院，均遭到没收

1978年—烈士家属首次回到广州，发现烈士墓遭到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墓中烈士的遗骸也不知所终

1982年—烈士墓经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拨款在原址修复，在修建期间，烈士墓的石碑在医院供应室墙内被发现

2008年—伍汉持烈士墓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伍汉持烈士墓因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为兴建大楼，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的前提下，予以拆除

2010年—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施工期间，于九月八日在工地的古墓群中发现了伍汉持烈士遗骸骨坛，因为墓地被医院拆除，烈士骨坛无处安葬，

搁在医院的空调控制室中

2011年一经过广州市文化局的艰辛协调，最终在一月将烈士骨坛暂时安葬在粤军第一师诸先烈陵园中。

黄花岗应改为八十六烈士陵园的浅见

因为伍汉持烈士的墓园，在广州遭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蛮横拆除，就在这时候，烈士的骨坛奇迹般地在医院工地被发现，但是医院对烈士的遗骸没有表示丝毫的尊重，只令工人为烈士的骨坛，做了一个粗糙的木箱，被搁置在医院的空调控制室里，作为烈士的后人，目睹医院这种随意，无情，和冷漠的态度，除了愤怒外，就只有感叹，悲哀，和无奈。

于是我曾经两度前往广州，和当地文化部门商讨，烈士的骨坛是历史的遗迹，不能由医院如此地草率处置，必须要择地先行入土。烈士家属都主张应该将他的骨坛，迁葬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最为妥善。为此我曾两度前往该陵园作实地了解。

我也借此机会，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并浏览了陵园中的历史。当我在瞻仰革命党人章炳麟撰写的碑石的时候，发现黄花岗其实有八十六烈士的记载，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因为在将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因为在广州起义失败中，烈士们英勇牺牲后，开始的时后，迫于清廷的威慑，无人敢为烈士收尸，最后是经过潘达微的挺身而出，才收殓了七十二具遗体，就

这样一直延续到今天。受到追忆的仅仅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他十四位烈士，虽然是记载在历史中，却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甚至是无人知晓。不禁让我将十四位烈士的处境，和伍汉持烈士事迹的被湮没以及后来墓地的遭遇联系在一起，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对先烈的不公，实在是历史的扭曲。

黄花岗八十六烈士的真实记载，是国民党从1918年到1934年，经历了十六个春秋的精密了解调查和核实所得出的结论。而且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一共竖立了五块石碑，清晰地记载着在调查核实牺牲的烈士名单的详细经过。

首先，国民党在1918年委派元老朱执信和邹鲁，负责对3.29一役中牺牲的烈士名单和事迹作征集的工作，随后有中华民国政府参议院林森院长，召集吴玉章，何克夫，胡毅，和徐维扬等共同审核初步所得的烈士名单，先在1919年证实的有56人，一直到1922年又证实了16人，两者相加共为72人，于是在陵园中，竖立了第一块石碑，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是由汪兆铭题书，林森监督修建的。现在陵园烈士墓的南侧碑亭内。

这第一块碑高2米，宽0.89米，72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分别为12列，每列6人。

※ 碑石一 ※

在这座碑亭的外面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碑坊，陵园中的第二快碑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就竖立在东侧。上面记载着审定56位烈士姓名的经过。这块碑高超。77米，宽0.84米，碑文是：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

大埔邹鲁撰 番禺胡毅书

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党人死事者，其数不可稽。时后，潘君达微收党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于黄花岗，由是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称。潘君亦党人，自以未名捕，乃于危疑震撼之际，毅然出收死友之骨，可谓难矣。

其明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胡君汉民，陈君炯明相继任广东都督，议就当日合葬处修葺而整饰之，省议会通过经费十万元，二年乱作，遂不果。七年秋，滇军师长方君声涛始募修故墓，规模粗具。参议院议长林

君森复募建碑亭及记功坊。俾不致湮没于后世。杯然欲举当日死事者姓名，籍贯，一一泐之于碑，事乃至难。盖举事之际务慎密，凡姓名，籍贯，同事者非素识不能知，且亦不愿知之，故今日同事之未死者，其所能举亦惟素识者而已。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尽举其姓名，籍贯，可不痛欤！鲁与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相与征集事实，牖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贯。林君森更约当日未死同事之在粤者胡君毅，何君克夫，吴君永珊，徐君维扬等，以确为之证，人计得五十有六人。其中有姓名而无籍贯者尚有三人，先行泐之于碑而留空白，以俟续有所知得以补泐焉。颜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盖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虽有所阙，固望他日能补而足之也。夫马革裹尸，党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望，遑论留名！今之为此，徒以为后人流连凭吊之资，于死事者固无于也”。

呜呼！此役所丧失者，不特吾党之精锐而已，盖合国中之俊良为一炬，其物质之牺牲，不可谓不大，然精神所激发，使天下皆了然于党人之志节操行，与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踰年而中华民国遂以告成，则其关系宁不重欤？然念国难之无穷，贤才之易尽，执笔作记，又不胜后死之感也。

中华民国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 碑石二 ※



在碑亭的西侧竖立着的第三块碑石，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明撰写的，记载着在1922年审核时所确定的另外16位烈士姓名。这块石碑高0.72米，宽1.57米，碑文是：

七十二烈士既葬黄花岗之八年，闽侯林森等修其墓，复与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后死者审求先烈之姓名，里乘，得五十八人。番禺汪兆铭书而勒诸石，大埔邹鲁为文纪其事。越三载，民国十一年春，续得十六人，补志之，于是而七十二人者以备。

民国十二年九月 番禺胡汉明书

※ 碑石三 ※



至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姓名和籍贯准确无误，然而在确定了七十二烈士的十年后，黄花岗再次竖立了第四块碑石，至今仍保存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北侧。那是在1932年(民国21年)，由胡汉明撰写的“补书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烈士碑”。在这块碑上，增添了13名烈士的姓名，使得原来确定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增加为85烈士，这块碑石高1.87米，宽0.96米，原文如下：

辛亥三月二十就日广州革命之役，收葬于黄花岗者七十二人，因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森，汪兆铭既为记姓名于石，今又十年，吾党同志求得死于是役而为前碑所未载者，谓不可听其湮没，属补书之。呜呼！

不知盖阙幽潜必章，吾之人当有感于修史之不易矣。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番禺胡汉民识并书

徐国泰(江苏邳县) 华金元(江苏江宁) 阮德三(江苏丹徒)

陈甫人(广东梅县) 严确廷(广东惠阳) 张朝(广东顺德)

罗干(广东南海) 罗联(广东南海) 罗遇坤(广东南海)

罗进(广东南海) 陈才(广东南海) 陈福(广东南海)

韦云卿(广西南宁)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烈士也被确认，但没有列碑，他的姓名是李祖恩，广东翁源人。所以在黄花岗实际的烈士应该为86人是准确无误的了。

但是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的最大一块党人碑，竖立在陵园中记功坊的后面，连同最后一位烈士在内的全部86位烈士姓名，包括每一位烈士的籍贯，年龄和就义的情况，分三排撰刻在碑阴面，形成一幅完整的烈士就义表。这块碑石高3.92米，宽1.82米，可以称得上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一块碑石。

在碑石的正面，是国民党党史元老邹鲁在1934(民国23)年3月29日撰写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就日革命记”，全文长达三千字，详尽地记载了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前的筹备经过，烈士的英勇战斗牺牲，潘达微收葬七十二烈士的义举，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墓修建的经过。

这块富有特殊意义的碑石，最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拨专项款修建的。足见当时国民党对86位烈士的所表达的最高崇敬和怀念。

※ 碑石五 ※



从这五块碑石中，清晰地看出国民党自1918年到1934年，历16年的认真查证，并确认了3·29广州起义一役中，共有86位烈士献出生命，奠定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最后缔造民国。是中华民族从封建帝制转化为共和的神圣事业的重大奉献。然而值得我们后人思考的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虽然是沿袭了一贯的名称，实际上，对其他十四位烈士，是不公平的。黄花岗86位烈士的牺牲，都是为了同一个革命，同一个理想，假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不能改成八十六烈士墓，无形中将烈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等级。既然在现存的碑石上，国民党元老都认为，假如那十四位烈士的姓名不能补刻在碑石上，导致湮没而被忘却，那将是我们的罪孽。那么文物当局，就应该认真地考虑，用什么方式，将现代中国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黄花岗，得以正名，让八十六位烈士都能享受后人对他们的同等尊重和敬仰。

正如伍汉持烈士的墓园被拆除一样，历史是不允许被践踏的，没有先烈的付出生命，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不正视历史，蔑视烈士，就等同否定民族的文化遗产。在这里提出对黄花岗的浅见，目的只是希望历史学家，文化考古界人士，能够就这个议题，给后人一个鼓舞的结论。

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笔者个人列了两个名录，作为对纪念这一伟大历史的小小建议尤其是第二个名录，笔者认为是他们才有中华民族共和体系的逐渐完善：

辛亥革命前革命过程中献身的一百位重要历史人物：

赵声 邹容 倪映典 郑贯一 李自重 温生才 梁仲猷 刘揆一
秋瑾 陆皓东 郑士良 杨衢云 谭嗣同 史坚如 黄花岗86烈士

辛亥革命后一百年创建共和的历史人物：

孙中山 宋庆龄 黄兴 廖仲恺 何香凝 蒋先云 伍汉持 伍朝枢
徐秀钧 林文英 姚勇忱 徐镜心 古应芬 朱执信 康有为 梁启超
邓演达 黎元洪 林森 谭延闿 居正 邹鲁 张继 于右任
李烈钧 戴传贤 陈其美 黄嵩龄 黄建勋 李济深 陈独秀 廖平子
梁镜尧 何应钦 陈诚 李宗仁 白崇禧 陈继承 萧楚女 周至柔
张治中 恽代英 胡汉民 王昌 汪兆铭 冯自由 邓仲元 陈炯明
黎元洪 许崇智 蒋介石 宋美龄 伍智梅 孙科 宋子文 孔祥熙
俞大维 李大钊 曹渊 赵一曼 蔡光举 戴安澜 胡宗南 程潜
陈明仁 傅作义 胡靖安 关麟征 谢晋元 熊式辉 李弥 刘峙
邱清泉 黄伯涛 周恩来 邓颖超 张国焘 瞿秋白 刘少奇 廖承志
毛泽东 朱德 聂荣臻 陈毅 李富春 叶剑英 邓小平 陈赓
刘伯承 林彪 徐向前 刘志丹 罗瑞卿 许光达 许继慎 左权
耿飏 曾中生 邓文仪 李之龙 (共一百位)

参考资料

- 01 梁寿华，中国革命与基督教信仰，第二章 革命与华人教会本国化运动
- 02 伍汉植，革命人物志，第一集，396-403页
- 03 冯自由，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广东文徵续篇，492-495页
- 04 胡汉民，伍汉持纪念碑，广东文徵续集，233页
- 05 崔通约，伍伯胜博士说教述及其先人伍汉持烈士，沧海生平，上海沧海出版社，17-18页，民国24年重9初版
- 06 莫纪彭口述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5-6，42-43，144，170，173和175等页
- 07 中国基督徒会章节，61-62页，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中央图书馆
- 08 图强医院简章，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提供
- 09 香港华宇日报，1907年6月18日
- 10 报温哥华大汉公报，1932年10月5日，第三版
- 11 胡汉民撰写碑文原始稿，连带考证便条，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12 冯自由，革命逸史
- 13 国会当选名单，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提供
- 14 伍烈士汉持先生传，伍氏宗亲会会刊，民国66年1月号
- 15 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7月版
- 16 革命志士伍汉持，以劾袁世凯而死，中央日报，民国69年12月22日

- 17 总理致袁世凯责违法借款电，1913年8月(国民党党史馆)
- 18 吴景濂等72人通电(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17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1924年6月24日
- 18 伍智梅申请补助伍汉持纪念医院报告，民国36年4月4日，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提供
- 19 移灵社稷坛及奉安大典盛况(1925年3月19日)，总理奉安实录，1929年，中山图书馆
- 20 刘心印，一个家庭，十多种命运，环球人物，85期，2009年7月(上)号，66-69页
- 21 李又宁，伍智梅与国民党，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会，(台北，民国八十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五日)
- 22 李曼瑰，尽瘁留芳，剧本，李曼瑰剧存，第二册。375-499页，正中书局，民国68年
- 23 伍智梅致吴铁城函，国民党党史馆
- 24 伍智梅提案：促进完成我国公共卫生行政设施计划案。民国24年11月18日(国民党党史馆)
- 25 伍智梅提：广州特别市执委会致五全大会秘书处电(国民党党史馆)
- 26 伍智梅上总裁书，民国31年11月9日(国民党党史馆)
- 27 伍智梅提案：请加强妇运组织确立中心工作案(国民党党史馆)
- 28 伍智梅提案：请建立公医制度以增进国民健康而固国本案(国民党党史馆)
- 29 总理委黄建勋为梧州海关监督兼交涉员令(国民党党史馆)
- 30 总理任黄建勋为海关监督令(国民党党史馆)

附注

- 01 原照片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02 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第4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4,1997年6月出版
- 03 冯自由,广东文征续编,第495页
- 04 香港基督教会史,第61-62页,存香港中央图书馆
- 05 现存香港中央图书馆
- 06 香港基督教会史,第61-62页,存香港中央图书馆
- 07 香港基督教会史,第61-62页,存香港中央图书馆
- 08 崔通约,沧海生平,第17-18页,上海沧海出版社,民国24年重九出版
- 09 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第42-43页
- 10 冯自由,广东文征续编,第494页
- 11 胡汉民撰写碑文,民国二十四年七月
- 12 愿件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13 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第175页
- 14 原件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 15 邹鲁,伍烈士汉持先生传,中国国民党党史,第1497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七月版
- 16 邹鲁,伍烈士汉持先生传,第1497页

- 17 冯自由, 广东文征续编, 第495页
- 18 胡汉民撰写碑文,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
- 19 胡汉民撰写碑文,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
- 20 冯自由, 广东文征续编, 第495页
- 21 伍智梅向善后救济总署提案, 民国36年4月4日
- 22 胡汉民撰写碑文原始稿,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 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23 原件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24 原件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25 冯自由, 广东文征续编, 第493-495页
- 26 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 第43页
- 27 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 第43页
- 28 广州广东群报, 1921年1月3日第二页
- 29 广州民国日报, 1929年11月20日, 11月23日, 11月26日和12月10日各版
-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5日
- 31 原件存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 3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57年度刑罚劳字第14号刑事裁定书
- 33 崔通约, 沧海生平, 第18页
- 34 李又宁, 伍智梅和国民党, 第10页, 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会, 民国80年8月11日至15日台北举行, 暨南国际大学图书馆存
- 35 崔通约, 沧海生平, 第18页
- 36 崔通约, 沧海生平, 第18页
- 37 李曼瑰, 剧存, 序言第六页, 台北正中书局印行, 民国六十八年版, 台北中央图书馆存

- 38 李又宁, 伍智梅和国民党, 第27页
- 39 李曼瑰, 尽瘁留芳, 自序第377页, 李曼瑰剧存第二册
- 40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纪要, (民国27年7月6日到15日, 台北国史馆存, 李又宁也曾引用)
- 41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案, 民国27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
- 42 原件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5. 2-119. 37号存档)
- 43 原件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 44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议事记录, 第161-162页(李又宁在伍智梅和国民党中也曾引用)
- 45 原件存台北国史馆
- 46 李又宁, 伍智梅和国民党, 第26页

伍汉持烈士遗属表

